

#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潘 漫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思东 陈 思 姚华庭  
郭晓东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 目 录

2025 年第 6 期 总第 158 期  
双月刊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 辑 出 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 任 编 辑:蒋建忠 王天海 徐晓婷 赵晓锋  
于博洋

## 统战理论与实践

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体系优化研究 / 叶继红	4
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角色转换与赋能机制研究 / 程曼晴	12
发挥知华友华的青年力量:新时代青年侨领、侨青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 张 颖	19
吴贻芳与统一战线 / 周和平	26
网络信息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 单冠贤 李西娟	29

## 民族与宗教

超越工具性思维:价值理性引领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蕴与路径 / 赵浩含 朱星辰	34
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互动逻辑、具体表征与实践进路 ——以《黑神话:悟空》为例 / 陈彦余	42
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体系的纵向结构调整 ——基于浙江省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的实践 / 徐声响	49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 年 12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 民营经济

- 亲清政商关系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创新研究 / 孙哲远 55
- 制度型开放下金融创新助推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 成春林 庞思璐 63

## 学习与思考

- 网络热词·社交预期·成长引导:青年线下社交的困境与纾解 / 尤可晴 徐建飞 70
-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管理改革的趋势与挑战 / 高任伟 77

##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5 - 06

# 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体系优化研究

叶继红

**摘要:**当前,欧美同学会各级各类组织发展较为迅速,组织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包括欧美同学会吸纳会员不够充分、联系会员有待加强、供给与需求存在偏差、服务效果有待提升、组织凝聚力有待加强。究其原因,行政化运作影响社团组织的运行效率,输入式供给导致服务与需求匹配度不高,松散型联结影响留学回国人员归属感,组织管理人才缺乏影响服务活动质量。因此,需优化欧美同学会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加强欧美同学会能力建设,打造欧美同学会组织文化。

**关键词:**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体系;留学人员

留学回国人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力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弘扬留学报国传统,以健全组织体系为基础,以扩大组织覆盖为重点,以提升组织效能是关键”。这就对欧美同学会的组织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提出了较高要求。当前,欧美同学会在团结引领和联系服务留学回国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各级各类组织发展还不平衡;会员数量与归国留学人员总量还不相适应,联系留学人员范围还不够广;服务质量和水平与广大留学人员对‘家’的期盼相比仍有一定差距”<sup>[1]</sup>;“各省欧美

同学会还仅仅局限在理事选举、会费缴纳等内部管理问题上,并未将理论学习、载体建设等实践活动纳入制度建设的范畴”<sup>[2]</sup>。这些问题影响了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的效果。

为了更深入具体地了解当前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状况,本研究对长三角地区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吸引了大量的海归人才在此创新创业,领英调研数据显示,2024年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留学生归国首选就业地<sup>[3]</sup>。因此,欧美同学会组织如何服务好该群体就显得格外重要。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访谈法收集资料。2023年8—9月,课题组采用配额抽样方式,在长三角3省1市各抽取200份样

收稿日期:2025-06-27

作者简介:叶继红,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南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欧美同学会2023年研究课题“留学回国人员需求与组织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欧美同学会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样本源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欧美同学会会员。共发放8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29份,有效率为78.6%。样本中,浙江省占33.4%,安徽省占31.8%,江苏省占18.4%,上海市占16.4%。课题组实地走访了浙江、江苏、安徽三省欧美同学会秘书处,进行了座谈和访谈,收集了部分访谈资料。

### 一、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体系建设概况

组织服务体系是由组织架构、制度规范、运作机制等构成的一个整体,从中可以大致了解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体系建设的状况。

#### (一)建立了基本的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是组织内部的基本设置,是组织运行的基础。欧美同学会于1913年成立,2003年开始增冠“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名,是中国创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民间社团之一。从组织架构来看,欧美同学会主要是由欧美同学会总会与地方欧美同学会构成,目前,全国已建立了40多个省级组织和副省级城市组织,个人会员超过22万人。从其内部设置来看,欧美同学会内设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会长会,以及秘书处等机构。其中,会员代表大会是欧美同学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与会长会是欧美同学会的决策机构,秘书处则是欧美同学会的执行机构。秘书处实行秘书长负责制,秘书处在秘书长带领下负责欧美同学会的日常工作,属于欧美同学会专职工作部门。例如,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秘书处由办公室(宣传网络部)、对外联络部、会员工作部3个部门构成。又如,南京市欧美同学会秘书处内设综合科、欧美同学工作科、发展大会南京服务科及海外联谊工作科4个部门,秘书处核定事业编制人数13人,实有在职事业编制10人。此外,欧美同学会总会还下设专委会,如总会下设商务人士委员会、金融委员会、企业家联谊会等,江苏省欧美同学会下设法律工作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等。

#### (二)出台了系列制度文件

任何规范化的组织活动与创新实践都需要以

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形成可以依循的制度规范。制度规范阐述了组织的意义、合法性,以使组织目标的实施变得可能<sup>[4]</sup>。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这是中央首次针对欧美同学会建设专门下发的文件,体现了对欧美同学会及留学人员组织建设的高度重视。随后,总会出台了《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章程》《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组织通则(试行)》《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选举通则(试行)》《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会职权及理事会职责》等文件。从地方来看,省级、市级欧美同学会也加强了制度建设,如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制定了《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章程》《关于加强本市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合会)建设的实施意见》《欧美同学会采购办法》等。这些文件确保了欧美同学会的各项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

#### (三)建立了一整套工作机制

工作机制是组织运行的基本方式和组织工作的基本抓手。对欧美同学会组织运行过程的梳理发现,以下工作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轮值工作机制。轮值工作是指工作班子或团队成员轮流值守,提供服务的一种工作方式。例如,浙江省欧美同学会安排会长班子成员到“康庐”轮值1周,每位会长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工作特点,组织或承担一场有特色、有吸引力、有影响力的讲座、报告、沙龙等活动。二是专业服务团工作机制。专业服务团是欧美同学会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例如,合肥市欧美同学会组建了“就业创业服务团”“科技创新服务团”“投融资与产业运营服务团”“社情民意服务团”“医疗卫生服务团”,开展相应工作。依托这些服务团队,欧美同学会各级各类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三是会员纳新机制。建立欧美同学会的目的,是将更多的留学回国人员吸纳进组织,以便更好地提供服务、加强引领,这需要不断地进行组织纳新。以上海



市为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每年发展新会员 1000 余人,新会员平均年龄在 35 岁左右,约三成取得博士学位,六成取得硕士学位<sup>[5]</sup>。四是会员联系机制。会员联系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强与国内会员的联系。一些地方欧美同学会加强与会员的联系,积极推进会员联系制度化。例如,浙江省欧美同学会建立了会员走访联系日制度,会长带头走访,走访对象是有代表性的或需要加强联系的留学回国人员。另一方面,加强与海外留学人员的联系。一些地方欧美同学会还将联系工作拓展到海外,为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牵线搭桥。例如,浙江省欧美同学会联合中欧科技教育创新产业联合会等 5 家海外引才工作站,协同格林尼治、纽约、伦敦、法兰克福等地的海外代表处,加强与海外高校合作,对接人才与项目资源。五是跨域合作机制。跨域合作是地方欧美同学会实现更大范围内资源优势互补和抱团发展的一项新机制。例如,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欧美同学会合作共建长三角海创中心,在长三角地区开展跨域合作。

## 二、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存在的问题

当前欧美同学会在吸纳联系会员、服务供给、服务效果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影响了欧美同学会的组织凝聚力和组织效能的进一步发挥。

### (一) 吸纳会员不够充分

欧美同学会建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广泛吸纳留学回国人员入会,留学回国人员只有入会后才能更好地被组织起来和接受服务。但是,当前欧美同学会在吸纳会员方面还不够充分。以江苏省苏州市 C 大学为例,该校欧美同学会组织成立于 2019 年,目前加入校欧美同学会的教师只有 250 余人,但该校 3 千名专任教师中约 36.0% 的人具有一年及以上海外经历。这说明,欧美同学会基层组织吸纳会员还不够充分,基层组织覆盖范围比较有限。再以苏州市为例,苏州是首个建立欧美同学会的设区市,并实现了 10 个区及县级市欧美同学会全覆盖。同时,在苏州大学、中科

院纳米所、东吴证券等单位建立了欧美同学会,但与目前该市近 6 万人的留学回国人员体量相比,吸纳的会员数比较有限,只有 1500 多名。从江苏省来看,全省各级欧美同学会组织已达到 144 家,其中 13 个设区市实现全覆盖,共吸纳会员约 1.5 万人,但与全省 17 万名留学回国人员相比,入会人数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在对浙江省欧美同学会的调研中发现,留学回国人员的入会数量也较少。

### (二) 联系会员有待加强

各级欧美同学会的建立表明留学回国人员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留学回国人员被纳入了联系和服务的范围。一些欧美同学会还出台了有关会员联系的制度文件。但是,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欧美同学会联系会员的工作还有待加强。

在相关问卷调查中,对于“过去的一年,您所在单位欧美同学会有无对您进行走访联系”的问题,被调查者表示走访联系“1—2 次”的占比较高,就“从未有过”选项而言,上海市(36.7%)比例最高,安徽省(28.6%)比例最低(见表 1)。对于“过去的一年,您所在单位欧美同学会开展活动次数”的问题,上海市集中在“3—4 次”(43.3%),安徽省与江苏省集中在“1—2 次”,分别为 40.3%、34.5%,而浙江省在“1—2 次”和“5 次及以上”的比例都较高,体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见表 2)。从被调查者评价情况来看:认为欧美同学会联系“非常紧密”和“比较紧密”的比例分别为 22.6%、39.9%,合计为 62.5%;认为联系“不太紧密”和“非常不紧密”的比例分别为 12.7%、1.9%,合计为 14.6%;另有 22.9% 的人表示“不确定”。

表 1 分省市欧美同学会走访会员情况

	从未有过	1—2 次	3 次及以上	不适用
安徽省	28.6%	44.7%	14.7%	12.0%
江苏省	35.3%	41.4%	15.5%	7.8%
浙江省	32.4%	38.1%	15.7%	13.8%
上海市	36.7%	46.7%	10.0%	6.6%

表2 分省市欧美同学会开展活动情况

	0次	1—2次	3—4次	5次及以上	不清楚/不适用
安徽省	4.8%	40.3%	27.8%	17.9%	9.2%
江苏省	16.4%	34.5%	18.1%	22.4%	8.6%
浙江省	4.3%	31.4%	21.9%	31.4%	11.0%
上海市	0.0%	23.3%	43.3%	16.7%	16.7%

### (三) 供给与需求存在偏差

供给与需求是否匹配是评判服务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问卷调查显示,对于“所在单位欧美同学会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您的需要”的回答,表示“完全能够”和“比较能够”的人分别占26.4%和45.5%,合计为71.9%,表示“不太能够”和“完全不能”的人分别占7.0%和1.2%,合计为8.2%,另有19.9%的人表示“不确定”。这说明欧美同学会的服务供给与留学回国人员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偏差。相关研究也表明,“现有的社团活动内容尚不能完全满足会员自我价值实现的需

求”<sup>[6]</sup>。从供需偏差大小来看,考察调研、创业就业、生活保障排在前三位,分别为-36.7%、-36.3%、-34.8%(见图1)。

### (四) 服务效果有待提升

服务效果是反映组织服务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服务效果可以通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评价来反映。问卷调查显示,对于“您对所在单位欧美同学会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的回答,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为36.9%、40.5%,合计为77.4%;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为2.9%、0.3%,合计为3.2%;另有19.4%的人表示“不确定”。从被调查者对欧美同学会提供服务存在的问题来看,“组织活动较少”(49.5%)、“服务形式比较单一”(30.1%)、“组织活动缺乏吸引力”(27.8%)、“服务供给不够精准”(27.6%)排在前三位,说明服务成效有待提升(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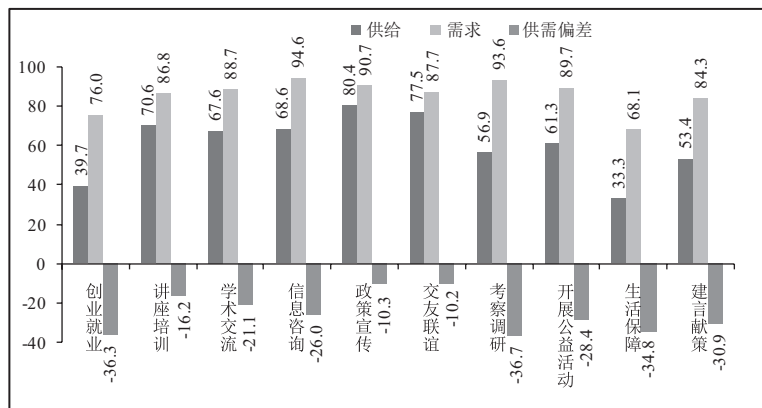


图1 欧美同学会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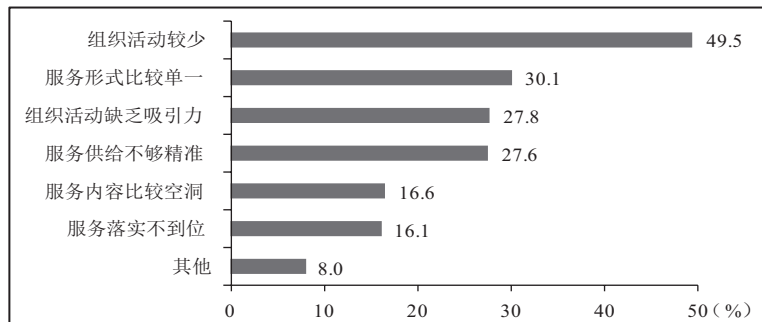


图2 欧美同学会提供服务存在的问题(多选)

### （五）组织凝聚力有待加强

归属感是考量组织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归属感是指个体对于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或组织的内心感受，反映了个体对于组织的一种情感的或心理的依恋状态。问卷调查显示，对于“您所在单位欧美同学会是否有一种依恋感”的回答，表示“很是依恋”和“比较依恋”的被调查者分别占 21.5% 和 33.5%，合计为 55.0%，表示“不太依恋”和“没有依恋”的被调查者分别占 12.4% 和 3.5%，合计为 15.9%，另有 29.1% 的人表示“不确定”，说明欧美同学会在组织凝聚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三、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行政化运作影响社团组织的运行效率

与一般的社团组织相比，欧美同学会组织有着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其办公经费全部来自财政拨款。虽然《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章程》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会员缴纳的会费”“会员和社会捐赠、机关团体资助及服务事业的合法收入等”，但秘书处的办公经费基本上由政府财政包揽，秘书处工作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因而更像一个行政化部门。这种运作模式虽然能够保证欧美同学会获得稳定的经费支持，但降低了该组织争取其他渠道经费的需求，也容易形成对政府部门过度依赖的心理，使其逐渐成为隶属于政府的一个部门，从而影响其作为社团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也就是说，其“自主权、选择权，都会被一个高能量的、强大的社会官僚机制所剥夺”<sup>[7]</sup>，不利于构建行业性社团与政府部门之间应有的平等合作关系。正因如此，欧美同学会容易成为只对政府部门负责的组织，从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诸如制作台账、上报材料、应对上级部门检查考核等行政事务上，一定程度上会忽视留学回国人员的现实需求。

#### （二）输入式供给导致服务与需求匹配度不高 目前，欧美同学会的服务基本上属于输入式

供给。这种供给方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单向度，即由欧美同学会领导班子和秘书处自上而下进行策划和组织实施；二是运动式，即这种供给根据某个重要时间节点，由上级部门交办或需要结合政治宣传任务而推出；三是被动响应，即服务对象在整个过程中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对供给的服务的响应度不太高，参与不太积极。欧美同学会输入式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公共服务中的体制惯性影响。这种输入式供给方式很难真正反映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当这种供给与留学回国人员的需求不相符时，留学回国人员就会失去参与的兴趣。

#### （三）松散型联结影响留学回国人员归属感

松散型联结是指群体内个体之间的一种弱关联的状态。留学回国人员作为一个群体，总体上呈现出松散型联结的特征。这种联结对增强留学回国人员的组织归属感具有反向作用，即留学回国人员越是处于松散联结状态，越是难以形成对组织的归属感。这与组织理论中的“松散耦合”十分相似：“开放系统所包含的要素彼此之间往往是较弱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各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主行使。”<sup>[8]</sup>这种“松散耦合”的运作源于留学回国人员的以下特征。一是留学回国人员独立性较强。由于在国外学习、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培养和锻炼了自身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他们对外部的依赖性相对较弱。二是留学回国人员属于高知群体。问卷调查显示，86.2% 的留学回国人员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独立性强，因而对于要加入的欧美同学会组织的要求也较高。如果入会后达不到预期效果，就会对组织日渐疏远。三是留学回国人员事业心强。这些人一般都是单位骨干，有创新创业的干劲，日常工作较忙，很难抽出时间参与欧美同学会组织的活动，因而也很难建立对欧美同学会的归属感。

#### （四）组织管理人才缺乏影响服务活动质量 社团的专业化服务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人才



是“社团内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sup>[9]</sup>，也是社团服务取得成效的关键。欧美同学会秘书处作为负责组织日常运营的执行机构，包括对会员的管理和服务，但由于存在人才短板，致使服务效果不太理想。一方面，留学回国人员作为高知群体，对服务质量的期待较高，需要专业的团队来进行组织和策划。另一方面，秘书处的工作水平与组织开展高质量服务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秘书处组建之初，其人员大多是从其他部门和岗位转调而来，缺乏相关工作经验，对他们而言，面向留学回国人员组织高质量服务活动是一个大挑战。

#### 四、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体系优化的路径

为提升欧美同学会组织服务效能，可从结构、机制、能力、文化四个方面着力：结构是机制运行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机制的运行而产生效能；机制是将系统的诸要素组合联结起来发挥作用的一种具体方式；能力则是主体实现组织目标所必备的要素，也可以将能力看作达致效能的中介机制；文化主要体现为组织所倡导的价值观。

##### （一）完善欧美同学会的组织结构

任何组织都具有某种架构形式，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和任务，良好的结构设置是组织效能生成的前提，虽然“组织结构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sup>[10]</sup>，但是，“组织的设计、结构或行为要反映任务环境的变化”<sup>[11]</sup>。一是加强欧美同学会领导班子建设。当前欧美同学会的领导班子成员大多由体制内人员组成。这对那些有意愿参与服务的留学回国人员形成了障碍。因此，要坚持“结构优化、兼顾体制内外”的原则，尽可能吸纳体制外年轻有为的优秀留学回国人员进入班子，或者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从体制外进行选拔，从而优化欧美同学会的领导班子结构，提升欧美同学会的开放度。二是充实欧美同学会秘书处力量。从社团管理与运营的角度看，需要充实欧美同学会的专业化管理人才。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选拔优秀的社团管理人才、社会工作人才进入秘书处，

充实秘书处的管理队伍；同时，与专业社会组织合作，将秘书处的相关服务工作交由专业社会组织负责，借助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人才力量，提升秘书处的整体管理和服务水平。三是发挥欧美同学会专委会作用。不断拓展专委会的涵盖领域，丰富专委会的类别，强化专委会的开放性和代表性。同时，专委会要紧跟时代步伐，围绕国家战略、社会热点、领域前沿开展活动，扩大影响力。

##### （二）优化欧美同学会的工作机制

工作机制作为结构与效能之间的中介，起到效能“转换器”的作用，这也是欧美同学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一是优化轮值工作制度。目前，欧美同学会的轮值工作主要是在领导班子成员（如会长会和理事会成员）和理事中进行，轮值工作的范围比较小，可以考虑将轮值工作进一步延伸至欧美同学会的普通会员，为每个会员发挥个人专长、展示自我才能提供平台和机会，从而激发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健全会员入会与联系机制。针对会员覆盖面不足的问题，要加大会员纳新工作推进力度，将纳新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内容进行部署和落实，主动对接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的留学回国人员，尽可能将符合条件并愿意入会的留学回国人员吸纳进组织。欧美同学会老会员要主动对接和联系所在单位留学回国新人，为他们加入欧美同学会牵线搭桥。针对会员联系不太紧密的问题，要拓展联系人的范围，建立会长会、理事会成员以及秘书处工作人员联系会员制度。同时，不同省市欧美同学会之间、同一省市内部各组织之间，以及欧美同学会与其他组织机构之间都可以通过跨域、跨界互动建立会员之间的联系，进行感情交流和思想碰撞。三是建立需求导向的服务机制。从供需契合的角度，在开展活动或提供服务之前，可以通过问卷调查、集中座谈、个别走访等方式广泛征求留学回国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需求清单，以类别化、差异化的方式进行靶向服务，实现从输入式供给向诱导式服务供给

转变,提升服务精准度和匹配度。鉴于欧美同学会秘书处人手有限,可以采用服务外包的形式,将相关服务(如“留学回国人员之家”的运营)交由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来负责,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更加贴近服务对象的需求。四是完善绩效考评机制。绩效考评是检验组织工作成效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健全对欧美同学会服务工作的常态化考核机制,将留学回国人员的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提升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定期对欧美同学会的服务工作进行评估。可以由欧美同学会总会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统一评估,形成评估报告,给出不同等次。注重考评结果的使用和转化,考评结果既可以作为评比表彰的依据,也可以作为下一年度申请经费的参考,从而使欧美同学会的工作更加科学有效。

### (三) 加强欧美同学会能力建设

组织理论认为,“人作为组织的重要资源之一,对于组织目标的实现是极为关键的”<sup>[12]</sup>。对于欧美同学会来说,人的因素主要表现为领导班子履职能力与会员参与能力的提升。由于欧美同学会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等都是兼职担任,平时工作繁忙,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加强领导班子履职能力建设。一是加强领导班子集中培训学习。要通过集中培训、个人自学等途径加强领导班子成员对政治理论,以及社团组织、欧美同学会历史等相关知识的学习。二是加强领导班子互学互鉴。各地各级欧美同学会领导班子要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三是加强领导班子履职考核。要对欧美同学会领导班子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检视,并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思路和措施。同时,要提升欧美同学会会员社会参与能力,主要表现为参政议政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引领带动能力等。一是提升会员的参政议政能力。要积极为留学回国人员参政议政搭建平台,通过举办咨政建言专题培训班等途径,提升他们的咨政建言能力。二

是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要利用留学回国人员的优势,积极组织会员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使他们在参与服务过程中,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三是提升引领带动能力。欧美同学会要给每位会员提供展示自我能力的平台和机会,会员也要通过积极参与活动等提升组织发动能力,从而影响和带动更多的留学回国人员参与进来。

### (四) 打造欧美同学会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作为“形成和维持组织认同的符号系统”<sup>[13]</sup>,体现了组织的价值理念与指导思想。这些“符号通过塑造我们赋予客体或活动的意义,而发挥它们的作用”<sup>[14]</sup>。欧美同学会的组织文化主要体现为价值引领、愿景认同与“家文化”方面。一是强化欧美同学会的价值引领。价值引领主要通过组织符号、制度文本、故事文本的宣传来实现。欧美同学会会徽、会歌都是重要的组织标识,蕴含着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要加大对组织符号的传播力度,通过媒体宣传、专题学习、讲座培训等方式加强会员对组织标识的认知和理解。要深入挖掘、整理不同时期留学报国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并进行大力宣传,使广大会员在学习中受到感染和熏陶,产生思想上的共鸣,从而坚定留学报国信念,坚守爱国情怀,升华思想境界。二是提升留学回国人员的愿景认同。愿景是组织对自身未来发展所期望实现的愿望与景象,“是将组织成员凝聚在一起共同奋斗的价值信念体系”<sup>[15]</sup>。愿景对应组织内驱力层面,具有认同取向特征,要通过制定由会员充分参与的欧美同学会发展规划,吸纳优秀会员进入理事会和秘书处等手段,提升会员的参与感、体验感与认同感。三是打造欧美同学会的“家文化”。打造“温暖之家”,让留学人员回国后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是成立欧美同学会的一个重要初衷。首先,加强载体建设。要尽可能推进各级“留学回国人员之家”全覆盖,为留学回国人员提供一个实体的“家”,方便广大会员聚会交流。其次,开展多样化活动。开展活

动是增强组织凝聚力、形成组织归属感的重要手段。要以留学回国人员之家为载体,组织策划贴近留学回国人员需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形成活动品牌,从而达到以活动促凝聚、以交流促融入的目的。最后,提供关心关爱服务。欧美同学会要为一一些融入困难或需要帮助的新会员及时提供心理疏导、困难帮扶等关爱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 参考文献:

- [1] 欧文. 强化组织保障 开启新的征程 [J]. 留学生, 2020 (23): 52.
- [2] 陈晓红, 于文龙. 省级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的组织建设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1): 46.
- [3] 长三角成中国留学生归国首选就业地 [EB/OL]. (2024-08-22). [http://www.wrsa.net/1000583/2024/08-22/content\\_42539453.htm](http://www.wrsa.net/1000583/2024/08-22/content_42539453.htm).
- [4][11] 汤普森. 行动中的组织: 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 [M]. 敬义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4、187.
- [5]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 打造人才引领机制 建好留学报国人才库 [J]. 留学生, 2022(13): 59-60.
- [6] 钱海梅, 孟懿. “枢纽型”组织: 欧美同学会的转型发展 [J]. 海归学人, 2016(5): 9.
- [7] 蓝志勇. 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23.
- [8][14] 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 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 [M]. 姚伟, 王黎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191、69.
- [9] 徐顽强, 史晟洁, 张红方. 供给侧改革下科技社团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21): 119.
- [10] 斯科特, 杰拉尔德. 组织理论: 理性、自然与开放的系统 [M]. 高俊山,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67.
- [12] 李友梅. 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 [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157.
- [13] 丁越兰. 组织支持氛围、组织文化认同、工作自主性对情绪工作的影响研究 [D].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2018: 22.
- [15] 张欢. 服务型社会组织愿景与绩效的多重因果逻辑关联研究——基于全国百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申报单位的分析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 147.

责任编辑: 吉强

## 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角色转换与赋能机制研究

程曼晴

**摘要:** 依托数字平台就业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 凭借其空间流动性与渗透性优势, 可形成“流动性治理资源”。这使得新就业群体从基层治理对象向基层治理主体转换成为可能。从对象到主体的角色转换遵循“服务接受者—信息提供者—治理协作者—规则共创者”的路径展开, 并通过制度嵌入机制、技术适配机制、激励相容机制、能力培育机制进行赋能, 从而更好地将新就业群体的职业流动性转化为治理效能, 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提供新动力。

**关键词:** 新就业群体; 基层治理; 网格化治理; 流动性治理资源

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 中国社会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也随之加速转型。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格化治理通过将基层社会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 将人、地、物、事、组织纳入网格管理和服务, 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信息化和协同化。

当前, 网格化治理正从传统的“控制型管理”转向“服务型治理”, 其职能重心也从“维稳职能”转向“自治职能”。然而, 网格化治理在运行过程中面临多重困境。一是数据孤岛与信息壁垒导致治理盲区持续存在, 部门之间、部门与社区之间的割裂使安全隐患等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多地探索推行的“警网合一”“民政网合一”“城管网合一”“人社网合一”等跨部门数据整合与共享不

充分, 人员未实现统一调度、权限未完成系统整合、流程未构建协同闭环。二是参与渠道单一制约治理活力。居民反馈仍依赖传统线下投诉与政务热线, 虽有微信网格群但多为单向通知, 而老龄化群体对数字工具的应用障碍进一步加剧参与失衡。三是任务分配的科学性需进一步提升。在常态化巡查服务已趋饱和的情况下, 各类突发、临时任务因需要跨部门协调核实而耗时费力, 进一步挤占网格员投入人口管理、事件处置等核心职能的时间与精力。四是治理资源配置失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 单个网格常覆盖数千居民, 但专职网格员普遍配置不足。这种结构性矛盾催生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悖论——尽管技术设备不断升级, 人力短缺却导致精细化管理难

收稿日期: 2025-09-04

作者简介: 程曼晴, 厦门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两企三新”党建、基层组织建设。



以落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效能瓶颈，恰恰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提供了现实切入点。这一伴随平台经济兴起、依托数字平台灵活就业的庞大群体，以其独特的流动性、渗透性和即时性特征，正成为城市空间中不可或缺的移动节点，日益成为协同治理的共建力量。

### 一、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

#### （一）回应社会发展挑战的战略需要

当新兴职业形态与传统就业模式并存时，政府需通过为新兴业态从业者构建清晰的劳动身份认同，保障其法定权益不受侵害，从而弥合传统劳动关系与现代灵活就业形态之间的制度鸿沟，缓解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对立与分配不公，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劳动者，巩固社会和谐基石。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层面，推动这一角色转换顺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革命的内在需要，有助于突破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静态框架，形成人力资源随市场需求动态调整、高效流转的良性循环。同时，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体系转型、技术迭代对就业结构的冲击，新就业形态为不同年龄层、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提供了适应性更强的职业通道。这种弹性化就业模式既是对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也是应对人口红利消退的主动作为。主动推进新就业群体角色重构能够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与韧性，为国家在复杂变迁中保持发展动能提供新的治理路径，彰显了国家治理体系系统性回应社会发展挑战的战略前瞻性。

#### （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

在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当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被赋予“移动网格员”的新角色时，他们可凭借高频率、广覆盖的职业特性形成动态治理网络，其天然的空间穿透力可弥合传统网格化管理的静态盲区，使隐蔽性、突发性民生问题能被及时发现。政策宣传、隐患上报等治理行为能够突破行政层级的时空限制，从而有效地延伸

基层治理触角。在增强社区服务供给方面，通过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公共服务传导链条，使其职业行为与治理职能耦合共生——既作为“移动探头”精准识别服务缺口，又以“毛细血管”功能实现服务资源的精准滴灌，还可通过社区议事协商将分散的社会需求转化为精准的服务项目。就针对老年群体等特殊对象的代购、应急帮扶等“微服务”而言，该群体能够以“顺路顺手”的轻量化参与方式，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益。同时，通过建立平台企业履约责任与社区治理责任的传导机制，如快递网点变身便民服务站的创新实践，将市场资源转化为治理资源，可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履责、从业者参与、居民受益的共建共治共享生态。

#### （三）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的时代需要

新就业群体规模庞大、流动性强、覆盖面广，其劳动关系模糊、权益保障不足及职业不稳定等现实状况易衍生社会风险，他们若长期游离于组织体系之外，可能削弱党在新兴领域的群众基础。通过组织嵌入与政治吸纳，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将党员培育为业务骨干，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基层治理共同体，有助于党组织在平台经济等新领域扩大政治引领力。在新就业群体中拓展党组织网络、强化阵地建设，并以治理实践为载体实现价值认同塑造，可有效防范治理盲区衍生的政治风险，确保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同心同向，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党组织主动进入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场景与生活空间，通过搭建数字化诉求表达平台与制度化议事协商渠道，将新就业群体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伙伴，有助于增强党组织与社会的互动，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 二、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角色转换

#### （一）角色转换的基础

新就业群体所具备的“流动性”衍生出“流动性治理资源”，这成为该群体从基层治理对象转换为基层治理主体的基础。这里的“流动性”并



非泛指新就业群体所具有的高职业流动率特征，而是特指其职业行为中蕴含的高频社会连接性。传统社会基层治理存在的“信息孤岛”“响应滞后”等问题，正源于静态、封闭的管理模式难以有效捕捉和利用社会运行中弥散的信息流。平台经济的组织方式使这一流动性在规模、密度和数字化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使得这种潜在的资源形态被高效识别、组织和利用。

空间穿透力、信息触达力与情景信任力三维联动，共同架构起流动性治理资源的禀赋体系，将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场景转化为治理场景，使流动性变为治理力量，为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转换奠定基础。流动性治理资源，源于职业行为天然形成的空间穿透力。空间穿透力凭借全天候、高密度的城市空间覆盖性，可打破传统治理中“固定网格”的物理阻隔，使治理触角延伸至城市毛细血管末梢，使城市街巷成为可观测的治理文本。与之协同的是信息触达力。相较于静态治理主体依赖计划性巡查与层级上报，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作为城市的“移动传感器”，在随机配送、运输中凭借订单指令深入住宅区、商业综合体等封闭场域，无意识完成对社区隐患、民情波动的实时捕捉，填补了行政力量难以企及的治理缝隙。情景信任力则源于高频次、场景化的社区互动中积累的“职业性微信任”。他们通过与居民、商户的日常接触，在非正式交往中形成低门槛、高渗透优势的社会关系弱连接网络，消解了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戒备。即使非接触配送模式削弱了这种连接，但快递员、外卖骑手在送货至家门口、写字楼、学校等多元场景时，依然构成了社区网络中最活跃的移动节点。凭借这种弱连接，他们在提供公共服务信息或上报社区异常方面，具有更低的互动门槛和更高的信息接受度。其治理优势不在于建立私人关系，而是能够利用这种职业身份自带的、浅层的但广泛的社会接触，成为传导政策信息、发现社区异常甚至感知民情动态的低阻力通道。

## （二）角色转换的路径

新就业群体的角色转换呈现“服务接受者—信息提供者—治理协作者—规则共创者”四个阶段的演进路径，体现了其治理主体性不断强化的动态轨迹。

这一路径始于其作为“服务接受者”的初始阶段。此时，新就业群体作为基层治理的对象存在，与城市黏性较弱，缺乏参与治理的渠道和意识，且主要依赖社区提供一些基础公共服务，如休息、充电、社保办理等。其空间流动性尚未转化为治理资源，角色特征体现为单向度的需求满足与权益主张。在此阶段，需从“管理导向”转向“服务导向”，通过解决他们的生存难点建立情感归属，以暖心行动打破隔阂，使其初步形成对城市治理体系的认同，从而为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打下基础。

随着归属感增强，新就业群体凭借“门清、人熟、覆盖广”的职业优势，成为“信息提供者”。通过数字平台赋能与简易上报机制，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借助实时工作数据反馈和行为轨迹记录，可将日常流动中捕捉的隐患信息转化为治理数据流。在此阶段，他们充当发现城市隐患的“移动探头”和民情传递的“传感器”，其动态工作数据可成为治理部门研判公共安全的重要信息源。此时，该群体的参与虽仍以碎片化、任务式反馈为主，但技术赋能与轻量化机制能显著降低参与门槛。依托数字工具对分散信息的整合，可推动这一群体从服务受益者转变为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

当信息反馈机制常态化后，新就业群体可成为“治理协作者”。其关键在于制度性身份的赋予与责任共担机制的形成。在这一阶段，他们可协同参与基层治理。例如，他们借助自身的空间穿透力与社区交互网络，以兼职网格员、志愿队员等身份，嵌入基层治理环节，常态化参与平安巡防、应急响应、矛盾调解等工作。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组织化赋权与多元身份整合，重点在于通过

身份赋予（如担任先锋观察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等）和党组织培育（如行业党委、流动党员党支部进行培养），将松散个体转化为治理行动单元。

在上述角色转换完成后，新就业群体可进一步成为“规则共创者”。在此阶段，可通过将行业、企业、属地联合培养的党员纳入政策咨询体系，使他们成为基层治理规则共创者。例如，邀请骑手参与商圈服务标准制定，推动外卖员参与社区治理规则调整。此时，该群体的职业经验可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智慧来源，有助于增强治理规则的适应性与有效性，群体的诉求也能够推动行业规范与公共政策不断优化。

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性是其参与治理的初始资源，他们对城市融入的需求超越经济层面，延伸至尊严与话语权层面。参与是一个动态的，具有生成性的光谱式进程。演进起点是新就业群体作为公共服务与政策规制的接受者，是治理对象；演进终点是其成为治理的参与主体，作为规则共创者与协同治理的伙伴，深度嵌入基层治理的决策与行动网络。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四个阶段的角色转换，是基层治理范式从“单向管控”向“双向赋能”再向“共生共创”的深化过程。

### （三）角色转换面临的障碍

#### 1. 制度性障碍：权责边界模糊

由于缺乏政策法规层面的明确界定，该群体参与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薄弱，其作为流动网格员的权责边界处于模糊地带。他们既难以获得社区准入的身份认证，又因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导致治理责任在平台与政府之间悬置。现有政策多聚焦权益保障，对其治理赋能的顶层设计薄弱，参与渠道、责任边界及权利保障缺乏系统性规范，从而导致新就业群体在治理协作中陷入“有实践却无依据”的尴尬境地。

#### 2. 能力性障碍：治理技能不足

新就业群体多集中于体力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学历层次、专业技能与基层治理涉及的政策理解、矛盾调解、应急处理、议事协商等所需的认

知框架与行动能力存在显著差距。同时，该群体数字素养较低，使用数字治理工具存在困难。例如，部分从业者难以适应复杂的数字工具操作页面，对平台操作流程、数据采集边界、隐私安全规范等认知不足，从而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 3. 激励性障碍：短期物质激励与长期发展需求错配

在物质方面，当前激励措施多依赖象征性荣誉表彰，但在计件工资制的生存逻辑面前，难以对冲参与治理活动的时间损耗与收入减损，更无力触及职业保障、收入稳定等深层次安全需求，从而导致激励成为边际效用递减的浅层次刺激。在精神方面，典型选树等符号化认可虽具有情感动员效果，却因缺乏制度性身份赋权，未能转化为更深层的职业尊严认同。新就业群体的核心诉求在于职业发展空间的拓展与社会认同的提升，而现有治理参与机制鲜少与其长期发展需求挂钩。例如，他们作为流动网格员参与治理的公共服务贡献，未能与落户积分、子女教育等城市融入资源进行兑换。这最终会导致该群体把参与基层治理视为额外负担，不愿参与相关事务。

### 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赋能机制

#### （一）制度嵌入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sup>[1]</sup>通过建立权责清单，为群体参与治理提供合法性锚点与行动坐标系——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功能互补与责任共担，形成有机协同的治理共同体。

一是党委承担顶层设计与政治引领职责。通过组织部门牵头制定新就业群体党建总体规划，明确行业党委的属地管理责任，构建“工委统筹指导、行业具体负责、属地兜底管理”的工作格局。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组织嵌入，成立功能型

党支部,推行党员“亮身份”活动,将流动党员纳入网格化管理,并联合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提供技能培训与权益保障,破解新就业群体“原子化”困境。二是政府部门履行资源整合与机制保障职责。社会工作、住建、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建立问题的“发现—处置—反馈—激励”闭环流程,如整合网格系统,赋予新就业群体相关人员“特聘网格员”身份,明确其上报市容市貌、公共设施等问题的权责;人社、司法等部门配套权益保障政策,依托“红色驿站”提供法律咨询、急救服务,并建立“积分银行”兑换社保优惠等长效激励。同时,政府需主导开发轻量化技术平台,打通数据壁垒,确保隐患信息实时分派至职能部门处置。其中,人社部门牵头制定《移动网格员履职指引》等相关制度,以场景化功能定位明晰柔性职责边界,聚焦隐患动态巡查、民情实时传递等非强制性任务,严格区别于行政执法主体的刚性职责,从源头上规避责任泛化风险;实施责任边界的双重锁定,即正向以“履职清单”细化信息上报、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三级响应标准,划定服务建议、事件上报、协同处置的行动阈值;反向则设置“责任豁免条款”,对专业处置范畴外的事项免除连带责任,防范治理参与异化为风险转嫁通道。三是社会力量包括平台企业、行业协会及社区组织等承担相应职责。企业承担源头动员责任,平台需将员工参与基层治理纳入考核,提供接单时间补偿,并配以“积分双兑”机制(员工积分兑服务、企业积分兑信用评级);社区通过“网格议事厅”“兼职网格员”等载体,组织新就业群体参与矛盾调解、文明宣传,落实“1名专职网格员帮带N名移动网格员”的传帮带机制;行业协会制定清单,规范参与基层治理的行为边界;商会协会开发治理技能认证标准;社工机构提供矛盾调解实训;媒体营造尊重新就业群体劳动价值的舆论氛围。

建立权责清单的目标在于以“责任啮合”替代“权责转移”——党委破解身份困境、政府提

供制度容器、社会注入能力资本、公众构建认同场域,在制度嵌入中将原子化劳动者锻造成基层治理的韧性节点。在权责清单基础上,聚焦主体责任,构建全链条责任约束与效能转化体系,进一步筑牢该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合法性与实效性根基。一方面,对新就业群体履行治理职责的过程实施监督,通过动态考核其上报信息的准确性、事件响应的时效性(如“上报—处置—反馈”的闭环追踪),防范角色虚化或责任转嫁风险;另一方面,监督职能部门对群体诉求与上报事件的处置效能,建立部门响应率、问题解决率的量化考核指标,将其纳入行政效能督查体系,倒逼责任主体履职尽责。这种双向监督既避免新就业群体因权责模糊陷入“无限责任”的陷阱,又防止行政部门将其视为治理压力的缓冲带。

## (二) 技术适配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sup>[2]</sup>。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需要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sup>[3]</sup>。在实践中,可开发嵌入配送平台的轻量化治理模块或开发适配移动场景的微应用组件,将骑手的移动轨迹动态映射至城市网格,配送终端在订单导航界面自然叠加隐患上报、民情反馈的交互入口,运用语音指令、震动提示等非干扰设计,使其在履行配送职责时同步触发治理行为。以算法调度为底层框架,通过时空匹配模型自动识别骑手位置与责任网格的重叠区域,生成“最优治理路径”建议,实现劳动工具与治理媒介的融合。当骑手通过移动端上报事件时,系统自动调用图像识别技术对问题属性进行分类(如井盖破损归为市政类),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精准定位,并基于事件紧急程度启动智能分拨协议,同步触发限时处置机制。处置结果通过区块链存证后反馈至上报者终端,形成“发现—处置—验证—激励”的流程。这一过



程中,骑手的治理贡献被量化为动态积分,积分系统与城市服务资源库(如职业技能课程等)实现智能匹配,通过需求预测模型推送个性化激励选项。通过分析上报数据的时空分布特征,运用边缘计算技术将骑手轨迹数据实时转化为“社区热力图”,识别城市管理盲区与风险规律。例如,当某路段井盖位移事件频发时,算法在配送路径规划中自动嵌入“治理盲区巡查权重”,系统不仅预警维修需求,更会优化骑手配送路径,使其主动覆盖隐患高发区域,实现治理需求与劳动轨迹的智能互构。

### (三) 激励相容机制

激励相容机制的目标在于构建治理贡献与个体发展的价值同构体——通过价值认同、发展赋能、政治吸纳与数字协同等多重激励,将治理贡献转化为可感知、可持续的个体发展资本,将公共责任内化为发展理性驱动的自觉实践。价值认同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奖励,通过赋予相应身份(如流动党员担任网格协理员)、荣誉表彰(如授予“治理先锋”称号)与强化社会认同(如社区公示贡献榜)等,构建“治理付出—社会尊重”的心理契约,弥合职业流动性衍生的身份裂隙。发展赋能聚焦职业资本与治理能力的共生转化:一方面,建立“技能银行”机制,将隐患上报、矛盾调解等治理行为量化为技能积分存入区块链存证的“人力资本账户”,用以分段兑换数据分析、应急救援等高价值培训资源,或者兑换职业技能认证学时等,将碎片化参与转化为可携带的制度化学资产,推动其从体力劳动者向技术型治理者转化;另一方面,设计“治理贡献—职业晋升”的传导链条,如将积分作为平台企业晋升站长、队长的指标,或联动金融机构为高积分者提供低息创业贷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的实效。”<sup>[4]</sup>可进一步采取政治吸纳方式,避免因激励悬浮于物质层面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打通从治理效能到话语权的兑换通道。一方面,建立阶梯式身份晋升机制,将新就业群体在网格巡查等实践中的效能表现量化为政治信用积分,作为其进入行业协商组织、基层议事平台甚至参选“两代表一委员”的准入凭证,使其流动性经验提升为制度调适的实证依据;另一方面,建立治理赋权与规则共商的互动机制,例如,骑手通过持续上报某类公共问题,形成数据信用后,可被吸纳参与市政维护标准的修订协商,或受邀加入社区治理智库小组,在政策制定环节注入职业场景的实践智慧。骑手的平安巡防时长可转化为入党积极分子考察权重,群团组织推优资格与其上报事件处置率挂钩,使组织生活与治理实践形成价值同构。同时,为避免平台企业将治理参与异化为算法获利工具,并避免政府将新就业群体视为低成本治理劳动力,可将平台企业算法与基层政府资源耦合,实现责任与权益的捆绑。一方面,通过协议让平台企业在劳动关系框架中内嵌治理参与权重。例如,在订单分配算法中加入“公共服务系数”——当骑手选择绕行上报井盖隐患时,系统自动补偿时间损耗,使治理行为脱离无偿奉献的窠臼而获得技术性支持。另一方面,推动基层政府开放权益转化接口。例如,将该群体参与网格巡查的时长认证为“社区服务时长”,可折算落户积分,或者将连续三年获评“先锋网格员”的履历作为优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使其治理贡献转化为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城市融入资本。

### (四) 能力培育机制

能力培育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赋能设计,将流动性职业特质转化为精细化治理能力,构建“技能适配—组织融入—实践淬炼—资源反哺”的闭环培育生态。要以技能适配破解职业场景与治理需求的技能断层问题。例如,开发模块化、场景化培训体系,构建沉浸式学习系统,设计“治理能力图谱”,将空间定位、风险识别、应

急响应等治理素养拆解为可量化指标,与骑手现有职业技能进行耦合训练,推动其从单一配送向“配送—治理”升级。要催发治理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建立“网格导师制”,选拔社区工作者、资深网格员与骑手结对,在联合巡查中实施“观察—协助—主导”的阶梯式培训,利用真实治理场景,如楼道堆积物协调等,完成经验传递与能力迁移。要推动形成资源支持与能力验证的互构。打通能力增值通道,实现职业认证转型。例如,大力推动人社部门增设“社区应急响应员”“流动网格协理员”等新职业工种,将矛盾调解、风险识别等治理技能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真正使骑手的治理实践转化为可迁移的职业资本。能力培育机制的目标是通过职业资本与治理资源的共生转化,使流动性不再是能力培育的障碍,而成为动态学习的载体,将治理思维深植于日常实践,

在行动中促进新就业群体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使其掌握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从而完成由“信息提供者”到“规则共创者”的角色转换。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0.
- [2] 习近平. 论科技自立自强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171.
- [3] 郭涛.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J]. 人民法治, 2019(3): 118.
- [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2.

责任编辑: 吉强



# 发挥知华友华的青年力量：新时代青年侨领、 侨青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研究

张 颖

**摘 要:**当前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加强华侨、归侨、侨眷代表人士工作,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为侨服务。随着老一辈华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批知识层次高、开拓能力强的新生代华侨开始走向台前。侨领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在维护侨胞权益、促进文化传承、支持祖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青年侨领统战工作,凝聚广大海外华侨思想共识,发挥他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青年侨领;青年华侨;统战工作;知华友华

## 一、文献分析与问题提出

华侨、归侨和侨眷是我国涉侨工作的特殊指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指出:“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海外华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与和平使者,也是维护和平、促进统一、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更是新时代知华友华力量中的核心群体。在目前学界研究的华侨华人专题中,华侨华人群体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一是历史学视角。此类研究关注华侨华人的历史发展、迁徙轨

迹、社区形成以及与母国和侨居地的历史互动等方面。庄国土在《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一文中,通过对16世纪末海外移民开端时期的人数估算,探讨了400年间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变化。潘能梅在《回顾与前瞻: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华侨华人研究综述》一文中研究了越南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及社会文化事业中的过去与现状。二是社会学视角。这类研究重点关注华侨华人的族群关系、社会融合、身份认同等问题。曾少聪在《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认同》一文中,通过探讨海外移民认同的多重面向,分析影响海外移民认同中华民族的各种因素。

收稿日期:2025-02-13

作者简介:张颖,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及相关统战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青联青年爱国统一战线理论重点课题“海外青年侨领、华侨代表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研究”(2023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三是经济学视角。这类研究关注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资本流动以及他们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冯润、陈仁、罗浩在《粤籍华侨华人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一文中,通过分析沿线国家粤籍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应充分发挥粤籍华侨华人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作用。四是政治学视角。这类研究聚焦华侨华人与政治制度、政策制定、国际关系,以及他们在侨居地和母国的政治参与等方面。许丰在《拉丁美洲华人侨团及其反“独”促统组织与活动研究》一文中,通过梳理拉美华人侨团的发展与类型,论述了反“独”促统类华人侨团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作用,以及在涉台侨务工作中的影响力。五是文化学视角。这类研究主要探讨华侨华人的宗教文化信仰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徐菁菁在《福建民间信仰在东南亚的传播分布及其与原乡的联结互动研究》一文中,将东南亚福建华人四大民间信仰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东南亚福建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和基本特性。陈云云、张羽在《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价值、有利条件与实践路径》一文中,指出海外侨胞是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由上可见,华侨华人研究已是学界密切关注且有研究基础的重要领域,但有关侨领及侨青代表人士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加强相关研究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 二、华侨、归侨、侨眷分布情况与发展特点

### (一) 华侨、归侨、侨眷现状分析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加强华侨、归侨、侨眷代表人士工作<sup>[1]</sup>。目前,海外侨胞总数逾 6000 万人,分布在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sup>[2]</sup>。历史上的老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北美地区。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的广东江门名声在外,华侨分布较广;拥有“中国华侨人数第一城”称号的福建泉州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出现了一批新侨,传统华侨主要聚集东南亚的分布趋势发生改变,呈现分布更广泛的特点,其中北美、欧洲、东南亚的华侨最为集中。从聚集区域来看,以发达国家为主;聚集方式则以留学、资产移民为主。华侨、归侨中的精英领袖和代表人士、专业人士等群体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力量。

### (二) 青年侨领、侨青代表人士基本情况分析

#### 1. 侨领及侨青代表人士的界定

何谓侨领?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精神,以及各级侨务部门开展的“华侨优秀代表表彰”等工作,可将“侨领”理解为,在不同历史时期致力于华侨华人事业,与祖国保持和谐交往关系,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华侨社团领袖。就历史而言,侨领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且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不同历史时期造就不同的侨领。新中国成立前与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老侨领和新侨领,他们虽有共性,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特征。就领域而言,侨领必定是在政界、商界、文化界等某一领域的精英人士。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不同领域的华侨先驱,如政界的何香凝、司徒美堂等,商界的陈嘉庚、陈芳、马应彪等,文化教育界的容闳、胡文虎等。就身份而言,侨领通常是华侨社团总会、华侨商会、归侨侨眷联谊会、海外校友会等各种侨团组织的理事长、主席、会长、副会长、副秘书长等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就影响力而言,中国历来存在以人格魅力感召人心、影响向背的现象,这在侨界亦不例外。影响力如何、服务精神怎样,一直是选择侨领的重要标准。华人社会的融洽相处、守望相助等都极大地取决于侨团领袖的凝聚力。侨领具有高于普通华侨的影响力,能带领侨团积极融入住在国,展示侨胞的良好形象。就关系而言,侨领通常与住在国当地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华侨的上层人士,多为经济实力强且有政治影响力的侨团领袖。

侨领不仅与住在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代表华侨群体的利益,推动华侨在当地的融入和发展;同时与祖国的涉侨部门密切配合,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促进中外交流与合作。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的活力和创造力在造福侨胞的同时,也让侨领日益重视与祖国的联系,爱国已成为侨领身份的重要标识。

何谓侨青代表人士?这特指改革开放后侨居海外或归国的新生代华侨精英,可以是新生代侨领,也可以是侨团、群团、联谊会中的优秀代表人士。总体来看,他们在政治上具有爱国性,在经济上具有引领性,在文化上具有认同性,是统战工作的重点团结对象。近年来,随着老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批高学历、能力强的华侨青年代表人士相继走上各大华侨社团的领导岗位,为华侨社会注入蓬勃活力。

## 2. 青年侨领及侨青代表人士的特点

一是年轻化且知识层次高。新侨主要指改革开放后旅居海外的群体。早期的留学生因国外生活与科研条件优越、就业机会多、社会福利好等,选择在国外定居或就业,进而成为新的华侨群体。随着中国崛起,华侨回国发展趋势明显。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超过八成的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我国正逐步形成国际人才环流趋势<sup>[3]</sup>。新归侨主要由高学历留学归国人员和经商务工人员构成,其创业模式呈现领域多元、层次高端等特点,分布在IT、互联网、金融、科研、半导体、新生物工程、新医药、贸易、高端制造、文化创意等领域。这一群体以其知识层次高、创新力强、见识广博等优势,成为归侨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简言之,新归侨是一群知识层次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眼光更独到、涉猎领域更广、行事更有魄力的精英一代。

二是从传统的“落叶归根”“落地生根”到新时代的“跨国流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海外老侨大多选择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他们白手起

家,靠着传统“三把刀”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即便在国外扎根也有着“落叶归根”的情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侨逐渐融入当地,落地生根。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部分华侨选择保留中国国籍,成为新侨一代。新侨中,尤其是侨三代、侨四代,基本都在国外接受基础教育和高层次教育。其中的侨领和代表人士通常也在西方或住在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西化程度较高并对住在国有较强认同感。良好的教育与相应的技能让新侨更快融入住在国,并在主流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新时代青年华侨并不单纯地追求“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而是具有跨国流动的明显特征。

三是参与政治,议政善为。近代以来,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逐渐形成及日益突出的重要性,华侨回国参政成为可能。1941年,华侨代表李介夫被聘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华侨参政议政提供了历史经验<sup>[4]</sup>。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政府支持华侨自主选择国籍。之后,很大一部分华侨选择住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华侨回国定居,成为归侨。为了更好地让归国华侨享有相关权利,自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开始,华侨代表改为在归国华侨中产生。为了探索和开拓海外华侨参政议政,2001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来自8个国家的9位海外华侨列席会议。截至2024年,共有85个国家、637位海外华侨代表列席政协大会<sup>[5]</sup>。2014年,广东省首次邀请在广东投资、工作、居住或祖籍在广东的10名华侨列席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创了华侨列席人大会议的先河<sup>[6]</sup>,这是华侨参政议政的新探索,也是将侨情民意汇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实践。

四是延续爱国爱乡传统,桑梓情重。作为各大侨团的领导者,侨领不仅具有较强的爱国情怀,而且在住在国的政治、经济领域颇具声望。在革命年代,老一辈华侨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第一线。在“爱国高于一切”的理念指引下,各地侨领将



分散的侨胞组织成强大的爱国统一团体。例如，侨领陈嘉庚联合华侨筹款募捐，出钱出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新生代侨领一直延续着爱国爱乡的传统，虽在住在国落地生根，但与家乡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尤其是其中的领袖精英，他们自觉背负起父辈和同胞们的期望，不仅从国外带来资金、技术、人才，而且引入先进的理念和经营管理方式，为祖国和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重大力量。

### 三、青年侨领及侨青代表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

#### （一）对新侨群体的认识不足、联系不紧

老侨领因历史背景、活动范围和组织形态的稳定性，有着权威的界定，对他们的划分标准相对清晰。陈嘉庚创业于南洋，以实业救国，将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结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司徒美堂积极投身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及新中国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容闳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首倡并促成近代中国第一代官费留美学生的派遣，开创中国海外留学先河，为中国近代教育探索写下重要篇章。而新侨代表人士更加多样化，除了侨领，还包括科技新贵、文化名人、Z世代网红、专业协会领袖等。他们的角色并非某一特定领域的单一呈现，而是交叉领域的复合体现。这些新情况导致对新侨群体认识不足、联系不紧的问题。一方面，对新侨领的界定仍不清晰，缺乏信息数据统计，导致侨领作用发挥不充分。同时，归侨数量持续增加，角色动态变化大，群体呈现高度异质化，除了科技精英、新生代创业者，还有银发归侨、技能劳工等类型，这些群体核心诉求不同，全面把握和精准区分面临困难。另一方面，在海外侨领的团结工作中，统战及侨务部门面对新情况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联系机制，联系侨领不够密切，甚至出现联系机制失效的情况。

#### （二）青年侨领的积极作用不同程度受到限制

青年侨领中不乏爱国人士，其中大部分愿意为祖国贡献力量。调研显示，许多青年侨领自发筹资举办联谊活动、组织网络视频会议，以各种方式向海外侨胞介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宣传重大会议精神等，但实际效果有限。多数情况下，爱国侨团内部的代表人士更加主动积极，但侨团外部的不少华侨却无动于衷，侨团内外不能同频共振，难以形成更大合力。同时，有些侨领频繁地与统战、涉侨部门沟通，但联系有余，实际作为却显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侨情较为复杂，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华侨群体内部在某些方面缺乏共识或不易采取统一行动，这也限制了侨领及代表人士作用的发挥。

#### （三）侨务工作创新仍有不足

在涉侨统战工作领域，传统的上门走访、座谈交友等方式是重要的联谊手段。然而，若过度依赖社团年会、节日慰问等形式，会致使交往模式趋于单一，进而出现Z世代侨领参与度不高的状况。在开展华侨投资者、归侨及侨眷的权益保障工作时，存在一定程度的保障工作碎片化现象。尽管能够主动关注侨胞利益，但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对于海外现实且复杂的生活与工作场景缺乏动态响应机制，在针对具体问题精准施策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工作体制尚不完善，有时会造成政策制定与侨胞实际需求不匹配的现象。此外，基层侨务工作目前尚无法满足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例如，基层队伍力量薄弱，存在人才断层现象，对当地侨情的掌握不够全面，难以与华侨代表人士建立有效联系。

### 四、青年侨领及侨青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创新路径

为了更好地团结这部分知华友华的核心力量，需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团结侨团、组建智库、发挥文教认同、完善立法等方面综合

推进。

### （一）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画出最大同心圆

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要团结侨领及华侨青年代表人士，必须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作用。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sup>[7]</sup>。增强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的自豪感、立志报国的使命感以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感。二是充分发挥侨领与侨青优势，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发挥青年侨领在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中的桥梁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充分发挥其融通中外的优势，让他们向世界展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其次，发挥青年侨领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华侨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新时代，海外侨胞更是祖国联系世界的桥梁纽带，能够为民族复兴作出重要贡献。最后，发挥青年侨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积极作用。青年侨领是文化交流的先锋，他们善用新媒体传播平台，用科技赋能文化传播，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应鼓励侨青群体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使命，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参与中国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三是重视华侨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着力打造具有引领性的侨青交流平台，社会组织可有效引导侨青从“自由人”转变为“组织人”，进而更有益于凝聚侨界人心、汇聚侨界力量。例如，归侨青年回国后面临“反向文化冲击”“再本土化”等诸多挑战。为使他们尽快适应国内社会文化环境，侨务部门应积极协助归侨筹建青年组织，明确此类组织的定位与发展方向，推动这类组织与商会、

侨联、妇联、青联、海外联谊会、慈善总会，以及世青会、侨青会、侨商总会、侨商青年会等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具有引领性的归侨青年工作、学习、联谊交流平台。同时，积极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创建“侨青创业园”，为青年华侨回国返乡创业做好服务工作。

### （二）重视老侨团，团结新侨团

海外侨团在帮助侨胞联络亲情乡谊、维护侨胞权益、提升侨胞形象、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宗旨、结构、影响力的区别，侨团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历史悠久，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祖国、住在国、华人社会中均享有盛名的老一辈爱国华侨开创的侨团组织。由于中国人移居东南亚时间久远，这一区域的百年侨团并非鲜见。第二类是成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一群事业有成，有积极作为的中青年组织发起的新侨团。第三类是一批以联谊交友、互惠互助为宗旨的中小侨团。这类侨团数量虽多，但规模较小，且不参与政治，通常在住在国和祖国的影响力较小。第四类则是以某一特定目的临时组建的侨团。这类侨团一般都在特定时期，因特定事项而临时组建。在统战及侨务工作中，应进一步做好新老侨团的工作，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作用。一是重视老侨团的传统优势。老一代侨团多为早期移居国外的华侨自发建立起来互助、联谊与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sup>[8]</sup>。它们多因历史和政治需要而诞生，是团体意志的体现，更是族群利益的代表。对内，通过上牵下联实现了华人社会的阶层融合，巩固了中华文化的根性；对外，通过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争取，维护华社利益，强化族群意识。对于国内外享有良好声誉的老侨团，要做好“固本培根”的工作。同时，要破解乡情纽带在数字化时代式微、财务依赖捐赠等所导致的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帮助其做好代际传承，注重培养其中的青年代表人士，实现从“守护传统”到“传统创新”的价值观重塑。二是整合新侨团资源优势。新侨领袖



是一群事业有成、政治诉求强、在住在国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人士。新侨团是连接中外的重要“活性节点”，在科技、文化等领域作用显著，走出了一条国际化与外向型发展之路。这些“适应社会变动，基于共同兴趣的志愿侨团，正超越着地域、方言、亲属关系，甚至种族关系而迅速成长”<sup>[9]</sup>，逐步成为华人社会的主导力量。侨务部门要有效构建三级联动平台，以高效的数字平台、服务性的线下新侨空间、具有联络作用的国际侨胞节点，激活核心资源的活力，以组织、资金与技术等途径实现新侨资源的可持续性，实现“人才回归—技术落地—产业升级—文化输出”的价值闭环。

#### （三）组建侨界青年精英智库，充分发挥侨智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不仅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也折射出国家人才发展的综合实力。在打造智库体系中，青年华侨是必不可少的人才。组建侨界青年精英智库是凝聚新生代侨力、引领驱动创新的战略举措。要有效聚焦侨青特质，以不同准入机制打造核心智囊团、专项课题组、全球观察员等智库角色。明确不同智库角色在国内的价值定位，以激励项目形成合作的可持续性。一是增强优秀侨青智库成员的政治身份认同。政治身份是提升其影响力、强化其国家认同的关键举措。应通过法定程序推荐更多优秀归侨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协商提名为政协委员，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功、在人大、政协领域中建言的重要作用。让更多侨界特邀委员和代表列席两会，参与地方两会提案联署，积极发挥议政建言作用。二是成立各级党委职能部门共享“智库资源数据库”，做好人才智库的电子档案与文件档案的双重管理。将侨青智库打造为跨境智慧的转化器、新生代侨领的孵化器、双向开放的加速器，真正激活侨界青年持续赋能祖国发展与全球共赢的双向效应。

#### （四）发挥华文教育作用，促进文化认同

华文教育是增进海外侨胞中华文化认同的有

效方式。秉持民间性、自主性、市场化原则的华文教育，在强调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文化渊源、宣传中华民族共有价值观以及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要重构华文教育的内核，推动其从语言培训到文明根系培育转变，以“根”“祖”“脉”大文化概念为目标，破解青年一代“香蕉人”困局，增进侨青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认同。借助新媒体平台，培养华文教育领军人物；拓宽民间渠道，在东南亚侨胞聚集之地，打造“未来华校”样板；动员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支持华文教育，构建华文教育从语言习得到价值认同的发展新格局。

#### （五）坚持爱侨恤侨，保障侨胞利益

坚持将华侨、归侨、侨眷的利益放在心上，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华侨、归侨、侨眷。对于侨胞中的科创精英，精准对接国家人才战略，以科研自由港政策满足其跨境研发便利，保护好其知识产权。对于银发归侨，要结合医养服务、跨境医疗结算等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海外，要以法律为盾做好海外护侨工作，加大依法护侨的工作力度，要建立全球侨胞安全动态数据库，预警高风险区域，要继续发挥“华助中心”在关爱帮扶海外侨胞中的积极作用，共创和谐侨社建设。此外，完善涉侨政策法规，进一步维护广大侨胞正当合法权益。随着国内社会发展变迁、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当前的涉侨法规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应聚焦侨胞核心利益，结合新时代的新发展趋势，适时革新理念、更新政策，应对国际规则变化，构建新时代侨胞权益保护与跨境治理相融合的政策法规生态体系。

#### （六）利义并举，构建侨界新儒商精神

新儒商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与现代商业的职业操守的完美结合者。有学者从精神人文主义维度阐述了其核心要义，即“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强调以超越个人功利的终极目标来实现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体现了立业与做人的修为与品格。在海外统战工作中，要激发华侨的道义情结，打

造中华民族的“诚信忠恕”之道，构建新时代海外儒商的精神旗帜。要融合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文明，以伦理理性化、责任科技化、人文全球化的理念向世界传递华商精神，形成兼具文化根脉与全球竞争力的价值体系。要团结引导青年侨领发挥新儒商的示范带头作用，以“创新的锐度”发展好自身事业，以“伦理的厚度”投身祖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文明的广度”推动祖国公共治理的长足发展、充分参与全球治理。

### 五、结语

新时代，统一战线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发生重大变化，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华侨群体，尤其是其中的青年侨领及代表人士是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海外统战工作中，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其中，要以海外华侨为核心工作对象，以华侨为桥，以侨青为重，编织华人联系网，辐射至更大华人朋友圈，进而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

### 参考文献：

- [1][7]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0、20.
- [2]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2023-04-26).[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04/t20230426\\_429042.html](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04/t20230426_429042.html).
- [3]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23)[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4：46.
- [4] 张赛群. 新中国华侨参政议政问题探讨[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3.
- [5] 杨木森. 凝聚智慧力量 致力民族复兴——75年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工作简要回顾[EB/OL].(2024-09-24).  
<http://www.rmzxb.com.cn/c/2024-09-24/3609670.shtml>.
- [6] 辛均庆. 在粤华侨首次列席省人代会[N]. 南方日报，2014-01-18(2).
- [8] 谢成佳.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团政党卷[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1.
- [9] 刘权. 广东华侨华人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313.

责任编辑：吉强

# 吴贻芳与统一战线

周和平

**摘要:**吴贻芳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伟大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每个历史关头,吴贻芳从来不以个人利益得失来衡量是非曲直,而是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厚生”作为一生的信仰,为他人谋福祉,为国家、社会作贡献。

**关键词:**吴贻芳;统一战线;教育事业;国际交流

作为著名教育家,吴贻芳的社会活动与她的教育生涯紧密相连。她投身的事业,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密不可分,其卓越的社会活动才能,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影响。

## 一、抗战期间积极参加政治社会活动

1928年,吴贻芳回国担任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女大)校长。她秉持“厚生”精神,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不懈的实践探索,引领金女大脱颖而出。从解决学校重新登记注册引起的风波,到顶住两次并校压力,再到战时西迁与复校,吴贻芳始终统筹教学、维持校务,并带领师生投身抗日救亡。其间,她多次到美国、加拿大去演讲,介绍中国的女子教育和妇女情况。1933年,她参加“国外宣教事业访问团”在美国多个城市演讲,时间长达三个月。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向国外介绍中国教育、中国妇女的情况。康本德夫人和蔡路得女士认为,吴贻芳“积极参与国内、

国外其他各种组织的活动。凡是熟识吴博士的人都意识到,金陵(女大)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在最为困难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实的领导。金陵(女大)在全中国所获得的高度的重视,也表达了人们对金陵校长的尊重的感情”<sup>[1]</sup>。

全面抗战爆发时,吴贻芳担任金女大校长已近十年,蜚声中外,堪称民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她投身全民抗战,活跃于政治舞台,影响广泛。七七事变前夕,她应国民党政府之邀参加了庐山座谈会,与会者皆为胡适、傅斯年、张君勱等社会贤达、社会名流。从座谈会到1937年12月初离宁的近四个月里,面对日寇的嚣张气焰,吴贻芳表现出勇赴国难的大无畏气概,毫无惧色。除了忙于金女大西迁事宜,她还出任宋美龄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执行委员,并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推动国统区妇女团结抗日。1938年3月,邓颖超、

收稿日期:2025-06-26

作者简介:周和平,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

何香凝等183位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负责抚养遭受战火灾难流落街头的儿童，吴贻芳任常务理事，做了大量工作。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合作的产物，吴贻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参政会参政员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吴贻芳作为无党派人士也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她应邀致辞，认为“要在抗战期间，养成民主政治习惯，永久团结，使民族永久生存，国运日臻强盛”。从第二届一次大会以后，国民参政会实行了主席团制，吴贻芳当选为五人主席之一。1942年，因“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未能参加会议，吴贻芳深感遗憾和痛心，认为大敌当前而兄弟阋墙，不利于御外侮。在参政会中，吴贻芳以端庄持重的风度斡旋调停，既讲策略，亦有锋芒。1947年，“五二〇”学生运动期间，正逢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会议召开，吴贻芳当面要求蒋介石将南京市的警察局长调走，要他为警察对学生大打出手负责，这话虽然触怒了蒋介石，却体现了她一贯的正直品格。在参政会中，她的组织才干和社会活动能力，赢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1943年3月，吴贻芳与晏阳初、桂质廷、吴景超、李卓敏、陈源组成“六人教授团”前往美国，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六人教授团”开展了知识界发起的民间外交活动，帮助美国各界了解灾难深重的中国，理解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共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吴贻芳、胡适、胡霖等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在为期两个月的会议中，吴贻芳提出的“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尊重妇女平等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等主张，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她成为首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署姓名的女性，

尽显杰出女性社会活动家的风采。

## 二、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

抗战胜利后，吴贻芳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回迁与复建工作中。经其努力，金女大重获新生。随着人民革命胜利步伐临近，中国知识界普遍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吴贻芳选择留在大陆，出任南京维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9年9月，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在1954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毛泽东见到吴贻芳时说，“嗨，你就是吴贻芳，金女大的，久仰大名，未见其人，今天总算见到了”<sup>[2]</sup>。

新中国成立前，吴贻芳两次拒绝担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职务，但新中国成立后，她欣然担任政府职务，1953年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任江苏省副省长。她说“这是为人民服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实现了从一位爱国者到社会主义教育家的转变<sup>[3]</sup>。在担任教育厅厅长的三年时间里，吴贻芳与其他厅领导一起，为恢复和发展江苏省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担任副省长后，她分管教育、外事、妇女等方面工作，还在全国人大、民进中央、全国基督教协会、全国妇联等担任职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吴贻芳一开始受到保护，在原省委被打倒后亦受冲击。林彪事件以后，她才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活动。1975年，她参加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政治生命获得新生，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

吴贻芳是江苏省民进的创始人，也是民进中央的杰出领导人，为民主促进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她于1955年3月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1957年3月，任南京市民进主委；同年4月，任民进江苏省筹备委员会主委。1962年1月，在民进江苏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任委员。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传媒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由她领衔筹建组织、发展会员，既体现中共及广大



会员对她的高度信任,也为她提供了施展才干的新舞台。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吴贻芳真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搞好与中共的合作共事,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她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她对民进会员有着非常深的感情,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为他们排忧解难,用行动增强民进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吴贻芳在发挥民进组织作用中,不仅表现出作为旗帜性人物的导向性,更注意发挥组织的群体作用,积极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好民进的优势。在她的带领下,江苏民进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她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党派领导人的身份,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代表性人物。

1979年,已经86岁高龄的吴贻芳再次担任江苏省副省长,还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等全国性的职务。在这个时期,吴贻芳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相待,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奉献于统一战线和教育事业,展现出挚友、诤友的情怀。她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方针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分感慨,认为方针维护了统一战线的稳定,团结了各民主党派力量。她关注党风和社会风气,积极提交提案、撰文进言,履行民主监督职责;并继续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从幼儿教育到留学生培养进行系统思考,为此她致信教育部长、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在政协提交提案。她亲自参与金女大校友会的活动,团结广大校友为祖国的建设出力。她的廉洁奉公更是令人称道,1979年,吴贻芳出访美国期间亲笔记下了一张账单:一行三人在美国65天,访问了八个城市,仅用了3700多美元,余下的21000多美元,悉数交给了国家。也正是在这次出访中,美国密执安大学妇女校友会授予她“智慧女神奖”。1984年1月,

中共江苏省委向她发出致敬信,赞誉她“以卓越的社会活动才能和在教育事业上的建树,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 三、启示

其一,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吴贻芳一生中,政治和教育生涯七十余年,她见证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巨变,紧随历史发展的进程,最后以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老同志、老朋友而闻名于世。在每个历史关头,她从来不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不以个人利益得失来衡量是非曲直,而是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无论是面临毕业仍参加五四运动,还是面对外敌内患时的勇毅不屈、敢于打破陈规的壮举;抑或是在光明与黑暗的抉择中作出正确选择,以赤诚之心提出真知灼见,这些事例都极好地诠释了统一战线代表人士高尚的德行与过人的智慧。

其二,以“厚生”作为一生的信仰,为他人谋福祉,为国家、社会作贡献。在担任金女大校长后,吴贻芳将“厚生”定为校训并赋予其新意,“人生的目的不是光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仅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而更丰满”<sup>[4]</sup>。面对生命的磨难,她没有逃避,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坚定地活着,用爱救赎,实现了生命的坚韧与超越。她一生致教,厚生崇德,服务社会,利乐他人,以博大的胸怀,传递着绵绵的爱心。

### 参考文献:

- [1]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金陵女子大学[M].杨天宏,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157.
- [2] 吴贻芳纪念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133.
- [3] 郑爽,闫广芬.吴贻芳及“厚生”精神[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5):49.
- [4] 周和平.永远的吴贻芳:纪念吴贻芳先生诞生120周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52.

责任编辑:尔东



# 网络信息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单冠贤 李西娟

**摘要:**网络信息技术是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新时代背景下,统战工作面临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及新兴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以网络信息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统战工作仍存在领导重视程度不足、信息技术能力不强、数据集成共享不足、平台效能发挥不够、数字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对此,需加强统筹管理,优化顶层设计,强化数据管理,拓展数字统战场景,加大资源投入,以新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推动统战工作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数字统战;网络信息技术;统战工作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下,如何主动适应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特征,用互联网思维、视野、技术推动统战工作创新,将网络信息技术转化为提升统战工作效能的工具,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命题。新时代的统战工作必须突破传统路径依赖,主动融入数字化浪潮,深刻把握网络社会的运行逻辑,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统战新格局,拓展团结引导的新领域,提升对网络人士等新兴群体的联系与服务能力,增强在复杂网络环境中的舆论引导力、共识凝聚力和风险化解力。因此,开展相关研究,

不仅是贯彻落实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更是丰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提升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从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

## 一、网络信息技术赋能统战工作的时代价值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社会结构、交往方式和舆论生态,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然而,技术演进在带来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

收稿日期:2025-09-04

作者简介:单冠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研究方向为党建思政、统一战线政策和理论;李西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统战部干部,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时代推进高校智慧统战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NJ2024052)、江苏省统一战线工作研究课题“新时代网络信息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研究”(2024JSTZC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社会思潮汇聚的新平台和利益诉求表达的重要渠道,其匿名性、跨域性和即时性特征使得舆论引导、共识凝聚与社会整合的难度显著增加。网络空间不再仅仅是传统统战工作的延伸领域,而是日益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人心向背的关键变量。在此情境下,有必要从创新支撑、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等角度深入探究网络信息技术对统战工作的赋能价值。

(一) 网络信息技术是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网络信息技术作为当今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的重要技术,已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深刻影响国际竞争和国际力量对比。从全球视野来看,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爆发性发展,持续重构全球经济生态、权力结构与安全秩序,互联网空间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场域。在这一背景下,谁掌握网络信息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国际竞争和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动。从国内发展现实来看,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宽带网络和 5G 系统,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

统战工作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需积极适应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趋势。若不能主动将网络信息技术融入统战工作,那么不仅难以适应工作对象分化、工作场域迁移、话语方式更新的新情况,更可能丧失团结引领广大统战成员的重要渠道和话语权。因此,将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统战工作,不仅是技术工具的运用,更是工作机制、组织形态与团结模式的深刻变革。

(二) 数字统战工作是新时代赋予统战工作的时代命题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推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正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深度,重塑社会结构、交往模式与意识形态传播生态。在这一背景下,统战工作的环境、对象与方式正发生重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sup>[1]</sup>。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统战工作,需推动统战工作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统一战线范围广泛,广大统一战线成员不仅是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更是深度嵌入数字生活的实践者。他们越来越多地在网络空间中表达意见、反映利益诉求,乃至形成身份认同。传统线下为主的统战工作方式已难以有效引导这些日益“在线化”的群体。因此,数字统战是时代赋予统战工作的新形态。只有主动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统战工作效能,强化思想引领的渗透力和精准性,构建符合网络传播规律的共识凝聚机制,才能进一步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三) 网络信息技术是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目标,其内涵包括更广的团结范围、更高的工作效能、更强的凝聚能力和更优的服务体验。网络信息技术的即时性、交互性、智能性和可扩展性,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路径。

具体而言,借助大数据分析,可对统战成员的结构特征、动态变化和意见倾向进行精准画像,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升级。通过构建智慧统战平台,整合多源数据、优化资源配置、支持业务协同,可显著提升统战工作的响应速度与管理效率。利用新媒体可以开展多层次、嵌入式的沟通互动,增强统战工作的互动性与亲和力。尤为重要的是,网络平台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得广泛联系不同地域、行业、背景的统战工作对象更为便捷,特别是能够更有效地覆盖新媒体从业人员、跨境电商从业者、网络自由职业者等

新兴群体。通过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可以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内部外部联动、制度与技术协同的新机制,最大限度地分散的个体联结为团结的整体,在多元思想中凝聚共识,从而不断提升统一战线包容性、吸引力和凝聚力,绘就网上网下最大同心圆。

## 二、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统战工作的现实困境

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统战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统战的发展,以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统战工作新形态<sup>[2]</sup>。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数字统战建设,在平台搭建、数据管理和业务协同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依然面临各种挑战。

### (一) 治理结构的转型困境

统战工作数字化、信息化绝非单纯的技术运用,而是一种制度变迁与组织适应的过程。技术治理理论指出,新技术的有效嵌入需以组织结构、权责配置与运行机制的协同演进为条件。相关调查显示,基层统战部门信息技术岗位“专岗不专”现象突出,既懂统战业务又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不足,多数受访者表示对最新网络信息技术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在经费保障方面,大部分县区统战部门在数字化建设中,缺乏持续稳定的财政支持。这些情况折射出传统科层体制对技术嵌入的“制度惰性”,其根源在于尚未形成与技术赋能相匹配的制度化授权机制、资源分配模式与跨部门协作机制。网络信息技术赋能统战工作若要实现纵深发展,必须在引入技术的同时推进制度重构与组织创新,建立与数字化时代相适应的统战工作新体制。

### (二) 数字素养的结构性落差

统战工作者作为实践主体,其数字素养直接决定了技术赋能效果。相关调查显示,47.5%的受访者没有接受过信息技术的专项培训,每年接受两次以上培训的受访者仅占7.2%。从“技术—

主体”适配框架分析,不同岗位干部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业务岗位干部对数据分析工具、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云计算服务等能够运用于业务中的技术较为重视,而管理岗位干部对这类技术不太重视。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技术赋能过程中出现“系统热、应用冷”的现象。技术是重塑工作方式与权力关系的媒介,主体若缺乏相应能力,易陷入“技术脱域”困境,即技术系统与实践相互分离。因此,提升数字能力是统战工作现代性转型中主体性重塑的核心要求。

### (三) 开放与保护的平衡难题

数据的整合与共享水平直接关乎统战工作效能。问卷调查发现,超过75.0%的受访者认为部门间数据共享存在一定障碍,受访者最关心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实地访谈发现,数字统战涉及十多个部门,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共享机制,存在“数据孤岛”现象。从数据治理理论来看,统战数据具有高政治敏感性和高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必须在“开放共享”与“安全可控”之间寻求平衡。当前的数据壁垒不仅源于技术标准不统一,更反映出相关部门在数据共享方面权责关系模糊等制度性问题。例如,某地统战部门反映,因担心数据安全,不得不将一些本应线上办理的业务在线下办理。这要求构建分类分级、权责明确的数据治理体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建立数据共享负面清单制度,完善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机制。

### (四) 技术工具与政治属性的调适

近年来,部分省份上线统战工作的大数据平台,为统战工作数字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相关平台在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政务内网与外网之间的数据流动机制不健全,基层系统使用不够便捷;二是数据维护与审核反馈机制不足,缺少支持多场景运用的数字工具,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统战工作的创新需要;三是部分区县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在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后只能被迫关停平台或公众号,从而影响



正常工作开展。

综上所述,在制度适配、主体能力、数据治理与平台建设等方面依然存在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技术逻辑与统战逻辑、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数据开放与安全约束之间的张力。对此,要在加强技术应用的同时,注重制度创新、主体能力建设、数据治理体系优化与平台功能提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 三、网络信息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路径探索

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与持续迭代,对统战工作的组织方式、业务流程与联络机制提出了系统性创新的时代要求。面对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必须从体制机制、数据治理、技术应用和资源保障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以网络信息技术赋能,推动统战工作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 (一) 健全协同机制,构建数字统战多元共治新格局

强化系统治理与协同联动是稳步推进数字统战的制度基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研究制定省级层面的统战系统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与实施方案,明确阶段性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路径,推动信息技术与统战业务深度融合。建立跨层级指挥协调机制,统筹线上与线下,形成多维联动、协同高效的数字统战格局。二是构建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依托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和健全数字统战工作运行机制,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提升跨领域、跨层级协作能力。三是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将数字统战建设与运维资金纳入财政年度预算,建立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保障信息化项目顺利实施与迭代升级。

#### (二) 重构平台体系,打通统战数据融合共享新通道

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一体

化平台体系,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支撑。

一是打造智慧统战的数字平台。构建集统一门户、人物管理、代表人士赋能、综合服务、业务协同与大数据分析于一体的平台矩阵,实现统战信息的互联互通、业务协同和精准服务,最终建成运行高效、安全可控的一体化数字统战系统。二是建立标准化数据共享机制。研制统一战线数据资源分类、采集、交换与使用规范,推动跨地区、跨部门数据有序流动与系统对接,破除“数据孤岛”,提升数据综合利用效能。三是构建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制定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制度与应急响应预案,加强加密传输、权限控制、行为审计等技术保障,确保统战平台和数据安全。

#### (三) 创新数据治理,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新规范

数据是数字统战的核心资源。建立规范、高效、安全的全生命周期数据治理体系,是实现统战工作精准化、科学化决策的重要前提。一是建立统战数据标准化体系。省级层面制定统一的统战数据资源目录、采集模板与质量规范,明确数据定义、格式、采集、存储、共享及安全要求,实现数据“统一口径入库、全流程可控”。二是优化系统平台架构。以法律依据、服务对象与管理层级为框架,构建“1+X+Y”模式,即一个核心数据库、X 个业务平台和 Y 个场景应用,形成清晰规范的树型统战数据架构。三是创新数据填报与审核机制。推行“对象自主填报—管理员审核”双向模式,实施精细化的安全策略,在提升数据鲜活度的同时保障信息安全。四是加强数据全周期维护管理。建立健全数据录入、更新、使用、归档的各项制度,严控数据入口与出口,做到过程可追溯、责任可界定,充分发挥数据在辅助决策与服务统战工作对象中的核心价值。

#### (四) 拓展应用场景,打造统战业务数字化转型新范式

应用场景创新是检验数字统战成效的关键维度。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以技术融合为驱动,实



现统战工作全链条、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一是加快先进技术融合应用。积极引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释放更强大的治理效能，实现信息过滤、舆情分析、画像生成等功能，增强统战业务智能化与精准化水平<sup>[1]</sup>。二是深化数据挖掘与个性化服务。加强统战数据的多维分析与建模，依据不同群体特征实施差异化服务和互动策略，提升与工作对象联系交流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三是推动典型业务场景数字化转型。在行政办公领域，全面推行“一网通办”，提升内部运行效率；在业务服务领域，围绕多党合作、民族宗教、非公经济、新的社会阶层等领域的重点工作打造专业化数字平台，增强统战工作的覆盖面和渗透力。四是支持建设统战互联网信息汇聚与智能分析平台，提升数字统战治理能力。在综合评价方面，依托数字画像实现对统战工作对象的一体化管理；在宣传教育方面，融合新媒体技术打造线上统战文化云展厅，生动讲述统战故事；在政策传达方面，可利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和解析各级政策文件，为人机协同决策提供支持。

（五）强化资源支撑，培育数字统战可持续发展新动能

人才与组织是数字统战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必须围绕“业务+技术”的复合能力需求，系统加强队伍建设与资源支持。一是加强复合型技术队伍建设。围绕数字统战对专业能力的高要求，加大既熟悉统战业务又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

型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为项目可持续发展储备核心力量。二是建立基层数字统战联络员制度。借鉴高校信息化成功经验设立专职联络员，由其承担协调、培训、推广及安全管理等职能。三是开展全覆盖能力提升培训。面向统战干部与代表性人士开展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培训，增强其数字工具运用能力、数据思维与网络安全意识，系统培养具备数字素养的统战工作队伍。

综上所述，网络信息技术已成为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主动顺应数字化趋势，不断优化统战工作的技术架构、数据基础与应用生态，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架构优化、数据治理、场景创新与资源保障，全面提升统战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团结凝聚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更加磅礴的智慧与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概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7.
- [2] 詹国辉，刘雨菲. 数字统战价值功能、实践困境与策略选择研究[J]. 统战理论与实践，2024(5)：23.
- [3] 王飞. 数智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发展透视[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32.

责任编辑：吉强

# 超越工具性思维：价值理性引领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蕴与路径

赵浩含 朱星辰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现代性语境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导致民族工作面临深刻挑战。工具性思维虽然提升了民族工作效率，但也导致了认知断裂、情感疏离、价值真空和系统割裂等实践偏差。要克服这些问题，必须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超越。这种超越的价值意蕴体现在：通过主体性建构实现价值自觉，通过情感认同回归交往真实性，通过价值整合达致理性的辩证统一，通过系统协同构建整体性格局。在实践层面，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对话机制、深化情感认同机制、重塑价值引导机制、优化系统协同机制，推动民族工作从工具性管理迈向价值理性引领，这既是对工具理性思维的超越，也是民族工作价值重塑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具性思维；价值理性；民族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sup>[1]</sup>。在现代性语境下，理性思维作为人类认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维度，深刻影响着民族工作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进路。20 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韦伯提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划分，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理性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sup>[2]</sup>。工具理性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与价值理性彰显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纯粹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张力和现实矛盾<sup>[3]</sup>。这种张力

在民族工作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工具性思维通过量化评估、效果考核等现代化手段，构建起规范化、程式化的民族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族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过度的工具理性思维也导致主体性的遮蔽、情感维度的疏离、价值理性的消解、系统思维的割裂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现代性语境下工具理性对民族工作的深层影响。更为深刻的是，当民族认同被简化为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当文化遗产被固化为表演性的符号

收稿日期：2025-01-23

作者简介：赵浩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民族文学教育；朱星辰，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道德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机理及学校教育路径研究”（L24CED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展示,当民族团结被窄化为利益驱动的工具性关系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价值就面临着被消解的风险。这种趋势不仅影响着民族工作的实践成效,也影响了民族团结的长期稳定。

因此,超越工具性思维、重构价值维度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这种超越不是对工具理性的简单否定,而是要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理性的辩证统一。本文从价值理性缺失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工具性思维导致的实践偏差,深入探讨价值重构的内在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通过理论反思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结合,努力推动民族认同从表层符号向深层价值的转化,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方案。

### 一、工具性思维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偏差

工具性思维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在提升民族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层困境。当民族认同被简化为数字指标,当文化遗产沦为符号展演,民族工作正偏离其价值本质。这种困境揭示了突破工具性思维局限、重构价值维度的紧迫性。

#### (一) 认知断裂:主体性与工具性的二元对立

工具性思维在民族工作领域造成的认知断裂,反映了现代性语境下主体性与工具性的对立。这种认知断裂使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简化为实现特定目标的外在手段,忽视了其作为民族主体自我确证与身份认同的本质属性。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过度侵入必然导致意义世界的萎缩与认同危机的产生<sup>[4]</sup>。

这种认知断裂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民族工作的双重异化:其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被异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指标体系,价值导向被技术标准所取代。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异化表现为过分强调考核评比、数据统计等指标。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为例,许多地方将工作重点放在完成规定数量的联谊活动、文艺演出上,而对这些

活动能否真正促进民族团结缺乏深入思考。其二,各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被弱化。在工具性思维的主导下,民族工作往往表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各族群众被视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主动建构者。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等外在指标,却忽视了各族群众在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更为深刻的是,这种认知断裂导致民族认同建构陷入表层化困境。当民族工作被简化为完成特定指标的工具性行为时,民族认同就容易停留在符号化层面,缺乏深层的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表面化的特色景观,举办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展演活动,却未能真正触及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未能实现各民族文化的有效交融,使民族工作陷入形式主义困境。

#### (二) 情感疏离:认同建构的机械化与异化

工具性思维导致的情感疏离,瓦解了民族认同建构的情感基础。民族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性存在,建立在共同经历的情感记忆、日常交往的情感积累、文化浸润的情感共鸣之上。然而,工具理性将这一情感过程简化为可操作的外在行为,使民族交往从有温度的人际互动异化为无温度的任务履行。

情感疏离在民族工作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的异化。一是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化。在追求短期效益的工具性导向下,民族文化被简化为表演性的符号和景观,其承载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内涵被遮蔽。一些地方将少数民族文化等同于歌舞表演和服饰展示,过分注重其娱乐功能和经济价值,忽视了文化遗产对民族认同的深层影响,使民族认同失去情感依托,沦为空洞的符号表达。二是民族交往的异化。工具性思维将民族交往简化为任务完成和指标达成,使其丧失了应有的情感温度。一些地区的民族团结联谊活动流于形式,过分强调活动数量和规模,却忽视了通过真诚互动增进民族感情。正如涂尔干所言,社会团结需要建立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之上,单纯的利益驱动



无法维系持久的社会联结<sup>[5]</sup>。

情感疏离导致了民族认同的“空心化”危机。当民族工作被还原为简单的物质激励和行政推动时，各族群众之间的情感联结被工具性关系所取代。一些地方过分依赖经济杠杆和行政手段推动民族团结，将复杂的民族关系简化为利益交换关系，忽视了情感认同在民族团结中的基础性作用，可能影响民族认同持久内在动力的形成。

### （三）价值真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

现代性的发展使工具理性不断侵蚀价值理性的领地，导致社会生活日益“祛魅”<sup>[6]</sup>。在民族工作领域，这种价值真空具体表现为民族团结被简化为利益驱动的工具性关系，其中蕴含的道德内涵和价值导向被逐渐消解。

其一，价值真空在实践中体现为民族工作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民族工作的成效往往被简化为 GDP 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等易于量化的指标，而民族团结、文化认同等价值性指标则被边缘化。一些地方在推进民族地区发展时，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将复杂的民族发展问题简化为经济数据的增长，忽视了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文化传承等价值诉求，不仅会扭曲民族工作的价值取向，也会损害民族团结的长远基础。

其二，价值真空导致民族工作出现“重效率轻公平”的实践偏差。工具理性强调效率至上，使得一些地方在推进民族工作时过分注重短期效果，而忽视了对各民族利益诉求的平衡与协调。这种偏差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等领域表现明显：一些地方为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甚至出现损害少数民族群众切身利益的情况。当工具理性成为民族工作的唯一准则时，民族团结的道德内涵就会被工具性思维所消解。一些单位在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中重视评比达标活动，而忽视了对民族团结价值理念的真正践行，不仅违背了民族工作的价值导向，也削弱了民族团结的道德基础。

### （四）系统割裂：整体性思维的缺失与实践碎片化

工具性思维导致的系统割裂，反映了民族工作实践中整体性认知的缺失。如同卢曼系统理论所揭示的，社会系统的运行需要保持内部要素的有机联系，而过度的工具理性思维却往往导致系统的分化与断裂<sup>[7]</sup>。

其一，系统割裂在民族工作实践中表现为部门分割现象。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民族工作被切割为不同部门的具体职责，各自为政、分别完成指标的现象普遍存在。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等领域本应紧密关联、协同推进，但在实践中却常常是相互独立的工作领域。一些地方的民族教育部门专注于教育指标的完成，文化部门关注文化活动的开展，经济部门追求经济增长，而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与整合，影响了民族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其二，系统割裂导致了层级断裂的问题。民族工作的政策制定、执行与反馈本应形成良性循环，但在工具性思维的影响下，不同层级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上级部门专注于宏观政策的制定与考核指标的下达，基层单位疲于应对任务分解与留痕材料的准备，而政策执行中的真实困境、基层实践中的创新经验，却因缺乏有效的反馈渠道而难以向上传递。这种纵向断裂制造了政策执行的“肠梗阻”现象：宏观政策精神在层层传导中被解构为技术性指标，基层创新实践因得不到制度确认而难以推广，影响了民族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其三，系统割裂造成了民族工作实践的碎片化。工具性思维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系统工程分解为互不关联的具体项目和考核指标，忽视了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一些地方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切割为一系列独立的项目，如文艺演出、民族节庆、联谊活动等，这些碎片化的实践虽然各自完成了既定指标，却因缺乏内在关联而难以产生协同效应，更无法触及民



族认同建构的系统性机制。碎片化实践的累积不等于整体性进步，分散化努力的叠加不等于系统性成效，无法形成推动民族团结的整体合力，不仅降低了民族工作的效能，也弱化了民族认同建构的系统性影响。

## 二、超越工具性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维度

超越工具性思维，关键在于价值维度的重构。这不是对工具理性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更高层面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价值重构为民族工作从程式化走向自觉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 （一）主体性建构：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转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涵体现在对主体性的深刻建构上。这种主体性建构不仅是对工具理性思维局限的超越，更是各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自觉。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真正的主体性必须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主体性的对话与交流实现价值共识的形成<sup>[8]</sup>。

主体性建构的核心在于实现从他者化到主体化的转变。在工具理性思维下，各族群众往往被简化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其主体地位被遮蔽。而价值自觉则要求重新确立各民族的主体地位，使其从民族工作的客体转变为积极的建构者。在实践中，这种重塑表现为各族群众从被动参与民族团结活动到主动投身民族团结事业的转变，从外在遵循政策要求到内在认同民族团结价值的深化。

价值自觉的形成过程也是多元主体的建构过程。在民族交往中，各民族主体通过平等对话、文化互鉴实现价值与意义的共建。这种多元主体的建构突破了传统工具理性下的单向度思维，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价值建构图景。各族群众通过共同实践、共同思考、共同创造，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认同。

这种主体性建构实现了从外在规定到内在自觉的转向。在这个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政策要求，而是各族群众

的内在价值追求。这种转向使民族团结从行政推动转变为文化自觉，从而获得更为持久的内在动力。正如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各民族在交往中不断增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知，同时也在交流互鉴中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sup>[9]</sup>。通过价值自觉，各民族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的转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 （二）情感认同：民族交往的真实性回归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涵集中体现在对情感认同的追求上。这种情感认同不是工具性思维下的表层联结，而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和价值共识基础上的深层情感纽带。

情感认同的本质在于实现从“形式交往”到“实质交融”的转变，要求在民族交往中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而文化认同是情感认同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sup>[10]</sup>。各民族通过文化交流与互鉴，在共同的文化实践中培育深层情感。这种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民族交往，使情感连接实现了从完成规定动作到情感互动的深层转向，形成了情感纽带。这不仅体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更体现在各族群众日常生活的自然交往之中。通过共同的文化实践，各族群众建立起真实的情感联系，形成持久的情感认同。

这种情感认同实现了从外在约束到内在认同的转化。在此过程中，民族团结不再是外在的要求，而成为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情感需求。这种转化使民族交往从程式化的任务完成转变为自然的情感流动，从而获得更为持久的内在动力。正如费孝通所强调的，真正的民族团结必须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情感认同的基础之上。通过真实性的回归，各民族实现了从表面交往到深度融合的转变，形成了持久的情感纽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稳固的情感基础。

### （三）价值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涵关键在

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更高层面的辩证整合。工具理性追求效率与效益,价值理性强调道德与意义,两者在实践中往往呈现紧张关系,因此关键在于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sup>[11]</sup>。

价值整合的核心在于建立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关系。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方向引领。其实质是实现从“单向度思维”到“多维度统一”的转变,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两种理性的统一,使民族工作既具有实践效能,又彰显价值意蕴。这种互动关系突破了传统的非此即彼思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整合格局。通过两种理性的良性互动,既确保了民族工作的实践效果,又维护了其价值导向。

这种价值整合实现了从片面追求到整体把握的转向。在此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是单纯的工具性实践,而成为兼具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系统工程。这种转向使民族工作从单一维度的效率追求转变为多维度的价值实现,从而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正如哈贝马斯强调,真正的社会整合必须同时实现系统整合与生活世界的整合。通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民族工作实现了从片面到整体的转变,形成了科学的价值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 (四) 系统协同:民族工作的整体性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内涵最终体现为系统协同的整体性建构。这种整体性不是简单的要素堆砌,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正如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所强调的,系统的本质在于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产生的整体涌现性<sup>[12]</sup>。

系统协同的核心在于实现从“分散治理”到“整体建构”的转变,这依赖于价值理性的整体性引领。价值理性为系统协同提供了统一的价值导向,使各要素在共同的价值框架下实现协同运行。这就要求建立起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使不

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民族工作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在实践中,这种建构表现为民族教育、文化遗产、经济发展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各项工作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这种系统协同实现了从局部优化到整体提升的转向。在此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再是孤立的工作任务,而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这种转向使民族工作从单项突破转变为整体推进,从而产生系统性效应。系统协同的价值引领突破了工具理性的碎片化思维,形成了统一的价值坐标系。通过价值引领,各项工作既保持相对独立性,又形成有机联系,构建起协同发展的工作格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全面的实践框架。

### 三、超越工具性思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将价值重构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现实课题。这既需要制度创新的支撑,也离不开价值理性的回归。

#### (一) 构建多元主体对话机制:从工具性管理到价值自觉提升的路径转换

多元主体对话机制的构建是超越工具性思维的重要路径,是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各民族主体的能动性,在平等对话中培育价值自觉<sup>[13]</sup>,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认同的根本转变。

一是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在社区层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居民议事、村民自治等平台,将民族事务纳入基层民主协商范畴。通过定期召开由各族群众代表参与的社区议事会,就民族社区建设、文化设施规划、公共服务配置等事项进行民主协商。这种协商强调各族群众作为平等主体参与决策的过程。例如,在民族社区改造中,应充分征询各族居民意见,让他们真正成为社区建设的主人。这种参与式决策不仅能提高政策执行效果,更能培育群众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认同。

二是创新文化遗产互动模式。要打破单向度的文化传播模式,依托现有社区文化中心、群众

文化团体等载体,组织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文化传习活动。可以通过“文化工作坊”“传习小组”等形式,开展民族文化的共同学习和创新实践。特别要重视青年群体的作用,支持青年人以现代方式传承并创新民族文化,如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展示民族文化魅力。这种互动式的文化传承能够激发各族群众的主体意识,在文化实践中培育共同的价值认同。

三是完善反馈评价机制。要建立以主体性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将各族群众的参与度、满意度、获得感等设为重要评价指标。通过群众评议、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定期收集各族群众对民族工作的意见建议,并及时反馈到决策层面。这种评价机制既能反映工作实效,更能促进各族群众的主体性参与,形成“群众参与—工作改进—认同深化”的良性循环。

(二)深化情感认同机制:从形式化交往到价值共建的路径创新

情感认同机制的深化能够克服工具性思维局限。实现从形式化交往到价值共建的转变,必须构建多维度的情感培育体系,使民族团结的情感基础真正扎根于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一是推动交往日常化、生活化。民族团结的情感认同不能仅依赖节庆活动和专题教育,而要融入日常生活场景。要充分利用社区、学校、企业等现有平台,为各族群众创造日常交往机会。在社区层面,依托现有邻里中心、文化活动室等,定期组织各族群众共同参与便民服务、文体赛事、志愿服务等;在学校层面,通过混合编班、共同学习、协作项目等方式,让各族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自然交往;在企业层面,通过团队建设、技能培训、文化活动等,促进各族员工的深度交流。这种生活化的交往模式,能够突破传统联谊活动的形式化限制,使民族团结真正植根于群众生活,在自然交往中培育深层情感纽带。

二是深化文化共建共享。文化认同是情感认同的重要基础,要通过文化共建增进情感联系。

依托现有文化设施和群众文化组织,开展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例如,组织各民族文化能人开展民族文化技艺的互学互教,让各族群众在学习过程中增进了解,支持各族群众共同创作反映民族团结的文艺作品,让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深化情感交流,举办非遗传承活动,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感受文化魅力。特别要注重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让文化交流更具时代性和吸引力。

三是强化共同实践体验。情感认同的培育需要共同的实践体验。要创造更多让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奉献的机会。在社会治理中,组织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环境整治、扶贫济困、应急救援等公益活动,在奉献中增进情感;在教育领域,通过研学旅行、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体验中加深友谊;在经济发展中,通过产业合作、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让各族群众在发展中分享成果。这种共同实践能够让各族群众在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共同价值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命运与共的情感纽带。

四是创新教育引导方式。民族团结教育不能停留在说教层面,而要通过体验式、互动式的方式培育价值认同。在学校教育中,要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学,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实践体验等方式,让学生在参与中感悟民族团结的意义。在社会教育中,要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利用新媒体平台讲述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让各族群众在真实故事中产生情感共鸣。要特别重视榜样示范作用,通过宣传民族团结典型人物和事迹,以真实感人的事例激发情感认同。

(三)重塑价值引导机制: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路径

价值引导机制的重塑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着力点,就是要在民族工作中重建价值理性,使民族工作既具有实践效能,又彰显价值意蕴。

一是完善政策制定的价值导向。在民族政策



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评估政策的价值影响。建立健全政策论证机制,邀请民族工作实践者、理论研究者、各族群众代表参与政策讨论,确保政策制定始终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例如,在民族地区发展规划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指标,更要评估规划对民族文化保护、民族关系改善、群众获得感提升等方面的影响。要建立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并纠偏,确保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价值方向推进。

二是优化评价体系的维度。当前的民族工作评价往往过分依赖量化考核,要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在保留必要量化指标的同时,增加民族认同状况、文化传承效果、群众满意指数等反映价值目标实现程度的指标。要改进评价方式,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法,全面衡量民族工作的实际成效。特别要重视各族群众的评价意见,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同时,要避免评价的形式主义,减少不必要的台账资料,促使基层工作者将更多精力投入实干。

三是创新教育的价值内化方式。价值引导不应是孤立的工作环节,而要融入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要建立价值目标转化机制,将抽象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行动。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要注重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民族教育领域,要将价值教育融入专业教育全过程,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在社会治理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彰显价值关怀。要通过具体项目和工作抓手,让价值目标在实践中可感可及,使各族群众在参与过程中自然认同并践行共同价值。

(四)优化系统协同机制: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价值重构路径

系统协同机制的优化旨在实现从碎片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转变,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壁垒,构建统筹协调的工作格局,推动民族

工作由分散治理向系统治理跃升。

一是强化统筹协调机制。针对当前民族工作中存在的条块分割问题,要充分发挥现有协调机制的作用,建立健全统筹协调制度。通过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跨部门工作会议,研究并解决重大问题,形成工作合力。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民族工作相关数据和资源的互联互通,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例如,在民族教育领域,教育、民族事务、文化等部门可以通过协同配合,形成教育、文化、就业等多维度的支持体系。要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责任清单,确保各项工作有专人负责、管理,同时能够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二是推动政策协同配套。要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确保各项政策在价值导向上的一致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避免政策冲突。要建立政策评估机制,系统评估各项政策的协同效应,及时调整优化政策体系。例如,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应与文化保护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此外,还要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因政策频繁变动而造成的不确定性。

三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民族工作的区域分散、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要推动区域协同合作,开展跨区域民族工作交流与合作。例如,以对口支援、结对帮扶促进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协同发展;以区域间的产业协作、文化交流、人才交流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发展。要注重发挥各地优势,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格局。特别要加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联动,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梯度转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四是健全整体性评估机制。传统评估多呈分散状态,难以全面反映系统性工作成效。构建整体性评估体系,需从系统协同视角对民族工作成效予以评价,既要考察单项工作的完成状况,更



要审视各项工作的协同程度与整体效果。要综合运用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评估民族工作的系统性成果。尤其要关注政策措施的叠加效应与长远影响,杜绝短期行为与急功近利。通过科学评估,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推动民族工作持续改进与提升。

#### 参考文献:

- [1] 胡兆义. 理念、过程与效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路径[J]. 社会主义研究, 2024(6): 55.
- [2] 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卷[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7.
- [3] 王锬.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J]. 甘肃社会科学, 2005(1): 120.
- [4][8]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434、81.
- [5]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173-174.
- [6] 沈承诚. 论国家治理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张力[J]. 人文杂志, 2015(10): 119.
- [7] 焦瑶光, 吕寿伟. 复杂性与社会分化——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12): 60.
- [9] 古春霞.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各民族文化的共情性[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5(1): 56.
- [10] 齐付清, 孔建勋. 以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 学术探索, 2024(6): 68.
- [11] 黄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10): 42.
- [12] 贝塔朗菲. 一般系统论: 基础、发展和应用[M]. 林康义, 魏宏森,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 53.
- [13] 韩升. 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 21 世纪全球化生存的主体间性逻辑[J]. 理论探讨, 2024(3): 113.

责任编辑: 赵晓锋

# 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 互动逻辑、具体表征与实践进路

——以《黑神话：悟空》为例

陈彦余

**摘要：**宗教作为人类社会独特的精神现象，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生产力的影响。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具象拓展，是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高质量文化产品《黑神话：悟空》为例，解析文化新质生产力促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的内在逻辑：文化新质生产力以叙事创新、符号重构和氛围濡沐等方式有效促进宗教文化的中国化表达。通过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文化产品设计、优化文化产业体系及传播策略等实践措施来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进而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文化新质生产力；宗教中国化；黑神话；悟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sup>[1]</sup>。文化新质生产力是科技革新与文化创新的融合产物，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和广泛传播性，成为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创新因素。在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文化新质生产力不仅能为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全新的技术手段和创新理念，使宗教文化更好地契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审美，还能显著强化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互动关系，在保持宗教自身特质的基础上，实现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

本文以文化新质生产力为理论视角，系统剖析其与宗教中国化的互动逻辑；并以现象级文化产品《黑神话：悟空》为案例，研究其如何借助文化新质生产力，把宗教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游戏技术深度融合，进而探寻以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向，为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

## 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 （一）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sup>[2]</sup>，是社会变革的内生动力。文化

收稿日期：2025-05-07

作者简介：陈彦余，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昆仑文化符号铸牢新疆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和路径研究”（2025CKS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生产力是人类在精神领域对自然、社会和意识的一切知识、理论等思维形态的生产<sup>[3]</sup>，因而具有精神生产力的特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生产方式也在发生根本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sup>[4]</sup>。文化新质生产力依托科技创新对文化领域生产进行深度赋能，通过对传统文化生产模式的迭代跃升，文化新质生产力整合科技、创意、人才等多维度资源<sup>[5]</sup>，提升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不断提升文化生产的效能和文化影响的范围，是“创新”和“质优”的综合体现。

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新质”为核心、文化生产为重点，是集创新性与优质性于一体的生产方式，为宗教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本土化表达提供强大支撑。信息、数字、智能等现代科技与中华文化、中国宗教的融合，不仅打破了宗教文化传播的时空界限，拓宽其影响范围，更深度呈现中国化特质，使宗教文化得以更生动、直观地融入民众生活，提升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性与和谐程度。

## （二）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sup>[6]</sup>。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创新性是其核心特征。在当代文化生产实践中，其创新性集中体现在内容、技术与创意三大维度。首先，内容创新是核心。突破传统叙事，通过加入科幻、神话或民间传说等新鲜题材，能够快速消解审美疲劳，优化大众体验。其次，技术创新是关键。借助数字化手段对文化资源二次创作，并以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既提升艺术表现力，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开辟新路径。最后，创意创新是重要补充。创作者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融入现代审美与创意元素，使古

老故事焕发新生，强化文化认同。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贯穿生产各环节，不仅丰富文化产品的内涵与外延，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深度交融，充分彰显其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独特价值。

文化新质生产力具有融合性特征<sup>[7]</sup>。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融合性体现在对文化生产要素的重组与科技赋能，以新兴科技深度嵌入文化内容、产业、传播与消费全链条，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一是科技与文化内容的深度融合。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数字化内容，打造沉浸式体验戏剧、数字演艺基地、虚实结合的公共文化服务等新业态，推动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增长。二是文化内容与文化产业融合。文化新质生产力把文化资源与商业模式对接，形成完整产业链。例如，某主题公园高度还原影视、动画场景与IP形象，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运营，让游客踏入现实版“童话世界”，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同步扩张。三是文化传播与消费融合。借助数字媒介、网络直播、互联网运营等方式，文化产品将传播场景与消费场景无缝衔接，激发大众文化消费意愿，体现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融合优势。

文化新质生产力具有极强的传播性。一方面，数字化传播是其重要表现。文化内容通过网站、社交媒体、博客等平台跨时空传播，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使得受众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和再传播。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和全球化媒体的推动下，文化传播的广度拓展至全世界，深度呈现出跨时空的延续性，文化影响力由此发生深刻转变。借助互联网、社交平台、数字媒介、网络直播，文化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快速传播与广泛覆盖；借助精准推送、高效传播与互动反馈，吸引大量受众，促使文化在短时间内风靡全球。

## 二、文化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互动逻辑

宗教通过信仰、仪式、教义等方式，塑造并映射着人类对世界、生命与价值的理解。在不同

的文化环境中,宗教往往受当地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sup>[8]</sup>,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之义,也是我国宗教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创新动力,二者的互动既是文化生产与宗教中国化的相互作用,也是文化发展与宗教治理的协同演进,二者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一) 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三要素是新型文化劳动者、新型文化劳动资料和新型文化劳动对象。深谙宗教文化的新型文化劳动者掌握数字、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后,能在技术加持下对宗教内容进行创新性生产,能够开展“AI+内容”等人机协同式生产的创意劳动。新型文化劳动者包括宗教文化研究者、宗教文化创作者等。新型文化劳动资料是指文化生产中使用的工具、技术与资源,它们以数字文化平台和文化大数据为核心,具有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特征。例如,借助数字技术、影视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宗教教义融合,实现宗教本土化表达,推动宗教中国化。新型文化劳动对象是指被新型劳动者依托新型文化劳动资料加以开发、利用和创新的文化资源。在宗教中国化语境下,其主要包括宗教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宗教文化遗产、宗教文化创意产品等。这三要素协同互动,既能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也能促进文化新质生产力自身的革新与进步。

#### (二) 我国宗教中国化为文化新质生产力提供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sup>[9]</sup>,“成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sup>[10]</sup>。宗教

中国化指的是宗教在本土文化语境下进行的适应性转化,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表达形式。其一,宗教中国化为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资源。例如,佛教所秉持的“慈悲”理念、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伊斯兰教的“中道”精神,与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理念相互融合,孕育出诸如“伊儒会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路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体现的佛教爱国情怀,以及基督宗教参与的“三自爱国运动”等,这些均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中国化发展范例。宗教中国化不仅可以丰富宗教的教义体系,还能够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美学和哲学思想,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素材。其二,宗教中国化能为文化新质生产力提升文化价值。宗教中国化所凸显的核心教义彰显和谐、慈悲、包容、友善等核心价值观,能够塑造和规约受众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理念,具有社会教育功能和凝心聚力的社会作用。其三,宗教中国化能够拓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其文化形态具有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宗教表现形式存在文化差异。宗教中国化的文化资源借助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如增强现实 AR、虚拟现实 VR 等)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影视、游戏、音乐等)被新型文化劳动者生产、加工和创作为多样的文化产品,丰富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

#### (三) 文化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宗教中国化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文化新质生产力和宗教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协同发力,二者的互动逻辑既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持续增强,也体现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协同推进,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sup>[11]</sup>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支持与赋能,也需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确保在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文化新质生产力是在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背景下,高效、优质地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中国化是宗教与国家发展目标、社会发展需求和文化遗产不断调适、融入与融合的过程,在保持基本信仰和核心教义的前提下,引导信众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一致的价值理念、文化观念以及行为习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宗教中国化对促进社会的和谐统一局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宗教中国化有助于引导信众强化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担当,提升其公民素养,并激励信众主动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此过程中,我国宗教不仅能够彰显其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也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重要支撑。与此同时,文化新质生产力与宗教中国化的协同互促,将助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促进文化经济发展,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文化动能。

### 三、《黑神话:悟空》: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具体表征

《黑神话:悟空》是文化新质生产力对宗教文化进行创新转化的典型案例,表现为对宗教文化元素的自然吸纳与数字化呈现。游戏深入挖掘中国神话、宗教建筑等传统文化资源,借助数字智能技术和现代美术设计,将孙悟空这一神话形象重塑为符合当代审美的游戏角色,并把真实寺庙建筑高精度“移植”到游戏场景中,既保留宗教文化精髓,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中国特色,充分彰显了文化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方面的重要作用。

#### (一)《黑神话:悟空》的诞生背景

深圳市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国内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发售当日即登顶Steam、WeGame等多平台销量榜首,获得国内外

玩家广泛热捧,成为现象级文化产品。从文化层面来看,游戏以《西游记》及孙悟空为核心,融入佛教建筑、宗教符号等元素,将我国5省市至少15座寺庙建筑高精度“移植”进入游戏场景,打造具有神话氛围的虚拟世界。这对开发者提出极高要求,他们既要熟悉传统文化,又要领悟宗教文化,才能发挥文化新质生产力在资源转化中的创新价值。从技术层面来看,强大的游戏引擎(如Unreal Engine)、高精度3D建模、图形渲染与动态光影技术,加之互联网、智媒体与5G的加持,为游戏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借助这些技术,团队把现实寺庙、神话角色与自然景观真实、立体地迁入游戏,使玩家在畅快打斗与视觉震撼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 (二)文化新质生产力促进宗教文化元素的中国化表达

一是叙事创新——宗教文化元素的再诠释。《黑神话:悟空》在延续《西游记》主体设定的同时,对叙事结构与文化内核进行了创新。游戏叙事主旨聚焦佛教“生死轮回”与“因果循环”。“轮回”强调生命不息、连续转化;“因果”揭示“种瓜得瓜”的必然律则。二者共同构成中国佛教“因果业报”的伦理哲思。游戏设定是让玩家重走西行路,“万物坠入因果,万物永恒轮回”。大圣本身是因,天命人(玩家)是大圣身死后的果,玩家通过收集、重组大圣根器,一次次回溯前尘,于轮回中体悟因果哲思。不仅如此,游戏一改单一结局的设定,采用二重结局的非线性叙事方式将佛教“因果轮回”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整个游戏中。第一种结局是玩家集齐大圣遗留的所有根器,回溯大圣生命历程,领悟“一切欢愉在追求超越生死轮回的原始宿命面前皆为虚幻”的佛教道理,最终化身大圣,接续因果。第二种结局是玩家在被戴上金箍之前彻底觉醒,瞬间回顾大圣生于反抗、死于反抗的生命境遇,领悟顽强反抗的精神意义,将其视为反抗精神的象征。玩家凭关卡中的自由选择触发不同结局,真切体验到中国佛教因果循环的

复杂性,从而深化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理解,这充分彰显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与融合性。

二是符号重构——传统宗教符号的数字化呈现。符号重构是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宗教文化元素中国化表达的重要方式。《黑神话:悟空》运用数字技术对道教神仙体系与建筑象征系统加以呈现,彰显本土宗教魅力。道教的神仙体系可视为人间官僚制度在神圣维度的投射(如天庭的神仙体系),吸纳了佛教关于死后世界与水域的神祇设置(如阎罗殿与水晶宫),整合并构建了基于地域的基层神灵谱系(如山神、土地神),同时将女娲、西王母等先于或超越天庭架构的创世神与至高神纳入其信仰范畴。一方面,游戏在尊重原著基础上对神仙符号进行重构。例如,游戏解构了传统道教中太上老君掌管炼丹炉的固定设计,取天干地支中的“戊”和二十八宿中的“娄金狗”重构成能够炼制仙丹的“戊狗”角色。玩家通过完成支线任务便可解锁这个角色学习炼丹之术,体验道教练丹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游戏将多个朝代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进行符号重构。例如,游戏场景中广泛采用“飞檐翘角”的设计,融合多个朝代的风格,既保留了建筑排水、遮阳的实用功能,又继承了佛教建筑“超凡脱俗、向上升腾”的宗教寓意,玩家可在游戏交互中直观感受中国宗教建筑美学。这种符号重构不仅是对传统宗教符号的数字化呈现,更是对我国宗教文化底蕴的现代化解读,使我国宗教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是氛围濡沐——宗教文化氛围的探索式设计。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其思想在《黑神话:悟空》的大世界设计中得以充分呈现。道教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大”本质。因而在道教看来,“大”即是“道”,“逍遥游”就是大道的哲思。游戏的大世界设计是由一条主线任务地图和无数条支线任务地图共同搭建的广阔的“大道”世界。主线任务地图、支线任务地图以及部分隐藏地图为玩家提供了体验道教逍遥思想

的巨大数字化空间。玩家既可以在主线框架中推进剧情,也可以探索支线任务、隐藏剧情或任务彩蛋,不必拘泥于传统“打怪晋级”的单一游戏模式。玩家可根据不同的章节任务或攀爬巍峨高山,或跋涉浅溪峡谷,或坐看云舒雾绕,或潜隐山水之间,体验道家“游于无穷,寓于无境”的逍遥境界,感受道教逍遥思想的自由与超脱。同时,游戏配乐与音效设计融合了传统宗教音乐与中国古典音乐元素。配乐大量运用琵琶、古筝、唢呐等中国传统乐器,营造独特东方氛围;环境音效加入寺庙钟鼓、随沙尘卷至的西北说书声等,增强沉浸感与宗教文化气息。游戏科学借助现代音频技术,将这些音乐与音效整合为沉浸式声景资源,使玩家时刻濡沐于宗教与东方文化交织的声场之中,以听觉感悟中国宗教的文化魅力。

(三)《黑神话:悟空》的强势出圈与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赋能

《黑神话:悟空》的强势出圈,既得益于超高制作品质引发全球玩家狂热追捧,也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广泛海外传播。《黑神话:悟空》上线首日全平台累计销量超450万份,总销售额超过15亿元<sup>[12]</sup>,在国内外游戏圈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为全球玩家提供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载体。在体验游戏的过程中,众多国外玩家可以通过游戏的关卡设置、剧情发展、场景呈现和角色扮演来深入了解中国丰富的神话传说及宗教文化,激发玩家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沉浸式体验,生动诠释了文化新质生产力“传播性”特征,促进了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不仅如此,游戏爆火还引发了游戏取景地打卡旅游的热潮。玩家因沉浸式体验而产生实地探访冲动,可带动文旅消费,把文化产业效益延伸至旅游产业,从而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在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下,虚拟游戏与现实世界巧妙结合,为文化传播开辟新路径,把玩家从虚拟世界引向现实场景,实现文化的深度传播与真实体验。

#### 四、以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进路

《黑神话：悟空》是文化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游戏巨制，厘清其成功做法，进而探寻以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向。

#####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在数字化时代，党的领导不仅是推动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更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政治保障。《黑神话：悟空》的价值导向、思想内涵以及宗教文化表达，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宗教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和创新传承，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实践。游戏科学开发公司充分借助新兴技术，通过叙事创新、符号重构和氛围濡沐等手法，将宗教的核心教义、重要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机融合，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相呼应，确保游戏中呈现的所有宗教文化元素均符合党的宗教工作要求。具体而言，玩家通过游戏深刻体验中国佛教“生死轮回”和“因果循环”的佛教思想，而这些理念正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诚信的生动诠释，彰显“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社会公平逻辑和个人诚信立身准则。游戏在引导玩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有效遏制宗教极端思想，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始终确保宗教文化的表达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

##### （二）深化文化产品创新设计，彰显宗教文化的中国特质

《黑神话：悟空》是新型文化劳动者利用数字化媒介和技术手段等新型劳动资料，对我国宗教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劳动对象进行创新创作而生产的文化产品。由此可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我国宗教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推动宗教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性叙事深化内容创新。游戏以《西游记》为创作蓝本，设计流

畅的数字化交互机制，融入禅宗音乐，将抽象的宗教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化产品，使玩家能够在游戏的过程中感受佛教文化的核心概念、道教文化的修行理念以及禅宗音乐的宗教氛围，深化其立体感知。另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文化产品质量。《黑神话：悟空》凭借精良的制作赢得国内外玩家热捧。游戏科学深刻理解宗教文化，深度挖掘并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年打磨，达到国际3A标准，使我国宗教文化凭借卓越的产品质量走向世界。此外，文化新质生产力在创新中保持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发展的批判性思维。结合当下时代发展，游戏的二重结局批判思考了佛家轮回因果、道家逍遥无为理念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以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匹配性，并重新审视新时代宗教教义与现代化建设、个人成长之间的文化承续与精神滋养关系。因此，新型文化劳动者只有立足对宗教文化核心理念的现代化反思，有效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智媒化技术，才能不断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与产品高质量发展。

##### （三）优化文化产业体系与传播策略，提升文化影响力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破圈，堪称我国文化产业体系转型升级与传播策略优化的典范。早在2020年8月，开发方就发布了游戏的概念预告片，仅2小时就获得了bilibili播放量超1200万次、YouTube播放量超1000万次、国际游戏社区Reddit主题讨论超10万人次的传播成效<sup>[13]</sup>。持续的宣传使《黑神话：悟空》上线首日就获得了总销售额超过15亿元的可喜成绩，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如此，随着游戏的爆火，众多海内外玩家前往取景地打卡，参观中国宗教寺庙，感受宗教氛围，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双向联动，提升文化产业经济效益，扩大中国宗教文化国际传播力。由此可见，文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可从优化文化产业体系与传



播策略着手。一方面,大力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培养高精尖技术创新人才,加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实施精准传播策略,形成多元立体宣传矩阵。二者协同发展是促进宗教文化创新发展和推动宗教中国化的有效路径。

#### 参考文献:

- [1][8][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31、31、1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
- [3] 张巍,胡鞍钢,叶子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新中国70年总结与展望[J].财经问题研究,2021(1):6.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 [5] 周建新.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性与逻辑意蕴[J].探索与争鸣,2024(7):9-10.
- [6]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6.
- [7] 李康化,姜姗.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及治理方略[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0):53.
- [9][10]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00、101.
- [12] 贾天荣.四年等待,销售额破15亿元!《黑神话:悟空》一鸣惊人[EB/OL].(2024-08-2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48128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481280).
- [13] 秦琴.《黑神话:悟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范式[J].传媒,2025(4):67.

责任编辑:于博洋



# 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体系的纵向结构调整

## ——基于浙江省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的实践

徐声响

**摘要:**当前,基层宗教事务治理存在治理场域失焦、治理体系虚化、治理方式单一等问题。浙江省龙港市依托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的实践基础,积极推进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通过构建两级管理网络,形成扁平化管理体系;通过大部制改革,打造齐抓共管的协同治理格局;通过社会化路径,发挥宗教团体的作用,转变治理方式。这些举措实现了治理场域向社区化、治理主体向多元化、治理体系向网络化的转变,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扁平化治理推动治理体系的纵向调整,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基层宗教事务;治理;扁平化

宗教治理是一项全球性治理议题。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宗教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从“宗教管理”到“宗教治理”的理念嬗变,推动国家处理宗教事务时在价值导向、参与主体、政策设计、工作方法、实施手段及体制机制等多维度的深刻变革<sup>[1]</sup>。

### 一、当前基层宗教事务治理面临的主要难题

传统的宗教管理基于“单位人”思维,依赖自上而下赋权的行政管理系统,对宗教组织进行社会再组织和管理。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宗教管理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人民公社”“单位统包”等制度终结后,

国家对社会管控显著弱化,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亟待加强;另一方面,社会流动和城市化引发的社会结构持续变迁,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原有单位制模式下的各种社会事务,由单位统包转向社会化管理,社区逐步承担起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sup>[2]</sup>。在此背景下,基层宗教事务日益从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议题转变为基层社会的治理问题。对相关部门而言,带来治理多元性的挑战;对广大社区而言,则面临资源与能力不足的压力。为此,各地围绕基层宗教事务治理展开创新探索:一方面整合相关部门资源,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将宗教场所融入

收稿日期:2025-06-17

作者简介:徐声响,温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文化与社会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宗教局招标科研项目“基督教中国化的基层路径及其引领主体研究”(2024GZCX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基层治理网格，提升治理能力。这些实践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治理瓶颈。

#### （一）治理场域失焦

任何治理都需要依托特定的社会空间以建构其治理场域。宗教活动场所是宗教事务治理场域的关键依托，各地普遍以此为抓手。一方面，将合法宗教活动场所纳入基层政府的治理网格，建立“三人驻堂小组”等治理单元；另一方面，对非法宗教活动场所坚决打击取缔，或进行转换吸纳。这种做法存在明显局限。因为宗教活动场所在其社会属性上属于“民办非企业组织”，属于民办非企业类的一般性社会组织<sup>[3]</sup>，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基层政府、基层组织及社区往往仅能对宗教活动场所采取防范式管理，将其视为特殊空间，而非作为治理主体和资源融入社区治理体系。其结果是治理往往局限于管控宗教活动场所内的信徒与活动，难以与宗教组织及信教群众展开有效互动并引导其观念行为。随着信息化进程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基层宗教组织及其活动呈现出新态势，可能导致治理场域失焦，引发“治理脱靶”。一方面，在宗教面向现代化社会的自适应发展中，基层宗教组织及其活动日益开放化，部分宗教活动延伸至宗教活动场所之外，衍生出新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宗教等“虚拟”宗教活动的兴起，使依托传统宗教场所的治理措施难以有效应对。

#### （二）治理体系虚化

基层宗教工作体系作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个地方宗教工作创新的重点领域。当前，我国基层宗教工作已形成较成熟的条块体系：纵向依托行政管理体系，建立自上而下的“县区—镇街—村社”三级宗教工作体系，通过责任的逐级传导开展工作；横向通过联席机构和制度的构建，整合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实现协同治理；纵横体系的联结点在乡镇、街道，由乡镇、街道落实具体工作。然而在实践中，纵向的工作体系因责任的科层制传导，宗教工作的

任务和压力最终下沉至社区；而横向的协同治理，由于缺乏刚性制度保障和日常运行机制，治理的及时性和效率偏低；而乡镇、街道则因权责不匹配，既难以承担相应的责任，又无法协调各类资源，导致基层宗教事务治理分散化、碎片化。

#### （三）治理方式单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sup>[4]</sup>。针对错误的、简单的“放”或“收”的思维，“导”实际上就是一种现代的治理方式。其治理的目标是推动宗教中国化，在治理的方式上，实行综合治理，即坚持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的“五治”融合。但现实中更多是简单地将宗教作为一种安全隐患进行防范式、被动式治理，更倾向于“管”而非“导”的思维，多数情况下采用行政手段而非法治手段，强调政府部门的管理而非宗教团体的自治。例如，某些地区推行的“五进”教堂活动，大多仅注重“进”的形式而未与宗教组织的内部治理有效结合，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正面影响。这种“进”甚至可能会被宗教组织和信徒视为“外部性侵入”，进而引发抵触情绪。在此类治理模式下，基层宗教问题往往被“悬置”，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 二、扁平化治理：破解基层宗教事务治理难题的龙港实践

浙江省龙港市原属苍南县，曾是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镇，是我国首个“镇改市”的典型范例。苍南县是我国宗教工作重点县，龙港镇是苍南县宗教工作的重点区域。龙港设市以后，在浙江全省县级行政区划中，宗教信仰人口和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均居前列，宗教信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加之存在大量民间信仰，宗族观念较强，基层宗教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作为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龙港市以“大部

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将扁平化治理延伸至宗教事务治理领域,展开具有鲜明“龙港个性”的创新探索,为破解基层宗教事务治理普遍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 (一) 基于社区构建扁平化工作体系

2019年9月单独设市以后,龙港推行全域“村改社区”改革,实行“市管社区”的扁平化治理体制。取消乡镇、街道一级行政机构,原乡镇经济建设职能由市级行政机构直接承担,各类治理资源下沉到社区。全市共设102个社区,党委、政府部门,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派人进驻。由于没有乡镇、街道对于资源的汲取,社区对于资源的掌控和调配的能力增强,主体性地位充分凸显,治理效能大幅提升。

在此基础上,龙港市建立了区别于全国其他地方三级管理模式的“市—社区”两级基层宗教事务管理网络,并配以“一个主体责任”“三套联系制度”<sup>①</sup>,构建起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的扁平化体系。一方面,以社区作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的核心场域,建构全新的宗教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扁平化的体系实现了权责统一,真正压实了基层宗教工作的主体责任。首先,实现市级主体责任“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对社区负责。没有了乡镇、街道一级的缓冲,龙港市实现了市委书记直接抓宗教工作,分管领导和部门在各自范围内负责相关工作,社区联合党委(社区)建立宗教工作专班具体落实宗教工作。其次,实现治理关口前移。各类行政资源下沉到社区,由社区统一调配,有利于基层宗教事务的即时治理与源头治理。最后,在做好宗教领域的群众工作上,各类主体直接联系社区内各场所和各对象。市四套班子成员、宣传统战部机关干部、社区民警等分工明确、责权明晰,避免了宗教领域群众工作责任主体不在场

现象。

#### (二) 大部制改革形成治理合力

龙港市率先实行了大部制改革,打通、合并职能相近的部门,将党政机构合并为15个,实行块状管理模式,对内强化科室协同,对外积极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致力于打造精简高效型政府,有效提升了行政效能。以大部制为基础,根据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的需要,龙港市构建起高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首先,扩大主要部门权限,深化相关职能。龙港市宣传统战部作为宗教工作的主体部门,整合了意识形态领域绝大多数工作职能,其权限明显大于其他地方的同类机构,有利于综合解决宗教问题,这更符合宗教作为特殊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规律。其次,打造“宣统部+”模式,提升部门协作效能。传统行政体制下,受限于统战民宗部门在组织体系中的权限和地位,又受条块思维和垂直领导的影响,在宗教工作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多门多头管理、责权利不一致、治理手段单一的情况,部门间很难真正协调<sup>[5]</sup>。在大部制改革后,龙港市宣传统战部的地位得到提升,职能和权限得到扩充,绝大部分宗教事务可通过宣传统战部与其他部门“1+1”协同模式解决,极大提升龙港宗教事务治理的部门协作效能。同时,健全市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宗教领域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宣统部+”提供制度保障。再次,借助“一支队伍管执法”,提升协同治理能力。“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新型城镇化改革的十大项目之一。龙港市将全市9个部门、29个领域、3043项执法事项全部划转至综合行政执法局,建立统一指挥、多跨协同、联合联动的扁平化执法体系。宗教领域执法也纳入其中,实现多部门齐抓共管。最后,建立社区宗教工作专班,整合各类治理资源。健全三人驻堂小组、驻社干

注①:“一个主体责任”是指,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宗教工作第一责任人;“三套联系制度”是指,市四套班子成员、市委宣传统战部机关干部和市公安局社区民警联系宗教场所制度。



部、社区宗教事务管理小组等相关制度,整合市级下沉至社区的各类资源,由社区联合党委构建统一管理、相互配合、各负其责的治理网络。

### (三) 社会化路径转变治理方式

龙港市推行“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眼于集约型设市、低成本运行,致力于实现“小政府大服务”。龙港市的党政机构与人员编制数量约为同类县(市、区)的40%,相较于同类县(市、区),机关行政事业人员减少近3400人。在人员编制数量大幅精简的情况下,为保障行政运行效能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化解机构少、人员少而改革多、事务多等突出矛盾,需更好地借助社会力量。在宗教事务治理方面,龙港市注重社会参与,借助宗教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开展共同治理。

首先,充分发挥宗教团体作用,提升宗教自治能力。在人才建设方面,着力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对全市所有的神职人员进行全面梳理、登记造册并实施分类管理,同时制订管理规定、联系制度与培养规划,使其成为龙港市宗教事务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构建良性宗教关系的重要承担者和行动者。在组织建设层面,完善宗教界组织架构,下放管理权限。例如,完善龙港市基督教的组织架构,在“两会”下设“一办六委”和三个“三自小组”,由“三自小组”负责协调各教会堂点的相关事务。在行为规范方面,加强宗教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例如,引导宗教团体和组织建立办公经费备案、报销、审计等制度,实现财务年度统存、集中管理、专人专账。其次,突出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推进宗教中国化。着重通过宗教团体的引领作用,增强宗教组织以及信教群众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在政治认同方面,成功促使全市所有宗教场所与组织加入爱国宗教团体。在文化认同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宗教中国化。例如,在基督教“两

会”的引导下,龙港所有基督教宗教场所达成圣经版本、诗歌、交流会的“三统一”,并推行主日讲道统一派单制度,为推进宗教中国化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引导宗教组织与信教群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公益慈善、文明建设、平安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让宗教组织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

### 三、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的价值逻辑

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成效显著,政府和宗教界互动积极,政府引导宗教工作卓有成效。从治理视角审视,这一实践实质上推动了基层宗教事务治理实现三方面深刻转变。

#### (一) 治理场域由场所化向社区化转向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功能完整的最小单元,社区自治实际上包含了宗教治理的功能。以社区作为中心治理场域,实质是将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而非在体系之外另建特殊系统。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宗教问题确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但宗教文化也是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不能过于强调其特殊性<sup>[6]</sup>。同时,社区化治理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带来的积极变化极为显著。一是治理的平台化。把各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统一整合至社区这一平台,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在龙港市推行大部制、扁平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这种平台化治理的成效更为突出。二是治理的下沉化。社区是最微小、最基础的单元,宗教在社会中的存在,归根结底需依托于社区,社区治理可避免治理出现“脱靶”“扑空”的情况。三是治理内容多样化。宗教场所作为一个特殊空间,通常具有封闭性与内向性,以其作为治理核心场域,往往需直接面对治理内容的宗教属性,有时因过于敏感而难以处理,甚至可能激化矛盾。而社区治理则更具开放性与多样性,政府所承受的压力会大幅减轻,治理效果往往也更为理想。



## （二）治理主体由部门化向多元化转向

治理的本质在于多元共治，而宗教现象本身兼具复杂性与多元性，其治理主体亦应呈现多元化格局。传统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政府部门作为单一主体，易形成防范性、压力型行政管理机制，导致政府与宗教间关系紧张，难以契合宗教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龙港市通过充分发挥宗教团体效能，为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注入积极动能——宗教自我治理实为宗教治理的逻辑起点。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激活宗教自我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同时，宗教事务治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宗教组织内部的治理，二是社会框架中的宗教治理。如何使二者有机融合并形成良性互动，是宗教事务治理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深入宗教治理结构，与宗教界建立有效互动；也需要宗教走向社会，与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协作。此举既有利于推动宗教事务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又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龙港市引导宗教组织与信教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其内在逻辑正源于此。

## （三）治理体系由碎片化向网络化转向

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体系的虚化，根源在于基层宗教事务工作体系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与国家行政体制条块思维对治理体系的分割有一定关系，由此引发体制分裂、权力分散、结构松动。纵向上，管理链条过长。拥有行政权力的县级部门无法将管理“一竿子插到底”，对于宗教问题“管得着，看不到”；乡镇一级权责不匹配，对于宗教问题“看得到，管不着”；村和社区一级，由于压力和能力问题，对于宗教问题“不想看，不想管”。横向上，多部门协同治理缺少有效联结点，联席会议往往成为被动应对机制，缺乏常态化机制，无法持续发挥治理效能。在这两方面，龙港市的做法具有较强针对性。一方面，两级工作网络缩短管理链条，实现权责匹配，有利于提升宗教工作网络的实际效能；另一方面，依托大部制、

扁平化改革，以社区作为有效联结点，下沉治理资源，并通过“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实现多部门的协同治理。由此，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体系较好地由碎片化转向网络化。

## 四、纵向结构调整：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可能

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的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治理的社区化、多元化和网络化，这是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探索。至于该探索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及推广可能，亟待对其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剖析。

### （一）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的内在逻辑

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能够实现社区化、多元化、网络化，其核心逻辑在于扁平化。就治理体系调整而言，这种扁平化主要是纵向结构的调整。

有学者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划分为组织体系结构、制度体系结构、时空结构。其中，组织体系结构又可细分为纵向组织体系结构与横向组织体系结构，具体呈现出“条块结合”的特点<sup>[7]</sup>。在基层宗教事务治理过程中，主体责任面临着“条”方面的压力，迫切需要“块”的资源整合来提供支撑。当前，在“条”的层面，乡镇街道虽实际承担着主体责任，但并未被赋予与之相匹配的权限；在“块”的层面，民宗部门作为核心管理机构，却缺乏有效整合资源的能力。从“条块结合”的角度来看，县级党委和政府本应在条块之间发挥有效联结作用，然而其与村社之间存在乡镇这一缓冲层，导致宗教工作难以“一竿子插到底”；真正处于工作一线、能够联结条块的乡镇街道，却因权限缺失而难以有效开展工作。最终，基层宗教事务管理陷入“没人理”“不想理”“不敢理”的困境。

为解决该问题，许多地方尝试在纵向上层层压实主体责任。然而，如前所析，这种责任压实方式因管理链条过长必然导致权责匹配失调，难

以真正落地。因此,当前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更多转向横向结构调整的思路:无论是整合相关部门与资源以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还是将宗教场所纳入基层治理网格以提升治理能力,均体现为横向治理结构的拓展。其核心在于整合部门力量与治理资源,打破部门各自为政、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局,推动协同治理。但这种横向调整因缺乏有效联结机制与制度支撑,往往治理效能不彰,进而引发治理场域失焦、工作体系虚化、治理方式单一等问题。

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着眼于纵向结构的调整,取消乡镇街道一级,建立两级管理网络,社区作为核心的治理场域得以凸显,使治理的社区化成为可能。而治理社区化作为平台治理方式,将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整合到社区,形成多元共治的平台和信息交换的中心,实现治理多元化。同时,依托扁平化的行政体制,县级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下沉至社区,“一支队伍管执法”应运而生,大部制带来的多部门协同显现实效。

(二)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扁平化治理的现实可能

龙港市基层宗教事务的扁平化治理依托于该市行政体制的扁平化改革。此模式是否具备推广价值,可以从三个关键问题展开探讨。首先,管理链条的压缩。其他地区能否如龙港般精简管理层级?当县市客观存在乡镇行政层级时,如何有效缩短管理链条?这或许是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的重要改革方向。其次,治理单元的适配性。龙港市宗教事务的扁平化治理以“镇改市”为前提,其行政单元、空间规模与管理半径实际上相当于大型乡镇。在此治理单元上赋予县级权限、构建县级治理体系,更易实现治理效能提升。例如,

基督教两会的权威性、组织力与协调力在较小治理单元内显著增强,其圣经版本、诗歌、交流会“三统一”及主日讲道统一派单等机制得以高效落实。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其他县市是否可以通过重构或缩小治理单元来优化宗教事务治理?最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龙港通过大部制构建了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网络的关键支撑。其他地区能否将多部门联席机制升级为大部制?若县级层面难以实施,是否应在乡镇层面推行大部制改革,通过政府职能重塑与机构再造来完善宗教治理网络?破解这三个核心问题,或将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体系的纵向结构调整开辟路径,进而为治理效能提升注入新动力。

#### 参考文献:

- [1] 曾传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宗教治理的回顾与反思[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2): 12.
- [2] 张荣臣, 李海洋.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N]. 学习时报, 2008-12-22(2).
- [3] 李向平. “场所”为中心的“宗教活动空间”——变迁中的中国“宗教制度”[EB/OL]. (2010-07-25).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170.html>.
- [4]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 人民日报, 2016-04-24(1).
- [5] 许烨. 基于网络治理视角的宗教事务管理创新[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3): 91.
- [6] 张祎娜, 蓝希峰. 着力推进我国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 中国民族报, 2019-07-16(5).
- [7] 宋世明. 论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个性[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4): 112-114.

责任编辑: 于博洋

# 亲清政商关系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创新研究

孙哲远

**摘要:**本文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民营企业数据,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探究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与亲清政商关系的关联性。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水平与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亲清程度越高,民营企业创新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优化亲清政商关系是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重要方式。通过机制检验得知,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区域市场活力等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高新技术行业、知识产权保障较高区域、营销能力较强企业中,亲清政商关系在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此外,创新质量的持续性提高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价值。

**关键词:**亲清政商关系;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企业价值

## 一、引言

“亲”“清”两字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的精准概括。“亲”是指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通过放管服改革优化行政审批流程,靠前服务为企业精准纾困解难,提供及时的政策和资源支持<sup>[1]</sup>;民营企业管理者也要积极与政府沟通,反映本行业发展问题,积极为产业政策和行业规范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清”是指政企关系的构建需遵守相关法律与道德规范,坚决遏制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对企业而言不能通过行贿、寻租等方式赚取不正当利润,增强企业管理者的合法合规经营意识<sup>[2]</sup>。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能够让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既不干扰,又能采取措施引导民营企业调整业务方向,最终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创新是企业自发的内生性选择和策略性行为,企业内部因素会影响创新活动的开展。同时,由于高质量创新活动存在着高投入和高风险性的特征,使得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可持续性<sup>[3]</sup>。冉征(2023)从政府行为、汪克亮(2023)从要素配置等方面论证外部环境对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

目前,对于亲清政商关系的研究多数聚焦在内涵和表现,关于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行为的影响分析相对缺乏。虽有学者从企业ESG表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创新等多元视角分析亲清政商关系对其产生的影响,但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实证方面的研究屈指可数。本文从多元视角探究亲清政商关系与民营企业创新质量关联性,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构

收稿日期:2025-05-05

作者简介:孙哲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



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视角出发,发现亲清政商关系与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伴随亲清政商关系的优化,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会得到显著提升。二是厘清了亲清政商关系及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效应之间的因果机制。亲清政商关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稳定政企关系、增强低质量创新矫正效应,共同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质量。三是亲清政商关系在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市场价值。

## 二、理论分析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政策落地效果的重要因素,而互动关系的疏密程度是引发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良好的政企关系作为一种特殊优势,也将对企业行为决策及政策收益产生影响<sup>[4]</sup>。从资源视角来看,民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较为有限,为提升创新质量需要与市场中的各类研发组织共同推动。相比其他生产活动,对高端创新要素的需求更为迫切,一定程度上会对民营企业造成资源上的压力<sup>[5]</sup>。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作为最有力量的公共机构,对信息资源、资本要素等稀缺资源的配置具有较强的主导权<sup>[6]</sup>。在此情况下,亲清政商关系能够产生针对企业的资源补充效应,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创新决策。在信息获取方面,亲清政商关系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决策者更直接地获取政策变更信息,进而缓解决策层对未来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其应对创新风险的信心,推动高水平创新活动的开展<sup>[7]</sup>;在资金获取方面,亲清政商关系不仅降低了民营企业获取金融机构信贷与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的门槛,也帮助其获得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从而缓解创新面临的资源约束压力,推动民营企业提升创新质量。根据上述分析得出本研究的第一个理论假设:

H1: 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创新作为具有复杂性的知识与技术变革活动,需要企业在较长时间内给予持续性的关注与

资金投入。但是单靠民营企业的内源融资,难以与高投入的创新活动相匹配。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活动需要外源资本的补充。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面临更强的融资困境,因此稳定的资金供给成为决定民营企业创新成败的重要因素<sup>[8]</sup>。同时,政府会严格实施对民营科技企业的筛选与论证,将资金优先分配给具有创新潜力的民营企业,并对该类企业的补贴资金使用状况、创新成果产出等实施有效的监管与考核<sup>[9]</sup>。在亲清政商关系下,政企间的信息传递变得更为顺畅,政府更加了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使得生产性资源错配的概率进一步降低<sup>[10]</sup>。因此,亲清政商关系能够缓解民营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融资问题,助力其提升创新质量。

政商关系亲清化对政商之间的合作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可以实现政商关系的透明化、规范化发展,对激发市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sup>[11]</sup>。同时,还能够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减少隐性成本,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此外,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需要不断优化自身结构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sup>[12]</sup>。政商关系亲清化能够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提供良好保障,使其更全面参与竞争,并通过持续创新实现获利目标。

政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评估和监管存在成本与技术上的门槛。传统政企关系下,政府对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缺乏细致了解,创新补贴政策会诱使民营企业发生寻租行为。若缺乏亲清化的政商关系,民营企业连续多次获得创新支持的概率较低,创新激励措施会诱导部分民营企业采取骗补、低质量的“策略性创新”来迎合政府的政绩需要<sup>[13]</sup>。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改变传统政企交流中的被动型交流方式,政府主动靠前服务,为民营企业提供政策、资金等保障,通过公开透明的事后监管和验收,充分缓解创新支持政策在各环节面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sup>[14]</sup>,减少低质量创新成果,保障政府创新激励目标的顺利实现,进而实现对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激励<sup>[15]</sup>。根



据上述分析,得到本研究的第二个理论假设:

H2: 缓解融资约束、增强市场活力和增强低质量创新矫正效应是亲清政商关系影响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因果机制。

### 三、研究设计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探究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与亲清政商关系的关联性,在前文理论研究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HI_{it} = \alpha_0 + \alpha_1 ZS_{it} + \alpha_2 X_{it} + \varepsilon_i + \varepsilon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公式(1)中,  $HI_{it}$  代表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是被解释变量;  $ZS_{it}$  为亲清政商关系,是解释变量;  $X_{it}$  为控制变;量,行业固定效应用字母  $\varepsilon_i$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字母  $\varepsilon_t$  代表,残差项  $\varepsilon_{it}$  表示。

#### (二) 变量说明

##### 1. 被解释变量

民营企业创新质量(HI)。高质量创新的评价指标较为多元,现有研究多将发明专利作为判定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主要依据,而普通创新指标则多选择外观设计专利指标。伴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原有指标难以作为企业创新质量的判定依据。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也让企业创新面临严峻挑战,不仅要注重创新数量更要注重创新质量。基于此,为更好探究企业创新质量状况,文中设定三个被解释变量,即普通创新、高质量创新以及综合创新。综合创新主要以发明专利数量加权并取对数进行计算;高质量创新则以高质量发明专利数量加权取对数予以计算。关于高价值发明专利的标准,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了规定,只要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可:企业所处行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海外拥有同族专利权、高价值发明专利使用时间已经超过10年、拥有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发明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奖或国家科技奖的专利。

##### 2. 核心解释变量

亲清政商关系(ZS)。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针对中国

设区市的政商关系进行全面且合理的评估,并发布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本文选择人大国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数据来表征“亲清”政商关系。该指数介于0—100分之间,分值越大表明该城市政商关系越好。

#### 3. 机制变量

(1)融资约束。本文借鉴余明桂等<sup>[16]</sup>的做法,采用SA指数表征企业融资约束指数。(2)低质量创新矫正(citation)。研究中主要借鉴张杰等<sup>[17]</sup>和曹虹剑等<sup>[18]</sup>研究中所提出的知识宽度法进行测算。(3)市场活力(active)。主要借鉴叶文平等<sup>[19]</sup>学者研究成果,运用城市新注册公司数与现有公司数之比予以判定。对应数值越大说明城市创业活跃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企业绩效(Roa)、固定资产比率(PPE)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

####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6年至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其中财务数据主要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中获取。为增强样本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对样本做如下筛选:剔除金融类、处于ST状态、资不抵债以及存在数据缺失的民营企业。为规避回归分析中受到极端值的影响,特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1%和99%的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取4140个有效观测值的民营企业样本。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ZS	4.021	0.472	4.603	0.773
HI	3.135	1.662	7.158	0.000
LEV	0.401	0.206	0.724	0.005
Age	1.884	0.702	3.735	0.000
Size	4.851	0.898	6.208	2.319
Roa	0.173	0.265	1.159	-0.082
PPE	0.397	0.227	0.961	0.018
TOP1	0.295	0.115	0.412	0.136

#### 四、实证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本文利用基准回归模型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表2中第(1)列为不含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列为包含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通过分析得出核心解释变量ZS的估计系数为正,而且具有上升特征,由此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H1。

表2 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回归估计

变量	(1)	(2)	(3)
ZS	0.046*** (0.011)	0.054*** (0.008)	0.059*** (0.010)
LEV			-0.361*** (0.048)
Age			0.828*** (0.201)
Size			0.246*** (0.047)
Roa			4.826*** (0.756)
PPE			0.113*** (0.033)
TOP1			0.029*** (0.006)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No	Yes	Yes
常数项	1.419*** (0.143)	0.579*** (0.121)	0.596 (0.615)
R-squared	0.6123	0.5964	0.6972
观测值	24840	24840	24840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 (二) 稳健性检验

一般情况下,城市营商环境越好,市场机制越完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把握亲清政商关系赋予的市场机遇,推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这一考量,在分析阶段剔除了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专注于对剩余民营企业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表3中第(1)列的数据表明,即便去除了这些特定样本,研究结论仍然保持稳健和有效性。此举措旨在降低样本间的重叠性,从而增强分析结果的精确度和可信度。

为规避样本选择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

在样本选择中运用了倾向值匹配方法,主要操作流程为:第一,将亲清政商关系的分类变量(ZSD)作为核心因变量,同时将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协变量。第二,采纳Logit回归模型来计算样本的倾向值,遵循邻近1:1匹配策略对样本实施配对处理。配对完成后,两组样本间的特征差异显著减小,有力地证明了特征差异得到了有效平衡,从而增强了样本之间的可比性。而且通过表3第(2)列中的回归结果对以上分析予以确定。

本文主要探究的是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与地区亲清政商关系的关联性,为规避地区层面遗漏变量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采取了控制地区固定效应进行分析,并实施回归检验。从表3第(3)列的数据可以看出,核心变量系数相对稳定,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由此可以证明地区层面遗漏变量不会对本文基本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最后,本文借鉴夏清华等<sup>[20]</sup>的做法,工具变量设定为企业所在区域临近城市亲清政商关系指数的平均值(BORDER),在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与亲清政商关系分析中运用了2SLS方法。根据下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L.ZS变量在表3第(5)列中第一阶段对应的数据值为正,证明了工具变量假设。第二阶段表3第(4)列中对应的回归结果证明了能够实现对内生性问题的缓解,研究符合预期设定。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剔除特殊样本	倾向得分匹配法	控制地区固定效应	工具变量法	
变量	(1)	(2)	(3)	(4)	(5)
ZS	0.041*** (0.012)	0.077*** (0.016)	0.084*** (0.026)		0.125*** (0.033)
L.ZS				0.039*** (0.00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No	No	Yes	No	No
观测值	21750	24840	24840	24312	24312
R2	0.5263	0.5317	0.4516	0.5169	0.4587

### （三）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亲清政商关系在增强市场活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方面发挥着正向作用，通过这些中间因素能够激发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本文借鉴江艇（2022）的研究内容为准，开展机制检验，对应的模型如下：

$$M_{it} = \beta_0 + \beta_1 ZS_{it} + \beta_2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在公式（2）中， $M_{it}$  代表融资约束、低质量创新矫正机制和市场活力三个机制变量。通过模型分析得出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具体如表 4 所示。表 4 中的第（1）列和第（2）列聚焦融资约束，通过列（1）数据能够看出融资约束在亲清政商关系扶持下能够有所缓解。通过列（2）可知，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与融资约束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同样证明了在亲清政商关系与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关系中，融资约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表 4 中的第（3）列和第（4）列聚焦于低质量创新矫正机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有效强化了低质量创新的纠正效果，从而能够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创新质量。表 4 中的第（5）列和第（6）列反映的是企业的市场活力，对应的数据为正，意味着市场活力能够对机制产生影

响，市场活力的增强与结果变量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通过增强市场活力，进而提高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H2 的正确性。

### （四）异质性分析

为了全面认识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文中从多元视角进行异质性检验：以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营销能力、知识产权保护力等要素的均值为判定依据，将企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均值以上的企业，另一种为均值以下的企业，同时对两类企业进行回归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5。

#### 1. 营销能力

表 5 中的第（1）列和第（2）列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营销能力受到亲清政商关系的影响，其中营销能力较强的企业在“专精特新”方面的转型水平更高，营销能力较弱的企业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小。由此可见，营销能力越强的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效果越显著，企业经营活力能够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营销力强意味着企业能够迅速对地区出台的相关政策作出反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优化现有人力资源配置以及改变创新方向。

表 4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SA	(2) HI	(3) Citation	(4) HI	(5) Active	(6) HI
ZS	-0.301*** (0.019)		0.409*** (0.029)		0.496*** (0.031)	
SA		-0.212*** (0.026)				
citation				0.383*** (0.117)		
Active						0.163*** (0.0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4840	24840	24840	24840	24840	24840
R2	0.345	0.349	0.402	0.455	0.526	0.439

表 5 企业内部异质性检验结果

	营销能力		行业异质性		高管持股比例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高于均值	低于均值	高新技术行业	非高新技术行业	高于均值	低于均值	高于均值	低于均值
变量	(1)	(2)	(3)	(4)	(5)	(6)	(7)	(8)
ZS	0.091*** (0.021)	0.026*** (0.006)	0.069*** (0.015)	0.038*** (0.010)	0.077*** (0.013)	0.049*** (0.008)	0.057*** (0.014)	0.064*** (0.016)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1250	13590	6792	18048	11244	13596	12228	12612
R2	0.5823	0.5622	0.5713	0.5462	0.5541	0.6117	0.5014	0.5217

另一方面，营销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更为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及时进行产品、服务升级，同时借助亲清政商关系的优势，招募到的销售人才会进一步帮助制造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将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

## 2. 行业异质性

根据企业技术属性，将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与非高新技术两种类型，并对两类企业进行回归检验。表 5 中第 (3) 列、第 (4) 列结果显示：在高新技术行业，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非高新技术行业，回归分析中对应的核心变量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高新技术研发型企业创新质量更容易受到亲清政商关系的影响。此外，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层对创新质量高度敏感，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能提升其政策信息获取能力，从而激发企业创新投入积极性。

## 3. 高管持股比例

表 5 中第 (5) 列、第 (6) 列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治理与亲清政商关系还受到高管持股比例的影响，高管持股比例对两者具有正向作用，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高质量创新受亲清政商关系的影响越强，相反则越弱。企业经营中容易出现代理问题，尤其是外部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问

题更为突出，这一问题会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而有所缓解。同时，高管持股比例增加有助于优化企业战略，避免短视行为。在责任心驱动下，高管更有动力投入经营管理，积极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总之，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不仅能更有效控制管理成本，还能加大创新投入。

## 4.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辅助民营企业降低创新活动的负外部性，减少后发企业在相似领域的技术模仿行为，保障企业持续获得创新成果的收益，弥补研发成本，进而提升其开展高质量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保障民营企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权益，通过政府披露创新项目信息来减少企业的新知识获取成本，缓解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从而强化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意愿，实现双方共赢。有鉴于此，本文参考吴超鹏等<sup>[21]</sup>的方法，以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均值为界，分类考察了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相较于高知识产权保护组，在低知识产权保护组中，核心变量系数为 0.064，并通过了 5%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有助于增强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



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

#### (五) 经济后果检验

为更好研究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持续性, 特对企业创新质量经济价值影响因素予以分析, 具体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text{Tobin}Q_{it} = \gamma_0 + \gamma_1 \text{ZS}_{it} + \gamma_2 \text{X}_{it} + \varepsilon_{it} + \varepsilo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在民营企业创新质量持续性衡量方面以企业价值 (TobinQ) 指标为依据, 同时进行提前一期处理, 其他控制变量与前文模型一致。

表6反映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6的列(1)和列(2)中, 当将t+1、t+2期的企业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变量H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 且变量系数有所升高。表明民营企业通过提升自身创新质量, 能够在资本市场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正向回馈, 并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价值。上述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对于民营企业的重要性, 不仅是提高创新质量的制度保障, 而且能够提升民营企业的市场价值, 进一步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的经济后果研究。

表6 经济后果效应分析

	(1)	(2)
变量	TobinQ <sub>(t+1)</sub>	TobinQ <sub>(t+2)</sub>
HI	0.063*** (0.021)	0.069*** (0.015)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观测值	24840	24840
R2	0.755	0.724

##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为探究亲清政商关系与民营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我国上市民营企业为例, 筛选了2016年至2021年的数据信息, 通过综合评选最终确定了4140个样本, 对影响两者关系的内外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得出结论, 民营企业创新质量受地区亲清政商关系的影响, 优化亲清政

商关系可以激发民营企业创新积极性, 提升创新质量。影响机制检验发现, 地方市场活力受地方亲清政商关系影响, 并通过对市场活力的作用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同时, 亲清政商关系的优化有效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 并增强其低质量创新的纠偏能力, 为高质量创新活动奠定坚实基础。当然, 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差异性, 特别是在营销实力强劲、高新技术领域、管理层持股比例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的情况下, 这种正面影响更为显著。此外, 本文通过验证还得出民营企业创新质量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价值提升的持久正向作用。

### (二) 政策建议

首先, 实证分析显示, 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化发展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能力, 凸显了构建此类关系在推动微观企业可持续发展与转型升级中的正向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较为完善的城市, 优化政企关系可以助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其次, 研究表明, 提升企业高层持股比例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亲清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高创新质量的力度。因此, 民营企业可通过合理调整高层股权结构, 保障创新活动的连续性。最后, 为了最大化提升亲清政商关系的积极效应, 各地区需拓宽认知边界, 发掘亲清政商关系建立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提升企业价值, 促使民营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提升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产出质量。

### 参考文献:

- [1] 罗进辉, 刘海潮, 巫奔龙.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36-49.
- [2] 李晓磊, 张玉明. 儒商特质的企业家精神能“御风而行”吗?——亲清政商关系的调节作用[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11): 130-137.

- [3] 陈强远, 张醒, 汪德华. 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设计: 高质量发展视角 [J]. 经济研究, 2022(10): 52-68.
- [4] 高洪利, 李莉, 吕晨. 管理层投资视野、技术熟悉度与企业创新决策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2(4): 79-90.
- [5] 宋敬, 陈良华, 叶涛. 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视角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3(12): 1-11.
- [6] 周洲, 夏晓宇, 李雅梦. 法律保护能否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J]. 科研管理, 2023(4): 127-135.
- [7] 吴先明, 马子涵. 制度嵌入如何影响跨境并购后的企业创新质量? [J]. 经济管理, 2022(4): 98-115.
- [8] 马红, 侯贵生. 土地财政、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制造企业创新风险 [J]. 中国经济问题, 2022(1): 186-200.
- [9] 毛宁, 杨运杰, 尹志锋. “单向混改”还是“双向混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J]. 经济管理, 2023(1): 85-104.
- [10] 田丹, 吕文栋, 刘凯丽. 内部控制对创新风险的作用机制——基于风险缓和模型的研究 [J]. 财贸经济, 2022(5): 129-144.
- [11] 冯净冰, 章韬, 陈钊. 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中国 PPP 项目的社会资本吸纳 [J]. 经济科学, 2020(5): 19-31.
- [12] 江旭, 靳瑞杰, 沈明眉. 政企关系与民营企业创新决策研究 [J]. 科研管理, 2022(8): 63-72.
- [13] 李广子, 刘力. 产业政策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J]. 金融研究, 2020(5): 114-131.
- [14] Zhang Y, Zhang M, Liu Y, et al. Enterprise investment,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oal overcapacity: the case of China [J]. Energy policy, 2017(101): 162-169.
- [15] 于文超, 王小丹. 政企关系重构、政企信息不对称与企业产能利用率 [J]. 产业经济研究, 2020(2): 131-142.
- [16] 余明桂, 钟慧洁, 范蕊.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9(4): 75-91.
- [17] 张杰, 郑文平. 创新追赶战略抑制了中国专利质量么? [J]. 经济研究, 2018(5): 28-41.
- [18] 曹虹剑, 张帅, 欧阳晓, 等. 创新政策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质量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11): 135-154.
- [19] 叶文平, 杨学儒, 朱沆. 创业活动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的比较研究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4): 4-14.
- [20] 夏清华, 何丹.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信号理论视角的解释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1): 92-101.
- [21] 吴超鹏, 唐菂.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6(11): 125-139.

责任编辑: 蒋建忠

# 制度型开放下金融创新助推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成春林 庞思璐

**摘要:**自由贸易试验区强调以制度创新促进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的理念高度契合。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应聚焦四大方向:促进更高水平开放、形成科技创新示范、引领“双循环”发展、推进民生福利的正向溢出。金融创新既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通过推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构建以金融制度创新为引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为主体、金融技术创新为重要手段的金融创新体系,并形成金融创新的“一体联动”,进而助推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金融创新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以投资贸易便利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为建设目标,以制度创新为主要手段,发挥了深化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必由之路。中国已

设立 21 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基本形成覆盖全国,联动东西南北的高水平开放格局。金融创新作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优化转变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自贸试验区应充分发挥金融创新的作用,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 一、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与推进制度型开放相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制度型开放探索期(1978—2000年),

收稿日期:2025-09-09

作者简介:成春林,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发展;庞思璐,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开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防范和应对外国经济制裁研究”(22&ZD180)、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课题“长三角市场整合促进江苏创新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25SSL066)、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融开放创新助力南京科技企业发展的路径研究”(25YB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学习国际经贸制度,设计对外开放的框架。二是制度型开放扩大期(2001—2012年),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对接国际经贸制度,提升开放的制度特性<sup>[1]</sup>。三是制度型开放深化期(2013年至今),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创新国际经贸制度,设置国际经贸规则,促进开放的联动协作。

在国际关系深刻演变、全球经济形势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措施和策略,促进开放与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等理念联动发展。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设立自贸试验区为起点,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国内开放的成功经验制度化并向国际社会推广,加强新兴市场国家为主的多边机制建设,创新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行动进一步优化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体现出我国在世界经济潮流、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引领地位<sup>[2]</sup>。制度型开放经历了从学习到创新,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从分散、独立的政策措施到立体、系统的制度体系演变的过程,这一历程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高度契合。当前我国正处在制度型开放深化期,通过对接国际通行的、惯例性的制度规则,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与政策体系,持续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制度优势。

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手段。自贸试验区以投资贸易便利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为建设目标,强调以制度创新促进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的理念和要求不谋而合。在开放领域方面,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时代特征是在深入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加快服务业开放,而服务业对外开放正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目标之一,也是自贸试验区有别于其他功能区的标志;在开放平台方面,自贸试验区是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政策经验,探索出经济跨境合作新模式;在开放制度方面,制度型开放的核心

是构建与国际规则相融的国内基本制度体系与监管模式,自贸试验区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是制度创新的高地<sup>[3]</sup>,在制度型开放中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是国际通行规则在我国先行先试的重要载体。

## 二、制度型开放下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核心特征不仅有利于国外成熟制度在我国的复制推广,更有利于我国先进制度的对外输出。在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自贸试验区建设应从空间布局优化逐渐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自贸试验区除了承担全面深化改革与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责任外,还肩负着打造动力更强、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新增增长极的重任,进而促进更高水平开放、形成科技创新示范、引领“双循环”发展以及推进民生福利的正向溢出。

### (一) 促进更高水平开放

制度型开放需在传统贸易、利用外资等领域完善现有规则,提升开放水平。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更高水平开放。一是更大范围开放。自贸试验区数量不断增加,基本实现了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空间布局。下一步要积极对接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扩大开放范围。二是更宽领域开放。各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功能划分不同,涵盖多种产业类型和多个发展阶段,为测试开放经济在各领域受到的外部冲击提供了多种“场景”,推动自贸试验区的差异化发展有利于在不同重点领域进行探索与实践。三是更深层次开放。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基础与关键是制度创新。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探索国内改革路径,在学习借鉴国际规则的同时优化国际规则。

### (二) 形成科技创新示范

自贸试验区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其第一动力来源于科技创新。通过复制和推广科技创

新经验,为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提供支持,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以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行业优势为基础,凭借特殊的营商环境与政策制度,吸引并整合人才、资本、技术等优质的创新要素<sup>①</sup>,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基于各自区位特点,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新兴的高端产业,推动高端产业聚集与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转化与应用。

### (三) 引领“双循环”发展

制度型开放有利于消除全球高端要素在我国境内进行优化配置的障碍,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当前,我国进入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阶段,推动自贸试验区建成“双循环”发展引领区,是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为国际循环的稳定注入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自贸试验区是我国顺应和引领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二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动奠定坚实基础。构建“双循环”的关键在于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sup>[4]</sup>,自贸试验区发展要推动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度性适用,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制度的有效对接。

### (四) 推进民生福利的正向溢出

制度型开放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世界现行体制以及未来理想化体制相互包容和融合,有利于我国美好经济社会的正向溢出。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之一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不仅应提升区内民生福利,还应积极发挥溢出效应,扩大区内政策制度应用范围,将自贸试验区建成美好经济社会的辐射源区,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普惠性更强。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制度应从大型企业辐射至小微企业,通过区块链等技术的驱动和应用,

助力小微企业开展研发、生产,改善传统服务覆盖面不足的缺陷,增强企业服务普惠性。二是可复制性更强。在自贸试验区扩容的基础上,扩大政策的适用范围,使自贸试验区的成熟经验辐射至其他功能区、自贸试验区周边城市等地,促进企业、要素资源集聚,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提升城市民生福利。

## 三、金融创新助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效应

金融创新是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优化转变的重要手段,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金融创新需要顺应制度型开放的趋势,探索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与国际规则相融合的金融制度,并推进制度与机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一体联动”,进一步提升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加快金融要素集聚与金融科技应用,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从而满足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 (一) 金融创新推动自贸试验区更高水平开放

金融创新能够助力自贸试验区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开放。第一,促进更大规模“走出去”。金融创新为区内各类型“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健全的金融服务和更丰富的清算工具,加速跨境资金的流转,降低市场风险,提升企业效益。第二,促进更高水平“引进来”。当前自贸试验区内外资机构往往面临更高的准入要求,增加了外资机构的经营成本,降低了自贸试验区对外资机构的吸引力。金融创新有助于改善自贸试验区内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对接国际经济规则,便利外资机构在境内开展投融资业务<sup>[5]</sup>。第三,促进更高质量的出口与更优结构的进口。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内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的完善有利于改善产业资本配置,加快产业技术进步,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促进更高质量的出口;另一方面,有利于拓宽进口渠道,

注①: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和陕西自贸试验区为例,海南自由贸易港2023年新增技能人才71364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1730人,人才集聚效应显著;陕西自贸试验区依托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2023年新增科技成果转化企业332家,同比增长8.9%,技术要素配置能力不断增强,吸引、集聚功能凸显。

优化进口结构，提高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 （二）金融创新推动自贸试验区形成科技创新示范

金融创新有利于自贸试验区突破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为自贸试验区打造创新平台提供资金支持，吸引全球创新资源；为成果研发等活动提供专项经费支持，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连贯性与产品化进程；分散与降低自贸试验区科技成果应用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提高各类资源的配置能力，满足产业化不同阶段对资金的需求，保证产业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 （三）金融创新推动自贸试验区引领“双循环”发展

金融创新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促进自贸试验区链接“双循环”（见图1）。第一，在生产环节表现为提高要素流动性。自贸试验区打破了限制要素流动的政策壁垒，为区内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健全提供资金服务，吸引全球高层次、高水平的企业和人才，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生产质量提升。第二，在流通环节表现为提高流通便捷性。在货物流通方面，航运金融的发展为现代物流枢纽体系建设提供资金和风险管理等支持；在资金流通方面，人民币结算体系、自由贸易账户的设置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仓单质押、融资担保等增强了企业的融资能力。第三，

在分配环节表现为提高配置效率。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减少中小微民营企业参与境外资本市场限制，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分配体系。第四，在消费环节表现为提高消费多样性。自贸试验区大多依托保税区设立，具有“贸易自由”属性，金融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提供新型文旅金融服务，提高了消费的多样性。

## （四）金融创新推动自贸试验区提升民生福利

金融创新通过提供针对性服务，促进自贸试验区协调发展，提升区内民生福利。从空间布局来看，金融创新为东部自贸试验区居民提供更多的理财产品，拓宽理财和财产增值的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为中西部自贸试验区承接沿海自贸试验区的产业转移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消费与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人民的共同富裕。从功能定位来看，以文旅经济为主的自贸试验区，通过文化金融创新为居民带来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主的自贸试验区，通过健康金融发展促进医疗养老保险等产品的创新，完善发展健康产业资金支持体系，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 四、金融创新助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金融发展的动力在于创新。在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有利环境下，自贸试验区应形成以金融制度创新为引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为主体、金融技术创新为手段的金融创新体系，统筹推进金融创新的“一体联动”，进而促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 （一）推进适应自贸试验区战略定位的金融制度创新

第一，金融开放制度创新。为推动更高层次的制度型开放，我国应以自贸试验区为试验田，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制度体系，率先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当前各地自贸试验区人民币国际化途径基本一致，主要涉及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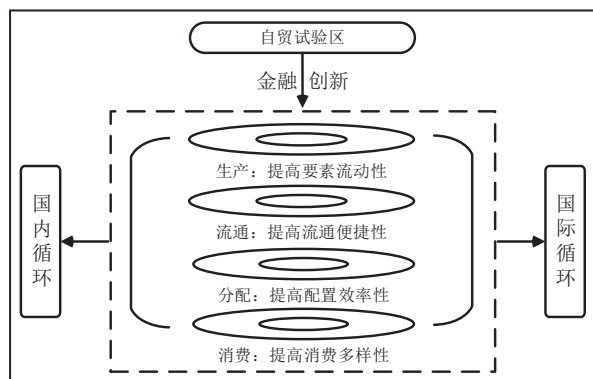


图1 金融创新促进自贸试验区链接“双循环”



结算、人民币债券发行、人民币股权投资等。各自贸试验区应根据重点发展行业的特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总结不同行业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周期、时长等特点，创新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方式。第二，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在外资监管方面，自贸试验区监管部门统筹协调负面清单管理，建立资本审查制度，对外资的背景与真实意图进行事先检查，欢迎实体投资的“善意”资金的流入。在金融纠纷监管方面，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设立仲裁机构等专业组织，构建多元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降低自贸试验区纠纷解决的成本，打造一流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第三，应急金融制度创新。为应对疫情、国际冲突等突发事件，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应健全应急金融制度框架，制定应急金融支持措施，从人才、企业、项目出发，针对生产、流通、销售、结算等各环节提供流程简化金融服务，打通应急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 （二）形成支持自贸试验区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创新

第一，丰富金融机构种类。当前入驻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机构以银行、保险等传统类型为主，以上海为例，外资银行与保险法人机构已超50家，外资省级分支机构超100家，但尚未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应出台优惠政策，提升区内金融机构多样性，加大资产管理公司、租赁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引进力度，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构成，满足区内企业创新的多样化金融需求。第二，拓宽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区内金融机构对科技企业的支持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金融主管部门应鼓励金融机构以实际需要为导向，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探索建立创新产品纠偏和暂停机制，确保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可控。第三，扩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覆盖面。自贸试验区金融机构应将数字信息技术与金融耦合，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sup>[6]</sup>，金融机构可与创

业孵化基地、科创中心等合作，共享科技企业档案信息，简化审查流程，为更多科技企业提供更大范围的金融支持。

#### （三）促进畅通自贸试验区内外循环的金融市场创新

第一，创新金融市场种类。在债券市场方面，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应大力发展低等级债券市场，改革现有的投资者信用分析体系，公平引导债券的供给，吸引更多优质的低等级债券投资者，为低等级债券市场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在离岸市场方面，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应以满足企业发展的融资需求为导向，加快离岸债券融资市场、离岸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离岸保险市场建设，打造农产品、能源等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提升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国际交易中的话语权与定价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创新金融市场工具。在投资领域，金融机构需进行基金、债券、期货、保险等多样化金融工具的创新，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引导居民的储蓄向投资领域流动，促进居民财富升值。在产业发展领域，金融机构应推动自贸试验区特定产业的证券化，开发具有自贸试验区产业特色的专业化保险产品，建立自贸试验区产业投资基金，扩大金融工具创新在推动自贸试验区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在知识产权领域，金融机构应开发以知识产权为基础资产的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推进知识产权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战略投资，拓宽知识产权融资通道。

#### （四）推动赋能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水平提升的技术创新

第一，加快金融机构对技术的有效利用。自贸试验区内的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结合政府部门、上下游企业的相关数据，构建以企业为中心的大数据平台，精准定位企业的经营状况等软信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与咨询，为企业的成长提供发展契机，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



问题,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效益。第二,加快金融市场对技术的有效利用。一方面,金融科技可以打破行业壁垒,降低信息资源获取成本,形成金融生态圈,促进更多信息在同一平台上汇集;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手段,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在风险预警、测度、防范和管理等方面更为科学精准。第三,加快金融监管对技术的有效利用。一方面,自贸试验区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通过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研发、设计等各个环节进行追踪监测,在金融市场交易、合规报告等场景中加强监管的力度与频度,及时识别与应对金融风险,实现监管的动态化;另一方面,可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挖掘与处理能力、云计算的计算和存储能力等,探索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新的合作途径,提升监管工具的共享,打破数据壁垒。

#### (五)注重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的“一体联动”

为充分发挥金融创新服务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除了推进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科技等创新外,政府和各类金融主体之间还要注重金融创新的“一体联动”,形成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此外,各自贸试验区之间也应强化“一体联动”,扩大辐射与示范效应。同时,金融创新也需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与安全,为自贸试验区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第一,金融创新自身的“一体联动”。金融制度规定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活动框架,是金融创新的基础。金融制度的变迁以效率提升为目

标,通过改变金融机构、市场主体活动的范围、合规性和合法性实现。金融机构创新和金融市场创新是相互关联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金融机构创新将直接影响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同时,金融市场创新也将对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如新类型或新层次的金融市场拓宽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引致金融机构创新。提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应当升级金融科技。金融与科技耦合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包容性和普惠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创新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必须形成涵盖制度、机构、市场、技术的金融创新“一体联动”(见图2)。

第二,金融创新在自贸试验区间的“一体联动”。由于自贸试验区设立时间不同,其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中山大学自贸试验区综合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广东前海、上海(浦东)、广东南沙、上海(临港)、天津、北京、福建厦门等片区在2024—2025年制度创新指数分别为89.89、88.88、88.71、87.34、85.14、84.22、83.27,位居全国前列。而后期成立的片区制度创新水平相对较低,如安徽蚌埠片区制度创新指数仅为70.49。为此,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应建立系统的联动路径,建议以广东、上海、天津等自贸试验区为龙头,形成金融创新三角区,充分发挥雁阵效应,联动周边自贸试验区,带动中西部自贸试验区金融发展。

第三,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联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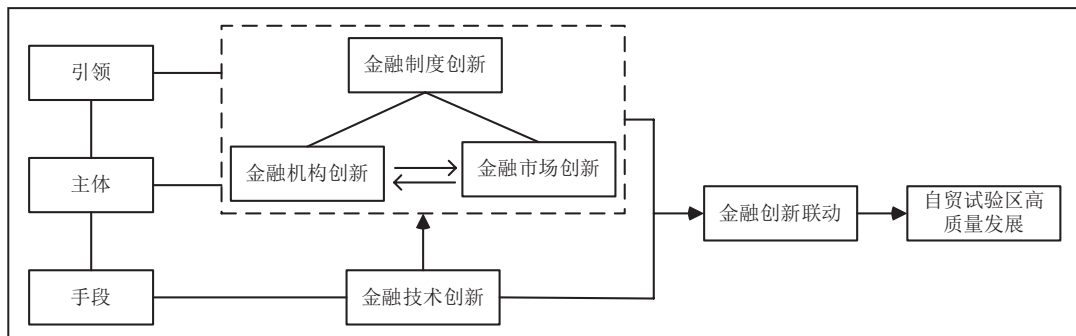


图2 金融创新“一体联动”

金融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也对金融监管提出挑战，必须在安全稳健的前提下推进。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要与金融监管联动，监管部门需构建专门的自贸试验区监管问责机制，建立创新产品监测、反馈和停止机制，有效兼顾创新和安全。加快监管沙盒的落地，在测试金融创新的同时调整金融监管规则和监管工具的实施效果，进一步明确准入、评估等各环节的规则，提升沙盒机制实施的确定性，为稳步突破现有监管规则拓展空间。

#### 参考文献：

[1] 杨丽花，王跃生.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时

代需求与取向观察 [J]. 改革，2020(3)：146-147.

[2] 裴长洪，刘洪愧.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 [J]. 经济研究，2018(2)：5.

[3] 李善民. 中国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及改革成就 [J]. 人民论坛，2020(27)：14.

[4] 葛扬，丁涵浩. 习近平经济思想核心要义与理论精髓——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 [J]. 经济学动态，2025(7)：9.

[5] 李光勤，李佳欣. 制度创新、营商环境与国际技术贸易——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验证据 [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1)：101-102.

[6]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J]. 经济研究，2019(8)：84.

责任编辑：蒋建忠

## 网络热词·社交预期·成长引导： 青年线下社交的困境与纾解

尤可晴 徐建飞

**摘要：**互联网技术深度重塑了青年社交生态，微信、抖音等平台在降低社交成本、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显著挤压了传统线下交往空间。网络热词的流行深刻折射出青年群体社交预期的重大变化，即对线下社交安全感的担忧、对社交效率的高度期待、对社交成本效益的理性考量及对社交真实性的渴望。本质上，青年对线下社交的疏离源于情感共鸣、深度交流等本体价值被效率至上、风险规避的工具理性挤压。鉴于此，优化青年线下社交需从规则与价值双层重构、认知与联结深度引导、活动与场景多元供给、试错与接纳环境营造四方面入手。

**关键词：**网络热词；青年群体；社交预期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青年群体越来越多地通过微信、QQ、微博、抖音、网游等平台开展社交活动。尽管互联网降低了青年群体的社交成本、提高了社交效率，但也挤压了传统线下交往的空间。仔细审视近年来青年群体使用的各类网络热词，不难发现网络社交盛行的背后，是青年群体难以排解的孤独感和隔阂感。因此，了解青年群体社交预期变化并进行有效引导，是支持青年群体正确开展线下社交、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

### 一、网络热词背后青年群体的社交预期变化及其逻辑

社交预期作为影响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关系到青年群体社会交往方式的选择。从近年来青年群体流行的网络热词中，不难看到他们在社交过程中的期望与诉求正在经历重大变化。

一是“社恐”“社死”背后的社交安全感预期问题。2021年，“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回收的4854份有效问

收稿日期：2025-09-25

作者简介：尤可晴，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徐建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自信自强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4BDJ078）、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新时代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研究”（2023SJZD07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卷中,80.22%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存在轻微“社恐”<sup>[1]</sup>。2025年,中国互联网“豆瓣”平台有超过58万的成员加入“社会性死亡”讨论小组,这些网友认为自身“社死”的尴尬经历,主要源于玩笑过度、冷场等预期失控。由此可见,青年群体对网上社交的偏好实际反映出他们对线下社交中可能出现的“失控”的担忧。

从逻辑层面来看,互联网在两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交安全感预期产生影响。一方面,互联网的“异步交流”模式,为青年群体缓解了社交焦虑。所谓“异步交流”,是指在网络社交进程中,能够对交流语言予以修改、编辑和撤回,从而规避了交流时因语塞或过度表达所引发的尴尬状况。同时,虚拟表情包等元素替代了情绪的直接表露,避免了负面情绪暴露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营造了“逆权威化”的交流场景,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更多平等交流的契机。在网络社交过程中,青年群体能够自由地在身份隐匿与身份公开之间进行切换,使其从家庭、职场中“晚辈”“下属”的身份束缚中解脱出来,以更为平等和自由的姿态参与到社交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现实身份所导致的不安全感。

二是“秒回”“已读不回”背后的社交效率预期问题。早在21世纪初期,“秒回”便已在论坛和早期即时通信工具中出现,用来形容迅速回复信息的行为。不少青年人表示,信息“秒回”不仅能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和重视,还能促进双方沟通顺畅、关系亲密。与之相对应,“已读不回”也成为互联网热门词汇,用以表达交往过程中的不满情绪。某种程度上,“效率即尊重”已经成为青年群体中一种普遍的社交观念。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对于社交效率的高度期待,不仅体现了他们对于时间价值的重视,也揭示了其在社交过程中对于被关注和尊重的强烈需求。

从逻辑层面来看,互联网在两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交效率预期产生影响。一方面,互联网构建了“社交算法匹配”逻辑。在这一逻辑下,社

交双方能够更为便捷地获取彼此信息,深入了解对方的爱好、兴趣、专长等内容。同时,在大数据与算法的助力下,外貌特征、个体性格、行为习惯等要素也逐步实现量化。基于此,青年群体可借助社交软件算法迅速匹配到“灵魂好友”,极大地缩短了传统线下社交模式中摸索与试探的进程。另一方面,互联网创设了社交“即时反馈”机制。互联网不仅能够实现算法的精准匹配,助力青年群体更高效地匹配同质性的好友,还提供了在线评价、点赞、弹幕等反馈机制。这些机制使青年群体能够快速且直观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注、认可与尊重,契合了他们对社交效率的高期待。

三是“秋天第一杯奶茶”背后的社交成本预期问题。2020年以来,青年群体中兴起了“奶茶社交”“剧本杀社交”等新型社交模式。前者通过相互赠送奶茶来增进亲密关系,后者则借助剧本杀等游戏形式结识新朋友。然而,“秋天第一杯奶茶”这一网络热梗在2024年遭到青年网民的反向抵制。不少青年认为,尽管互赠一杯奶茶的花费并不高昂,但通过奶茶维护人际关系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仍有待探讨。与此同时,部分青年指出,奶茶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其消费属性远大于社交属性,这种基于消费的社交模式,可能使青年群体陷入物质主义的困境。由此可见,社交成本显然是当前青年群体在社交过程中关注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互联网从两个层面影响着青年群体的社交成本预期。一是互联网技术所具备的“时空约束突破”功能。传统的线下社交活动会产生诸多经济成本,诸如通勤成本、餐饮娱乐成本等。而互联网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进而节省了通勤时间和相关费用。不少青年认为,共同观看直播或进行线上游戏,远比线下聚会乃至赠送一杯奶茶更具经济性。二是互联网的“多线程交往”机制。青年群体能够在互联网上同时与多个个体展开交流互动,相较于传统的线下社交模式,网

络社交可以避免在耗费大量时间和经济资源后,才发觉社交对象并不契合的状况。借助互联网的多线程交往模式,青年群体能够更为高效地运用自身的社交资源,降低社交试错成本,实现社交成本预期的最优化。

四是“电子面具”“人设崩塌”背后的社交真实性预期问题。近年来,“电子面具”“人设”“精修社交”等词汇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折射出他们对社交过程中真实性与表演性之间张力的深切关注。“在频繁密集的数字连接和华丽的数字情绪管理之下,稍有不慎的‘真实’便会带来社交媒体中的人设崩塌,其后果已然和现实的社会资本与情感关系联系紧密,使得追求自我寸步难行。”<sup>[2]</sup>这反映出青年群体在享受网络社交便利的同时,对交往对象的真实面貌、情感表达的真挚程度,以及自身能否“做自己”产生强烈的预期与焦虑。他们渴望在社交互动中触及更本真、更少修饰的个体状态,摆脱因“戴着面具跳舞”而带来的疲惫感。

综上所述,互联网正从两个方面深刻塑造青年群体的社交真实性预期。一方面,互联网提供的形象编辑工具,如“滤镜”“美颜”“文案编辑”“分组可见”等,赋予青年前所未有的自我形象塑造能力。他们可借助这些工具精心策划内容、修饰形象,构建特定“人设”。这种便利虽满足了展示与印象管理的需求,却加剧了线上呈现与线下真实自我的鸿沟,削弱了社交互动的真实性基础。青年在享受塑造自由的同时,既担忧他人“人设”的真实性,也为维护自身“人设”而承受压力,由此对不设防、纯粹的真实互动产生更高期待。另一方面,互联网催生的“流量导向”社交价值评判体系,以点赞、评论、转发等量化数据为显性指标,在算法与注意力经济的驱动下,挤压了真实表达的空间。这种“流量逻辑”迫使青年追求“吸睛”效果,倾向于发布迎合大众审美或热点趋势的内容,而非真实反映个人状态。对“数据表现”的过度关注,易使社交行为异化为表演

与竞赛:真实的情绪、平凡的日常片段,以及有深度却“不讨喜”的观点,往往被过滤。青年既渴望摆脱“流量焦虑”,期待无“数据考核”的真实交流;也对他人在此体系下所呈现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对能突破“流量滤镜”、展现真实脆弱或复杂性的互动抱有更高预期。

## 二、社交预期变化对青年群体线下社交行为的影响

从本质上看,青年群体线下社交的“坍塌”现象,正是其社交预期变化的折射。在此过程中,线下社交中的本体性要素,如情感共鸣、深度交流等,正逐渐被工具性逻辑取代。

一是社交安全感预期变化与青年群体的“数字化孤独”。早在 2001 年,部分发达国家的青年群体便已开始倡导设立“国际无手机日”。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频繁涌现“手机戒断”“网络戒断”“数字轻戒断”等热门词汇,这些热词的背后,反映出青年群体对过度依赖网络社交的反思与抵制。2023 年,“数字化孤独”<sup>[3]</sup>这一概念逐渐受到中国青年网民的关注。青年群体逐渐意识到,在看似安全的虚拟社交背后,实则潜藏着对真实情感交流的渴求,以及因这种交流匮乏而产生的失落感。数字身份的符号化、浅层交往的普遍化、社交技能的弱化、对深度交往的畏惧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致使面对面交往的价值被忽视,甚至可能诱发一系列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如孤独、焦虑等。

火热的网络社交背后,青年群体为什么仍然感受到“数字化孤独”?传统研究认为,孤独感源于互联网占据了青年群体的大量时间,“网络戒断”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路径。但从社交安全感预期来看,虽然互联网为年轻人提供了社交试错的机制(如撤回、延迟回复等),但正因如此,网络社交的潜台词变成了“不可说错话”,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可能遭受质疑甚至否定。虽然可以通过撤回、延迟回复等方式与社交对象保持共情,但显然这是一种刻意过滤矛盾冲突的

虚假共情。习惯了这种缺少碰撞的交流方式，会导致青年群体在线下社交时变得愈发谨慎保守，不敢轻易表达真实想法和感受，从而进一步加剧其孤独感和隔阂感。

二是社交效率预期变化与青年群体的“完美人设焦虑”。“人设”一词最早用于漫画、动画、游戏等视觉艺术领域，指对出场角色外貌、性格等特征的设定。近年来，“立人设”“人设崩塌”等逐渐成为青年群体社交语言中的高频词。在网络社交平台上，青年们通过精心挑选的照片、文案和视频来构建自己的“人设”，以此作为社交资本，期望在社交网络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然而，这类“人设”通常较为脆弱，一旦现实状况与“人设”出现偏差，就可能导致“人设崩塌”，进而引发信任危机和社交困境。这种对“人设”的过度依赖和追求，致使青年在面对线下真实社交时愈发感到焦虑不安。

那么，青年群体为何容易产生较高的自我人设期待呢？借助互联网，青年群体只需发布一条状态或分享一张照片，便能迅速获得点赞、评论等反馈。这种即时的正向反馈使他们感受到被关注与认可。此外，互联网还构建了快速反馈机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契合程度可被量化为“匹配度”“亲密度”等效率概念，“点赞”“粉丝”“群活跃程度”等也成为网络社交情感效果的重要指标。这种高效的正向反馈，为青年群体营造出完美人设的假象，促使他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社交效率，高点赞、高评论、高粉丝量成为他们的社交目标。部分青年人将这种把自我价值锚定于他人点赞数量、粉丝量等外部指标的思维习惯，称作“认可依赖症”。这类人群沉溺于自我设定的虚拟形象中，过度追求完美人设以获取他人认可，却忽略了人正是因为不完美才显得真实。

三是社会交往成本预期变化与青年群体的“付费搭子”。近年来，与网络交往火热趋势相反的另一现象，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在互联网上出售自己的闲暇时间、技能和

经验，如陪看病、陪吃饭、陪逛家乡，甚至提供专业分析决策等，这类行为被青年群体称为“付费搭子”。青年群体之所以热衷于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线下社交模式，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付费的服务更专业。例如，在陪看病服务中也包括了帮忙挂号、就医指导、跑腿付费以及在病人就医时看护个人重要物品等。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付费搭子”提供了比一般线下交往更丰富的情绪价值。例如，在陪逛家乡的服务中，除了基本的向导功能，还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分享彼此的故事和见闻，增加了线下交往的趣味性。

那么，为何当下年轻人既热衷于网络社交，又愿意为线下社交支付费用？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实则受到社交成本预期的影响。处于快节奏生活中的青年群体认识到，传统线下社交虽看似基于情感纽带或兴趣爱好展开，但实际仍需投入一定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而反观“付费搭子”，虽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却能明确、高效地获取所需服务与情绪体验，无须耗费大量精力去筛选、磨合，既节省了时间成本，某些情况下还节约了经济成本。此外，“付费搭子”作为新兴的社交经济形态，为当代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与创业机会，“陪伴经济”也受到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与研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使社交活动愈发结果导向，青年群体更倾向于选择能直接带来满足感和情绪价值的社交方式。长此以往，会导致青年群体忽视交往对象的人格魅力、思想深度等内在价值，而将他人工具化，视为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

四是社交真实性预期变化与青年群体的“浅层社交依赖”。与线上“人设管理”的疲惫感相对应，青年群体在线下社交中呈现出一种“浅层社交依赖”的新趋势，表现为对“搭子社交”及“电子闺蜜/兄弟”（即仅停留在线上的情感互动）等轻量级关系的偏好。对他们而言，互动可随时按自身偏好开启或终止，无须投入精力维系深层关



系，关系往往瞬息间建立亦可瞬息间消散。此种对深度社交的回避，被部分研究者以“社交降级”或“情感萎缩”等比喻性概念加以描述。其后果是，在频次颇高的“搭子”互动中，青年反而可能体验到较传统友谊更深的情感空洞与意义缺失，真实自我得以呈现与回应的空间被不断压缩，情感共鸣的渠道日益收窄。

那么，为何青年群体在渴望真实性的同时，却于线下实践中趋向“浅层依赖”？一方面，线上“形象可编辑化”的长期实践，使青年习惯对自我呈现进行高度掌控。当转向线下面对面、即时且不可撤回的交流时，他们面临“人设管理”失效的风险——表情、语气、不经意的反应都可能暴露与线上精心维护的形象不符的“真实”。这种对“失控”和“人设崩塌”的潜在恐惧，促使他们在线下更倾向于选择“搭子”这类角色清晰、互动边界明确、情感卷入度低的社交模式，以规避深度互动中不可控的自我暴露风险。另一方面，线上“流量导向”的评判体系，无形中使青年养成对社交互动“性价比”的评估习惯。深度社交往往需投入大量时间与情感能量，且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其“回报”难以像线上的点赞、评论数那样即时量化。相比之下，“搭子”社交目标明确、过程可控、情绪耗能低，更契合被互联网效率逻辑重塑的“投入—产出”预期。因此，对线上“真实性”的渴望，反而因恐惧线下互动的“不可编辑性”与“投入产出不确定”，演变为对浅层、安全、低风险社交模式的依赖。

### 三、青年群体线下社交的优化路径

社交预期作为青年群体的“心理透镜”之一，既可能成为突破社交能力边界的助推器，也可能沦为自我设限的枷锁。随着算法推荐系统塑造用户预期能力的增强，预期管理可作为优化青年交往模式的重要抓手。

一是规则与价值双层重构，筑牢安全健康的交往根基。构建清晰明确的社会交往规则，无疑是促使青年群体重新审视线下交往、重拾安全感

的重要举措。青年群体对网络社交模式的依赖现象并非仅存在于中国，当前，借助立法手段重塑社会交往规则，正逐步成为一种国际共识。例如，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要求大型在线平台承担更严格的内容审核、广告透明度和算法可解释性义务，旨在减少有害信息传播，增强用户特别是高度活跃的青年用户群体对在线环境的掌控感；英国的《网络安全法》同样明确规定平台负有保护用户的责任，该立法覆盖各个年龄段人群，尤其着重关注易受伤害群体，其中包括保障青年免受非法和有害内容侵害的法律义务，并设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韩国则通过修订《信息通信网法》等举措，加大对网络暴力及虚假信息传播的打击力度，特别注重保护易受影响的青年群体，同时要求平台构建行之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我国虽尚未对青少年群体进入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设置严格门槛，但已有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始尝试通过制定校规等方式，引导青少年合理安排线上线下时间。当然，这类带有“强制性”特征的举措也引发了诸多质疑。一种担忧是，此类强制性立法可能会使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活动转向更为隐蔽的途径，从而接触到更多不良的互联网信息；另一种担忧是，强制青年群体戒除网络使用，能否切实提升其线下社交能力和意愿尚存疑问，二者可能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相较于摆脱网络依赖，重塑线下交往价值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在 2015 年左右，不少国家便已认识到“社交和情感技能”对于青年的重要性，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英国等国围绕这一议题开展了大量跟踪调研与科学研究，并面向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开设社交类课程。近年来，中国重视青年群体社交技能的培养，涵盖社会情感教育、正确恋爱观、挫折应对等方面，但专业化的社交技能教育尚未普及。与此同时，还应向青年群体普及线下交往的价值。线下交往虽充满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激发了人们在面对交往困境时的应变能力与创造力，使每



一次交往都成为独特的体验与学习契机。在此过程中,青年群体能更直观地感受他人的情感与态度,进而更好地理解 and 尊重他人。

二是认知与联结深度引导,化解冲突并培育真实互动。除了借助教育、宣传等多种途径,引导青年群体认识到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以外,还需向青年群体普及线上与线下社会交往反馈机制的基本原理。一方面,要使青年群体明白“维持完美的人设并不等同于具备优秀的社交能力”。过度追求网络上的完美人设,会使人在现实交往中回避自身的问题与不足。长此以往,不仅会引发社交焦虑,还会削弱真实社交中的自我认知与成长,无法接纳并欣赏真实的彼此。另一方面,也需让青年人明白“产生社交冲突并不意味着社交能力低下”。在社交互动中,冲突难以避免,它是人际关系复杂性的表现,而非个人社交能力的缺失。因此,应鼓励青年群体正视冲突,将其视作增进理解、推动成长的契机。同时,要教导他们学会运用有效的沟通技巧化解矛盾,而非逃避或采取极端行为。

除此之外,还需助力青年群体树立“深度联结优于即时反馈”的社交认知。近年来,多项研究成果表明,线下社交在化解观念冲突、激发创造力方面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线下深度社交呈现“慢反馈”特征,正是在于其并不追求即时满足与表面和谐,而是直面社交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矛盾。例如,在面对冲突时,应认识到此类矛盾源于信息差或立场差异;在解决冲突时,要进一步弥补信息差,并学会基于不同立场对问题进行分析。这种社交逻辑,使沟通不再局限于舒适区或信息茧房,而是持续挑战并拓展认知边界,进而实现更深层的理解与共鸣。这种“深度联结”带来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是网络社交无法比拟的。

三是活动与场景多元供给,营造成长赋能的社交生态。近年来,“城市漫步”成为青年群体中的热门话题,它指的是青年群体自发聚集,去探寻城市中隐蔽的美食、美景、文化等。这一活动

不仅能够增进青年群体对所在城市的认知,还能促使他们走出虚拟世界,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更为深厚的友谊和信任。这一社会现象体现了青年群体对线下社交活动新模式的迫切需求。当前,全国各地针对青年群体推出了志愿服务、文化体验、体育运动、相亲交友等多种活动形式。同时,青年群体对社交活动的需求正呈现出新的变化。202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问卷网联合开展调查,在对1000名青年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55.60%的青年表达了对更多线下“技能交换活动”的期待<sup>[4]</sup>。此外,部分城市兴起的“学术酒吧”也对青年群体产生了显著吸引力。上述现象揭示,青年群体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娱乐和放松,而是希望在社交活动中获得个人成长、技能提升等附加价值。

不难发现,线下社交的机会成本、经济成本甚至时间成本都逐渐成为青年群体关注的要素,因此,不仅要聚焦社交活动方式的丰富性,还需强化社交空间的有效供给。一方面,应扩大学习类、运动类、婚恋类等公共服务空间的规模与功能复合度。例如,可在社区中心、公共图书馆及高等院校内设置多功能社交空间,为青年提供交流、学习与娱乐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虽提升了校园安全水平,却也加剧了跨校社交的难度,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亟待关注。另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创新社交空间的服务模式。青年群体的社交需求具有动态化特征,依托市场机制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交体验已成为必然趋势。当然,市场驱动下的社交空间扩张需同步强化规范性治理,除价格监管外,还应确保其运营合法合规,防范不良信息传播与不良行为滋生。

四是试错与接纳环境营造,培育真实表达的勇气与土壤。针对青年因恐惧“人设崩塌”及线下互动“低可控性”而回避深度社交的问题,需要营造包容“不完美”、鼓励“真实表达”的社交环境。一方面,着力创建“安全试错”的社交实

践空间。可在社区中心、青年之家、高校社团等场所，常态化组织如“即兴戏剧工作坊”“非暴力沟通训练营”“观点碰撞沙龙”等结构化活动，为青年提供一个低风险场域，使其袒露真实想法、处理人际冲突、展现脆弱性，逐步克服对“失控”的恐惧。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去绩效化”的社交价值评价体系。应引导青年群体及社会舆论，主动抵御线上“流量逻辑”对线下社交价值的异化影响。鼓励在校园、社区、工作场所等青年高频互动的场景中，降低对社交“活跃度”“粉丝量”等量化指标的关注，转而推崇“真诚表达”“深度共情”“建设对话”等交往本质，重塑“真实即价值”的社交认知。例如，复旦大学部分院系推广的“深度共读会”活动，明确摒弃“打卡积分”“活跃度排名”等线上常用激励方式，聚焦文本引发的思想碰撞与成员间的情感共鸣。参与者反馈，这种剥离了“数据考核”压力、专注于内容与联结本身的“慢社交”模式，使其体验到真实思想交流带来的深层满足感与归属感，有效缓解了“完美表现”焦虑。

#### 四、结语

互联网深刻地重塑了青年群体的社交预期。这一变化既体现出他们对于安全感、效率与成本的全新诉求，也揭示了虚拟繁荣背后潜藏的诸如“数字化孤独”“完美人设焦虑”和“付费搭子”工具化倾向，以及“浅层社交依赖”等异化现象。

青年对线下社交的疏离，本质上是社交预期变化所引发的结果，情感共鸣与深度交流等本体价值被效率至上、风险规避的工具理性所压缩。理解并优化这一预期，对于青年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健康的社交预期是青年构建健全人格、发展社会化能力、抵御精神困境的重要支撑。它关系到青年能否在人际交往中获得真实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而不是沉溺于算法营造的虚幻认同；关系到青年能否珍视线下“慢反馈”中深度碰撞所带来的理解力与创造力的提升，而不是迷恋即时点赞所带来的肤浅满足；关系到青年能否建立基于真诚互惠、尊重个体内在价值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将他人视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工具。

#### 参考文献：

- [1] 程思，毕若旭，王军利.“社恐”日记的背后有努力、有尝试、有改变——超八成受访大学生认为自己轻微“社恐”[N]. 中国青年报，2021-11-23(11).
- [2] 赵云泽，张玲. 社交媒体中的数字情绪传播研究[J]. 当代传播，2022(6): 21.
- [3] 德鲁因. 数字化孤独社交媒体时代的亲密关系[M]. 周逵，颜冰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10.
- [4] 王志伟. 55.6% 受访青年期待组织更多线下技能交流活动 [EB/OL]. (2025-04-23). [https://news.youth.cn/jsxw/202504/t20250423\\_15961004.htm](https://news.youth.cn/jsxw/202504/t20250423_15961004.htm).

责任编辑：徐晓婷

#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管理改革的趋势与挑战

高任伟

**摘要:**本文以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为宏观背景,结合《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学管理改革方面呈现出的共性趋势,探讨其在坚持政治性、适应多样性、提升有效性等方面的挑战,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思考,旨在为推动全国社会主义学院更好地服务统一战线事业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大统战工作格局;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管理改革;政治共识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基于对新时代统一战线性质、任务和环境特点的精准把握,提出了大统战工作格局。这一工作格局要有效运行,根基在于统一战线成员具有坚实的政治共识和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社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必须把思想引领、广泛凝聚政治共识作为中心任务。

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成员构成多元,思想观念、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这给团结整合各方力量、增进政治共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社院传统教学管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深化教学管理改革,是社院适应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履行职责使命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之策。要创造性地做好凝聚人

心、凝聚力量、凝聚智慧、凝聚共识的工作,就必须突破传统教学管理模式的局限,构建更具适应性和创新性的教学管理体系,实现教学供给与统战事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从而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更好地服务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

## 一、社院教学管理改革的现状

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指引和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下,全国各级社院普遍迈入了以提升教育培训质量为核心的改革阶段。各地的社院在教学管理改革中的实践探索呈现出若干共性趋势与创新亮点。

### (一) 强化顶层设计,确保政治方向

2018年《条例》颁布后,各级党委普遍加强了对社院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整体工作部署和

收稿日期:2025-05-19

作者简介:高任伟,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人员。

统一战线工作总体安排,定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社院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实际困难,为社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党委统战部门对社院的指导和管理责任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把好政治方向、谋划发展大计、协调内外资源、汇聚各方力量支持社院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条例》明确的党委领导、统战部门指导和管理、社院党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这一领导体制,正在各地得到有力贯彻并不断完善,为社院准确把握政治方向、推进教学管理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 (二) 优化课程建设, 凸显特色教学

课程设置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育人实效。各地社院普遍参照中央社院的改革经验,推行模块化教学,以政治共识为核心、文化认同为基础、能力素质为重点,对课程进行系统整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中华文化与民族复兴”“国情世情与形势政策”“领导能力与综合素养提升”等相对独立的教学模块,增强了课程设置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在确保核心课程落实到位的基础上,各地社院高度重视结合本地区、本领域及不同培训对象的实际需求,大力开发特色课程。沿海发达地区社院多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区域一体化发展”等专题;民族地区社院则突出“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专题;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社院充分挖掘本地文化元素,打造彰显地域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sup>[1]</sup>。同时,针对不同统战领域代表人士的特定需求,设置更具针对性、实用性的专业化课程模块或开设专题研修班,努力实现因材施教、精准供给。

### (三) 创新教学方法, 增强实践效果

为克服传统教学“一言堂”、学员被动听讲的弊端,各地社院普遍加大了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力度,着力提升教学的吸引力与实效性。首先,广

泛应用互动式教学和现场教学。使用学员论坛、结构化研讨、辩论赛等互动式教学方法已成为常态,有效激发学员主动思考、积极参与,促进思想交流与碰撞。同时,各地社院大力建设和拓展各类现场教学基地,组织学员赴延安、西柏坡、井冈山等地接受红色教育,赴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如深圳)感受发展成就,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如曲阜、敦煌)涵养人文精神。通过“走出去”沉浸式学习,让学员在实地体验中深化理性认识、增强情感认同。其次,积极尝试模拟式、体验式教学。把模拟政协提案、新闻发布会、情景谈判等方法引入课堂,从而提升学员实际操作技能、应变能力和复杂情境下的决策水平。例如,一些社院采用“翻转课堂”,通过“课堂翻转”“角色翻转”等形式,让学员跳出既有思维框架,从不同维度思考和分析问题。最后,探索“互联网+”教学模式。部分社院开发在线课程,建设数字教学资源库,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进行教学延伸、学习辅导与资源共享,尝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以适应学员多样化需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 (四)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注重能力提升

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师德高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充满活力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是社院教学管理改革的关键。各地社院坚持专兼结合,建设师资库。一方面,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进等方式,吸纳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充实教研岗位,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广泛吸纳党政领导干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统一战线工作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以及各行各业先进模范人物担任兼职教师,形成多元互补的师资结构。师资库根据教学需求、学员评价和教学效果等因素动态调整优化,实行“能进能出”的管理机制。一些社院还探索建立“2+X”模式(每个核心专题至少配备2名主讲教师和若干后备或特邀教师),保障核心课程师资的稳定。中央社院和



省级社院也积极承担对下级社院及系统内骨干师资的培训任务。

#### （五）拓展办学格局，汇聚各方资源

为适应新时代“大统战”和“大教育”的要求，社院的办学格局日趋开放，各社院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提升办学合力。一是深化“联合党校联合办”。加强与党委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高校等深度合作，共同开发特色课程和教材，共享优质师资，联合举办专题班次和学术研讨活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局面。二是推进院际合作与协同发展。中央社院对地方社院的业务指导关系进一步明晰并强化，通过办学质量评估、定期召开院长会议和业务研讨会、组织课题研究等方式，提升全国社院整体办学水平。同时，积极探索区域性社院合作机制（如长三角地区社院协同发展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内社院在课程资源、师资力量、信息平台、科研项目等方面共建共享、联动发展。三是积极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和对外交往。部分有条件的社院发挥“中华文化学院”作用，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国情教育、中华文化研修、寻根问祖等活动，增进其对祖国大陆的了解与认同，服务国家对外宣传、文化交流和港澳台侨工作大局<sup>[2]</sup>。

### 二、社院教学管理改革面临的挑战

尽管全国社院教学管理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和成效，但在适应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求、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和治理能力的过程中，仍普遍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 （一）政治性与学理性的平衡难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学院，“旗帜鲜明讲政治”是社院的首要原则和生命线。若缺乏深厚学理支撑和有效教学转化，教学容易简单化、口号化，难以触及学员思想深层；若片面追求“纯学理性”或“价值中立”，则可能偏离办学方向，削弱政治引领功能。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巩固政治共识的前提下，提升教

学内容的学理深度、逻辑力量和知识含量，鼓励学员理性思考，培养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是社院教师和管理者解决的重要问题。

#### （二）精准教学与多元需求的对接难题

社院学员的背景较为多元，在知识结构、思想困惑、利益诉求等方面差异显著。如何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代际的学员群体，设计并实施个性化、精准化的教学内容、培养方案和管理服务模式，是对社院课程研发能力、需求调研能力、教学组织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重大考验。实现从“大班额、普适性”教学向“小班化、定制式”培养转变，对教学管理资源和师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 （三）培训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与长效性困境

当前，不少社院培训效果评估仍偏重学员即时满意度、课堂组织、知识点初步掌握等表层指标，对政治共识内化、思想观念转变、履职能力提升，以及培训能否转化为实际工作行为并产生长期影响等深层次问题，普遍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工具。构建一套全面、客观衡量“铸魂育人”“凝心聚力”实效的评估体系，克服主观性、短期性和形式化倾向，是社院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社会公信力的关键。

#### （四）专业化师资队伍建设的结构性矛盾与持续性难题

虽然各地社院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并采取多种措施，但高水平专职教师队伍的数量与质量仍显不足，特别是既深刻理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又精通统一战线业务，并掌握现代教育教学规律的复合型人才仍属稀缺资源，引进和培养周期长、难度大。兼职教师虽来源广泛、能提供多元视角和实践经验，但其精力投入、教学规范性以及对社院教学理念和政治要求的理解与认同可能参差不齐，如何有效管理、激励和培训兼职教师并促进其融入社院教学体系，仍是普遍难题。

### 三、新时代社院教学管理改革的实践路径

展望未来,社院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教学管理改革必须向纵深推进,着力破解瓶颈难题,聚焦关键环节持续发力。

第一,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把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核心竞争力,组织骨干力量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原创性理论贡献及其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形成权威解读、核心教材和精品教学模块,有效回应时代课题和学员关切,真正做到“以学术讲政治”。

第二,构建精准化、个性化、开放共享的“大统战”课程与教学资源体系。在统一核心课程要求基础上,深化对不同统战领域、学员群体特征与需求的精细化研究,与统战部门、民主党派、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开发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的选修模块、案例库、情景教学剧本和数字教学资源。积极探索学分制、菜单式选课、导师制等灵活教学组织形式,满足学员个性化学习和深度发展的需求。

第三,推动教学模式深度融合,向智慧化、场景化升级。系统规划和建设全国统一战线网络教育培训平台及各级社院智慧校园,大力开发优质数字教学资源(如微课、精品慕课等),推广线

上线下融合学习模式;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展学习行为分析与效果预测,为精准教学、个性化辅导和科学评估提供技术支撑。

第四,强化政治共识教育方法与评估体系协同创新。在坚守政治底线和价值引领前提下,鼓励教师团队探索能激发学员主体参与、促进深度对话、引导理性反思、触发情感共鸣的教学方法。建立涵盖政治立场、理论素养、能力提升、行为转化等多维度指标,融合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即时反馈与长期追踪的科学评估体系,注重结果反馈与持续改进,不断提升共识教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

第五,健全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选育管用及激励保障机制。完善引才标准和程序,拓宽选人视野,吸引优秀人才投身社院事业;加大对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系统培养和支持,鼓励开展高水平教研和理论创新,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潜心治学的良好生态;优化兼职教师聘用、管理、培训和评价机制,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合作关系。

### 参考文献:

- [1] 周迪. 如何构建生态治理共同体: 基于统一战线赋能的思考 [J]. 理论月刊, 2025(3): 59-66.
- [2] 任淮南. 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于社会主义学院共识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24(2): 44-50.

责任编辑: 徐晓婷